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四川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安庆国
封面设计：　文小牛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1.125插页4 字数240千
1983年11月第一版　1983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100册

书号：2118·17　定价：1.40元

序　言

一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的成长并不象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①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地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批判地吸收了前人的一切积极的思想成果，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历史时代“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的集中体现，因而它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人类哲学发展史上的根本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了这个科学的、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这是他们对人类的巨大贡献。但是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穷尽真理。真理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进一步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实践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页。

验，充实、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列宁的哲学思想从体系上来说仍属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并没有创造一个新的哲学体系，但列宁的哲学思想也是他自己所处的历史时代“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的集中体现。因而列宁的哲学思想不但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简单重复，而恰恰相反，它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问题在于怎样看待毛泽东哲学思想。长期以来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评价有两种错误的倾向：一种是任意拔高，随随便便就把毛泽东哲学思想吹成“顶峰”等，从根本上破坏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联系，造成了严重后果；另一种倾向是任意贬低，完全否定和抹煞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和发展。这两种倾向都严重地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生根和成长，使得中国革命的面目发生了根本变化。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是，在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革命斗争，必然会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而要解决这些特殊的复杂问题，单靠照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是不行的，单靠照搬苏联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也是不行的。而必须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地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毛泽东正是在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的长期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就

是毛泽东哲学思想。

什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总结。这种结合一方面说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不可能脱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继承；另一方面说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也不可能脱离中国这个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我们说毛泽东哲学思想也"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这个哲学思想里了。

但是毛泽东的一生，与马克思、恩格斯不同，也与列宁相异。他的大半生都处在残酷紧张的斗争环境和长期的戎马生活中，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实际斗争的第一线，这就决定了他没有可能进入书斋中从事系统的理论研究，撰写大部头的哲学著作，毛泽东只是从中国革命实际工作出发，着重解决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辩证关系问题。毛泽东从不空谈哲学，他总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而研究哲学上的各种问题。《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理论表现。其中，如《实践论》、《矛盾论》以及各篇军事辩证法著作，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文献。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如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唯物论以及党的建设、艺术哲学、道德哲学、工作方法等，都有自己独到的理论见解。正是这些多方面的独到的理论见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新的光彩，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

主义哲学。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经过实践检验而证明了的真理。凡是经过实践检验不是真理性的认识，包括毛泽东本人的个别言论，都不能算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似乎是矛盾的说法，但它恰恰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标准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一门科学，所谓科学意义上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只能是经过实践检验而得到实践证明了的东西。毛泽东晚年在理论上的失误，不仅不能算作毛泽东哲学思想，而正好说明它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背离。有的人企图以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来否定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价值，这正说明他对历史唯物论缺乏全面地认识。在历史唯物主义者看来，任何个人，包括伟大的领袖在内，他在错综复杂的客观现实的斗争中，决不可能“句句是真理”。这是任何“凡人”所做不到的。因此把毛泽东哲学思想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分开，决不是“应急措施”，而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态度。

毛泽东哲学思想也如同世界上任何其他思想体系一样，它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虽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作为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已在各方面显露出他的丰富的辩证思维才能，但作为科学体系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形成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其标志就是《实践论》、《矛盾论》的问世。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多方面的展开并日趋完善的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哲学思想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发展。只有这样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看作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

历史过程，才能认识和掌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才能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二

列宁指出："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被一大堆细节或各种争执意见所迷惑，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须、最重要的就是不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①毛泽东在一九四二年讲到如何研究党史时也说过，讲到中国无产阶级，就要讲到世界无产阶级，讲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斗争，就要讲到马、恩、列、斯他们怎样倡导国际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这就叫"中外法"。列宁讲的"历史联系"的方法和毛泽东说的"中外法"，都是反对形而上学的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方法，都是提倡辩证的科学的方法，亦即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在这本书中，我们就是力图按照这种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一全面的分析和研究。当然，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和探索，是需要经历一个过程的。只要我们遵循科学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和探索就会一次比一次更接近实际。

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研究。我们侧重它的形成和发展，因而：

第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总的历史联系中来进行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43页。

考察和研究，看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什么样的理论前提和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的，并且还要根据这些理论前提和历史条件看毛泽东哲学思想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增添了哪些新的东西。经过这样一比较，就会看到：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中国这个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因此它高度概括了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的丰富经验，而且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真正把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和课堂中解放出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群众化了。

第二，是从中国哲学史的历史联系中来进行考察和研究，看毛泽东哲学思想继承了哪些哲学遗产，解决了哪些传统哲学中的问题，又是怎样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的辩证思维传统的民族，有许多宝贵的精神遗产。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的实践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批判地吸收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优秀成果，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一系列问题，使中国哲学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新的水平。

第三，是从中国革命的历史联系中进行考察和研究，看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怎样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对中国革命实践进行理论指导和哲学概括的。毛泽东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一贯反对“唯书”、“唯上”、“言必称希腊，死不谈中国”的错误态度，一贯主张和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原则。因而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实践经验概括出来的哲学原则，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

第四，是从思维逻辑发展的角度来进行考察和研究，看毛

泽东哲学思想对人类思维形式有哪些突破和独创。恩格斯曾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而这对于思维的实际应用于经验领域也是非常重要的。"①这就是说，从思维逻辑的角度上来看，毛泽东哲学思想也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它把人的思维规律应用于对中国实际经验的总结，创造了新的思维形式，即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化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更充分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客观世界的作用。

只有用这种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去考察毛泽东哲学思想，才能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才能深刻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贡献，从而明确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

三

一九二五年斯大林在《论共青团的任务》一文中说到列宁主义时，曾指出："列宁主义是全世界工人革命运动经验的概括。这个经验是一盏指路明灯，它照耀着实际工作者的日常工作的道路，给他们指出方向。……如果实际工作者不研究列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2页。

主义，不努力掌握列宁主义，不愿意把自己的实际工作同必要的理论学习结合起来，他们的遭遇就会是这样：摸索着工作，在黑暗中工作。”①这个分析同样适用于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它的哲学思想。毛泽东思想包括它的哲学思想，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一盏指路明灯。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毛泽东哲学思想给我们指路，我们只能是“摸索着工作，在黑暗中工作”。中国人民能有今天，中华民族能有今天，是因为我们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当然更离不开它的理论基础即毛泽东哲学思想。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继承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振兴中华的需要。然而由于多年“左”的影响和干扰，使一些人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没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指引，我们也能搞好“四化”建设。这是一种糊涂认识。马克思主义者历来认为，在一定的物质条件基础上，精神的作用是巨大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一切事业，不论革命或建设，都需要科学的世界观来指导。毛泽东哲学思想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不仅可以给我们指明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道路，而且可以从方法论上指导我们，使我们少走弯路。一句话，没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指引，要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只不过是一句空话，当然也就更谈不到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了。

为了帮助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哲学思想，我们编写了这本《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是为了便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05页。

于大家系统地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哲学思想，我们注意了以下几点：第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和科学体系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怎样与中国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即政治的、经济的、科学的等诸方面发生联系的，而这种内在的和外在的联系又是怎样使毛泽东哲学思想独具中国特色的。第二，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怎样批判地吸收了中外哲学史的优秀成果的，又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工作的。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在实际工作中自觉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第三，只有站在巨人的肩上才能比巨人站得高、看得远。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起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成果。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深刻领会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第四，毛东泽哲学思想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斗争。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形成过程中，每向前走一小步都要同形形色色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斗争。同样，要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也必须继续同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第五，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与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水火不相容的。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实际工作中自觉地克服主观主义的错误。

虽然我们主观上是力图按照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来面目给以全面的分析和论述，但由于各方面的限制，特别是由于作者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的限制，不当和错误之处难以避免，敬请广大读者给以帮助。我们始终认为，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作全面、系统的探索，是一个比较困难而又必须完成的课题。我们虽然没有能力完成这个课题，但希望由此而引起一个百花盛开的局面。这就是作者写本书的目的。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们曾得到许多同志的热情帮助。初稿写出后一些同志帮助审阅，并提出宝贵的意见。在这里，我们对所有给我们以支持和帮助的同志，致以谢意！

作　者

一九八三年元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条件……………（1）
第一节　中国工农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1）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8）
第三节　中华民族悠久的辩证思维传统……………（16）
第四节　毛泽东本人勤于学习和躬行实践的精神……………………………………………（27）
第二章　毛泽东的早期哲学思想………………………（35）
第一节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以前基本是一个唯心论者………………………………（35）
第二节　毛泽东在世界观转变时期的哲学见解……（42）
第三节　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哲学思想………………………………………（49）
第四节　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哲学思想………………………………………（58）
第三章　毛泽东的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的形成………（66）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旧认识论学说的根本改造……………………………………………（66）

E26/15

第二节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学说进行了新的探索……………………………………（74）
第三节　《实践论》标志着毛泽东的认识论学说的形成……………………………………（83）
第四节　《实践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出了新贡献……………………………………（96）
第四章　毛泽东的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形成……………………………（108）
第一节　唯物辩证法的创立是哲学史上的根本变革……………………………………（108）
第二节　《矛盾论》是科学地总结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经验的必然产物……………………（113）
第三节　《矛盾论》标志着毛泽东的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辩证法思想的形成……………（119）
第四节　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在多方面的展开和成熟……………………………（132）
第五章　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141）
第一节　唯物史观的创立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伟大革命……………………………………（141）
第二节　毛泽东的唯物史观是在同各种错误观点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148）
第三节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的唯物史观……………………（155）
第四节　毛泽东的唯物史观的基本特征…………（162）
第六章　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171）

第一节　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形成的理论前提 …………………………………… (171)
第二节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探索 …… (182)
第三节　《论持久战》等著作的问世标志着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形成 ………………… (195)
第四节　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 (207)
第七章　毛泽东关于建党的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 (214)
第八章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化为工作方法 ………………………………………… (224)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 ………………………… (224)
第二节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化为工作方法 ……………………………………… (231)
第九章　毛泽东艺术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245)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艺术哲学思想 ………………………………………… (245)
第二节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标志着毛泽东艺术哲学思想的形成 ………………………… (259)
第三节　毛泽东艺术哲学思想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展开和发展 ……………………… (270)
第十章　毛泽东在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 ………………………………………… (284)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的创立和发展 …… (284)
第二节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的运用和发展 …………………………………… (297)
第十一章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 (308)
第一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发展 ……………… (308)
第二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曲折发展 …………… (319)
第三节　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 …………… (328)
结束语

第一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条件

第一节 中国工农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任何先进的哲学思想体系的产生，都有丰厚的群众基础和深刻的阶级基础。离开了广大群众的意志、要求、愿望和斗争实践，哲学就不可能有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欧洲，是由于当时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需要。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总结和概括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综合了人类认识史上的积极成果，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着它的旺盛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有丰厚的群众基础和深刻的阶级基础，并指导着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

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之所以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重大贡献，也主要是由于他总结和概括了俄国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新的历史经

验。列宁虽然并没有创造一个新的哲学体系，但他的哲学思想科学地反映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广大群众的意志、要求和愿望。因此，列宁的哲学思想极大地充实、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是中国工农群众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统治历史的国家，经济文化极为落后。在封建社会后期，虽然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使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百年的中国近代史，就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采用“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地和殖民地”的历史。① “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② 这就是旧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最基本的社会历史条件。

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阶级基础一样，毛泽东哲学产生的阶级基础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兴起和壮大，是工农革命运动的不断高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产生了两个特殊的社会阶级即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的无产阶级。这是两个互相对立又互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89页。

相关联的阶级。但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而来的，而且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的。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力量也更广大些。这一点它明显地不同于欧洲各国无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近代无产阶级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一样，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完全崭新的劳动阶级，是新兴生产力的代表者。它既不同于与落后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劳动农民，也不同于各种手工业工人。它是与最先进的生产方式即大生产相联系的，因而它富于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性。概括起来，中国的无产阶级的特点是：第一，它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国民族中所罕见的，因此，它在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表现得最坚决、最彻底也就是必然的了；第二，它一开始走上革命政治舞台，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最有觉悟的阶级；第三，中国无产阶级人数虽然不多，但却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和一些大的工厂企业中，因而便于团结，利于战斗，易于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第四，它的成员大部分出身于破产的农民，与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于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正因为中国无产阶级有这些特点，所以它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断地进行着反抗中外资产阶级的斗争，并且在斗争中与广大农民结成了巩固的联盟。

纵观中国近代史，其中较为著名的无产阶级的斗争有：一八五八年香港的两万多工人举行了大罢工，反对英、法侵略军占

领广州，并全体回到广州；一八八五年，为了反对法国侵略中国，香港造船厂的工人拒绝给法国修理军舰，并举行了大罢工；一九〇六年，安源煤矿工人为反对资本家和封建把头的剥削和压迫，一万多工人举行了罢工；同年，六千多名安源煤矿工人参加了同盟会在萍乡、浏阳、醴陵发动的起义；一九一一年川汉铁路筑路工人配合资产阶级倡导的反对清政府“铁路国有化”的运动，举行了暴动；一九一三年，汉阳兵工厂工人，为反对以贬值的纸币发给工人工资而举行了罢工；一九一三年，北京邮政工人反对送信次数增多而举行罢工，一九一五年间，袁世凯在美日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接受了日本向他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并公然推翻民国，恢复君主制度，他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各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袁斗争。在反袁斗争中，工人阶级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情：上海码头工人最先举行罢工，散发传单，反对日本侵略和袁世凯卖国，并决定一致抵制日货；上海日商大阪公司和三井煤栈的中国工人，互相约定不给日本资本家做工；长沙日商经营的工厂和商店里的中国工人集会、罢工，宣传抵制日货。在全国人民的积极斗争下，“使得经过那时的卖国头子袁世凯签了字的对日屈服投降的条约二十一条，不得不宣告无效。”① 总之，随着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工人的罢工运动也随之迅速地发展起来。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九年五月的七年中，工人罢工达一百三十多次，相当于一八七〇年到一九一一年四十多年罢工次数的总和，而且罢工斗争的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具有反帝反封建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9页。

性质。这充分显示出了中国无产阶级是反帝反封建的最坚决的力量。

但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前的中国工人的罢工斗争，大多还是自发的经济斗争；即使是参加了政治性的斗争，也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活跃在历史的政治舞台上，而是作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因为那时的职工的罢工斗争，尚无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还不可能具有自觉性，当然也就谈不上有自己本阶级独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了。然而，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人们提出：中国无产阶级要胜利地进行斗争，完成历史赋予自己的使命，就要有本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精神武器。

中国无产阶级找到自己的精神武器是经历了复杂的曲折的过程的。众所周知，当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的欧洲已经成熟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正被西方强盗破门而入的落后的保守的封建国家。在以后中国逐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过程中，虽然经过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等一系列革命运动，从洪秀全到孙中山，许多先进的人们都向西方学习，寻找救国之道，然而都失败了。太平天国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洪秀全的反孔孟、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在后来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进分子中一般没有留下深刻的影响，屠夫曾国藩反而得到一部分人的赞赏和师法。康有为倡导和参加了维新变法运动，介绍了西方和日本的政治与文化，写了《大同书》；可是他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傀儡皇帝身上，以"帝师"自居，不能不随即成为忠实的保皇党和反对孙中山的急先锋。严复是系

统地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新文化的中国资产阶级最主要的启蒙思想家，然而他是当时改良主义者中最懦弱的一个，是一个困守书斋的空谈家，终于日趋反动。辛亥革命后，严复提倡尊孔读经，赞赏帝制复辟，晚年更为反动。义和团运动直接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证明中国的农民群众是反对帝国主义最伟大的力量；可是有人称它为"拳匪之乱"，看不到这个运动的根本意义，反而对帝国主义抱有种种幻想，对帝国主义的本质长期缺乏正确的认识。孙中山是伟大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杰出的代表。他长期往来于西方各国，在上世纪末并非没有机会探索马克思主义。但由于他自己的阶级局限，任意地对马克思主义作了错误的评价，又根本不认识中国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革命性。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可是由于没有强有力的革命思想作先导，因而也就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这个制度的基础和它的思想体系，终使辛亥革命归于失败。总之，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在半个多世纪之内，曾出现过农民革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这三种社会思潮，虽然事实证明它们都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但它们使中国的工人阶级认清了形势，看清了道路，在思想认识上迅速地成长起来。工人阶级的兴起和发展壮大，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才使得中国的无产阶级获得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了自己的精神武器问题。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中国革命的转折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教育了已经成长壮大起来并开始认识到自己历史使命的中国无产阶级。他们

"被这个潮流惊醒了"，"受到了深刻的影响和强烈的鼓舞"，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①于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和气魄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中充分显示出来了。

"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伟大转折点。"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由于孔子及其思想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有很深的影响，而又严重地束缚了革命人民的手脚，因此，在"五四"运动中，反孔与尊孔就成为"五四"运动新旧思想斗争的焦点之一。在这场伟大的革命风暴中，中国无产阶级以其战斗的姿态独立地登上了中国社会的政治舞台，并在斗争中显示出它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和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如果说在这以前中国无产阶级还是自发地进行经济斗争，而这一次则是自觉地进行政治斗争，显示出中国无产阶级已经成熟起来。"五四"运动，不仅在组织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且在思想上也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更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为以后产生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准备了条件。"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在这个结合的过程中，敌、我、友的阶级阵线越来越分明："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

① 参见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① 无产阶级革命和斗争的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阶级基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斗争的需要，是毛泽东哲学产生的阶级基础。没有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它在斗争中的需要，毛泽东哲学就产生不出来。中国无产阶级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最重要的客观条件。因此，毛泽东哲学思想只能是以中国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斗争的精神武器。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毛泽东曾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② 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并日益与中国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相结合，成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斗争的唯一的思想武器。

诚然，早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马克思及其社会主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9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1360页。

义学说就已经开始被介绍到中国。十九世纪末，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他们也把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学说作为一种学派介绍到中国来。一九〇二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十八号发表的《进化革命论者颉德之学说》就提到："麦喀士（即马克思），日耳曼国社会主义之泰斗也"。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四十二、四十三合刊号《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一文中又提到："麦喀士，社会主义之鼻祖，德国人，著述甚多。"虽然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主义者也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为将来世界最高尚美妙之主义"，但他们受自己阶级的局限，是不能理解其精神实质的，当然更不认为这种社会主义有在中国实现的可能性。他们只是客观的报道和介绍。尽管这种报道和介绍有极大的片面性，但它毕竟在中国知识界传播开来，为人们进一步研究它提供了方便条件。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动的时期，西方各国的社会思潮相继被"引进"。这时的中国思想界极为混乱。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上被"引进"来的，并逐步得到了传播。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一八九九年四月在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月刊第一、二、三卷上，由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文的题为《大同学》的文章中提到："试稽近世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偲（即马克思），主于资本者也"；一九〇三年九月，由中国达织译社翻译、《浙江潮》编辑所出版发行的日本幸德秋水所著的《社会主义精髓》一书中提到了"马尔克斯（即马克思）与其友音盖尔（即恩格斯）……"；一九〇三年上海广智书局翻译出版的日本人福井准造所著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的第二编，介绍了

德意志之社会主义，主要是介绍“加陆·马陆科斯（即马克思）及其主义”的；一九〇七年，世界社出版的《近世界六十名人》一书中，刊登了马克思一八七五年在英国伦敦拍摄的肖像。这是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前马克思及其思想在中国传播的简单情况。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尚未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当然更谈不到对马克思主义作进一步的研究了。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的失败也给人们以极大的启示。辛亥革命以后，先进的人们较前重视起马克思主义学说来了。特别是一九一五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出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青年》的出版标志着一个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启蒙运动的开始。它的创刊号十分鲜明地树起了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它以介绍西欧新思想，攻击中国旧思想为职志。它当时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的内容，虽然仍旧属于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及其所需要的自然科学范围，而且还不懂得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对待历史遗产，批判旧事物旧思想的方法还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方法。但是它跟过去维新派所提倡的新学已大不相同，而是站在新旧文化势不两立的立场上，主张彻底摧毁封建主义的“中学”，实现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代主张的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这种同几千年来统治人民的封建主义思想的彻底决裂，在中国广大知识青年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唤起了人们对国家命运的关心，促进了人们的民主主义觉悟，形成一个追求新知、追求真理的热潮。这是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思想文化革命，它为伟大的“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先导，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随之在中国这块大地上迅速而又广泛地传播开来，并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中国革命面目为之一新。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对各种主义、各种思潮进行比较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必然或迟或早地为人们所接受和掌握。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在我国思想界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代表，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独秀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是勇敢的彻底的，被人们看成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十月革命以前，他认为不论什么事物和观念，如果经理性和科学判定为不合乎现社会的，即令它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但是，他在各种资产阶级哲学流派面前，企图兼收并蓄。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多表现在自然观方面，社会历史观则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也偏于形式主义。十月革命以后，他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并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时期陈独秀曾被誉为中国“思想界的明星”① 这个评价虽然高了一点，但说明陈独秀在传播进步思想方面是有功绩的。在“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一起，以《新青年》为基本阵地，热情地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他在《谈政治》一文中，明确地表示了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革命的立场，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

① 参见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号。

一需要。”他多次撰文抨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政治统治，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并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并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但是，由于他始终没有认真改造自己旧的世界观，特别是背着“先觉哲人”自负的沉重包袱，使他根本看不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以致他不仅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反而在后来大革命的紧要关头，推行了一条完整的投降主义路线。

李大钊当时虽然没有陈独秀那样高的声誉，但是他的思想和言论在广大进步青年中也是很有影响的。他的《青春》、《今》、《新的、旧的》等著名文章中的辩证观点，对许多知识青年都是很有启示的。李大钊与陈独秀一样，同样相信过进化论，也多少受过托尔斯泰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等思想的影响。但是他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同时他也是一个革命的乐观主义者。《新青年》等刊物上登载的他的许多文章，除参加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外，特别针对一般知识分子的悲观情绪，着重宣传积极进取的人生观，热情歌颂新生力量必定战胜腐朽力量，指出中国正处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号召青年们以不断改造自己、追求进步的精神，冲破历史的一切罗网，为创造一个不断更新的青春的新国家而斗争。十月革命以后，李大钊转变为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积极地自觉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一九一八年李大钊

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热情赞扬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他鲜明地指出：“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① 又指出：“布尔什维主义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它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② 这就充分肯定了俄国人的道路，就是中国人民所应该走的道路。一九一九年李大钊又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影响极大；同时，他还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著作中的观点。这一时期，李大钊的著述甚多，比如《阶级竞争与互助》、《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再论问题与主义》、《由经济上解释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等等；此外他还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开设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现代政治》、《社会主义的将来》、《史学思想史》、《女权运动史》等课程。所有这些文章和课堂讲授，都具有比较鲜明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李大钊看来，客观物质世界是永无止境地在运动着、发展着；事物都处在矛盾对立的变化过程中，新的和旧的矛盾是“事物

---

① 参见：《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载于1918年7月1日《言治》季刊第三册。

② 参见：《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载于1918年11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

进化的机轴”；“旧的毁灭”和“新的再兴”就是宇宙变化的规律。他歌颂斗争，歌颂革命，要人们“勇敢奋进以赴之”、“断头流血以从之”。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在反封建、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实际斗争中形成的，是服从于革命斗争的实际任务的；他的彻底的辩证法思想，使他成为一个彻底的革命家，使他坚信革命必然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除陈独秀、李大钊之外，李达、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也都是我国最早最积极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他们都不同程度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作出了积极贡献。

比如，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五四”时期他还在日本学习，就积极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他先后译著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等书。这些著作在国内出版后，引起了知识界的广泛注意，影响了许多知识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理论家和革命家之一的蔡和森，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不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且“猛看猛译”了几十种马克思主义书籍，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并且系统地批判了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流派的错误观点。一九二一年蔡和森回国后，担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和《向导》周报主编，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工作中去，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瞿秋白也是较早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他在担任《新青年》主编期间，发表了不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大量地介绍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

经验，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农运动的结合。周恩来在“五四”运动时期，便积极从事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以他为主要领导人的革命青年组织“天津学生联合会”、“觉悟社”，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问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宣传运动。此外，在“五四”运动前后，北京的高君宇、张太雷、邓中夏；上海的陈望道、李启汉；江西的方志敏、袁玉冰；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施洋；湖南的何叔衡、彭璜、夏明翰；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广东的阮啸仙、彭湃；陕西的魏野畴、李子洲；在欧洲学习的赵世炎、陈延年、向警予、邓小平、陈毅、李富春、蔡畅、聂荣臻等等，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作出了积极贡献。正是由于这样一大批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积极活动，所以在“五四”运动以后才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工农群众运动很快地结合起来。

随着中国工农群众运动的不断深入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1920年5月以后陆续在全国各地建立起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前身。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以后，加强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于是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相继问世。1920年4月在上海出版了由陈望道翻译的第一个中文译本《共产党宣言》（全文），它成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指导思想。其他著作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自叙》（即初版序言）、《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即《反杜林论》第三编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从破坏历史的旧制度到创

造新制度》、《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全俄经济委员会的演说》、《俄罗斯的新问题》以及《国家与革命》、《伟大的创举》、《在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纲的报告》等书的部分内容也得到了翻译出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更加自觉地积极地抓好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也由大城市传播到中、小城市的广大知识青年中，甚至传播到厂矿企业集中的地方。特别是随着职工运动、农民运动的兴起，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的内在的因素。

“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兴起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有机统一，不仅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而且也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毛泽东哲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也就是说，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就不可能产生毛泽东哲学思想。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前提条件。

第三节　中华民族悠久的辩证思维传统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辩证思维传统，主要是古代朴素的辩证法。这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重要历史条件。

关于古代朴素辩证法的特点，毛泽东在他的《矛盾论》中作了简单的概述：“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

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①。这就明确指出了中国古代和外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的共同特点，即它的朴素性和直观性。然而中国古代的辩证法，第一，它往往是和朴素唯物主义相伴而出现的，在朴素辩证法里面包含着朴素的唯物主义，在朴素的唯物主义里也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但二者不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是直观的、笼统的；，第二，它往往与某一学科领域相联系，往往对某一个学科的专门知识进行概括和总结。如医家的辩证法，农家的辩证法、兵家的辩证法等等。当然，中华民族的这种辩证思维传统，到了近代，由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的光辉已被摧残得暗淡无光。但是到了现代，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的政治舞台，无产阶级先进的思想家，在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时，也对中华民族的辩证思维传统十分重视，进行了科学地挖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所以，要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就不能不对中华民族的辩证思维传统作一简要的分析。

（一）阴阳、五行说中包含的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阴阳、五行说，最早见于《周易》、《尚书》以及《诗经》等古代文化典籍中。其中阴阳说集中反映在《周易》里。《周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78页

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其中《易经》成书距今已三千多年了，可以说它是中国最早的哲学著作。

《周易》从人们经常接触到的自然界中选取了八种自然现象作为世界上一切事物产生的根源，这就是“八卦”所代表的八种物质，即天、地、火、水、雷、风、山、泽。八卦中每一对都是对立的，乾与坤、离与坎、震与巽、艮与兑之间的对立，反映了天与地、火与水、雷与风、山与泽这些物质现象的对立。其中最根本的是天和地的对立，即乾卦与坤卦的对立，从卦象上看，则是阴和阳的对立。阴阳就它本来意义上讲，阴就是山背太阳的一面，阳就是山向太阳的一面。《周易》上的这个阴阳，就不是这个含义了，它是把事物中代表积极的、进取的、刚强的、向上的特性、趋势、力量称为阳；把事物中代表消极的、退守的、柔弱的、向下的特性、趋势、力量称为阴，这就把阴阳变成了两个广泛的概念。《周易》认为整个世界就是在阴阳这两种对抗物质力量的运动和推移之下发生和发展的；任何事物发展的内在的原因，都是阴阳这两种物质势力相互对立的结果，这种阴阳对立是世界上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周易·系辞》上有一句话可作为这个规律的纲领性解释：“一阴一阳之谓道”，这就是说，世界上一切事物发展的内在原因都是阴阳这两种物质势力相互对立的结果。

《周易》中包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它认为自然界也与人和动物一样，是由两性（阴阳）产生的，并且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能不受阴阳总规律的制约；它认为世界上万物在阴阳两势力的推动、矛盾中产生、变化和发展着。它从交感的观点观察万物的动静变化，并认为有交感之象的是有前途的，是

符合事物发展的原则的，反之，就是没有前途的，是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原则的；它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是有阶段性的，即事物的变化由不显著到显著到深刻和剧烈，再发展到最后最高阶段，之后超过它最适宜的发展阶段，就带来相反的结果。也就是说，事物本来是有前途的，但过了它的极限，反而没有前途了。虽然《周易》带有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但它反映的哲学思想却是深刻的，其中，事物的对立统一性、相互转化和相互联系的思想更是如此。《周易》是我国悠久的辩证思维传统的源头，对后来的辩证思想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尚书》的《洪范篇》，最早提出“五行”学说，它把水、火、木、金、土五种基本物质，作为世界上万事万物产生的基本元素，并概括了这五种元素的特性：“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它还指出了五种元素间相生相克的辩证关系。相生即互相促进，滋生。例如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相克即互相排斥、克制。水克火，土克水，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五行”之间这些相生相克的辩证关系，是我们的祖先从生产实践和日常生活中直接观察到的大量现象中概括出来的。此外，在《尚书大传》中所蒐集的当时在劳动人民中所流行的“五行歌”，也是关于“五行”较早的记载。

阴阳、五行学说虽然最早见于《周易》、《尚书》，但这些记载都还不完备，后来随着实践的发展阴阳说和五行说又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充实。

（二）道家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春秋战国时代，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反映在思想上就是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的出现。在诸子百家的著作和言论中，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其中比较集中、比较系统的有“道家”、“兵家”和“农家”这三家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道家”的朴素辩证法思想集中反映在老子的《道德经》中。此书共八十一章五千言，篇幅不大，但内容极其丰富。

在《道德经》中，老子提出了一系列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矛盾概念。他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这就论证了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之间相反相成的关系。此外，他还提出了美丑、损益、刚柔、强弱、祸福、荣辱、智愚、巧拙、大小、生死、胜败、攻守、进退、静躁、轻重等既对立又统一的概念。这就比较统系地揭示出事物都是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关系。这些思想无疑是我们中华民族对客观世界认识深化的表现。

在《道德经》中，老子还看到了事物都向着相反方向转化的发展趋势。他说：“反者道之动”。认为事物的矛盾方面向相反方面转化就是“道”的运动。老子的“道”是一种主宰一切的客观精神，但它认为“道”也是不断运动变化的。他指出：“物壮则老”，“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还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等等。这些都说明了事物无不向它的对立面转化的道理。

在《道德经》中，老子还直观地看到了事物发展中由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的规律性。他指出："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还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些论述都生动地描述了事物的发展都是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发展过程。

在《道德经》中，老子还看到了当时社会的变革、国家的兴亡、个人富贵贫贱，都是不断变化的。他说，"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这就揭示了事物都有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

此外，《道德经》中还有不少军事辩证法思想。比如"柔弱胜刚强"的思想，运用在军事上就揭示了战争中强和弱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规律；再如"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主张，这在军事上是很有价值的战术原则；再如老子还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采取"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战术，迫使敌人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然后战而胜之，等等。

总之，老子的辩证法思想是相当丰富的、可贵的。它对后来的思想家有很深的影响。但是，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这份宝贵的历史遗产始终未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发挥。只是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这份历史遗产进行科学的分析，才使其充分发挥了作用。毛泽东在这方面，为我们作出了榜样。

（三）"兵家"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兵家"的朴素辩证法思想，集中反映在春秋末期孙武子

所著《孙子兵法》十三篇之中。这是一部兵书，里面有极其丰富的军事辩证法思想。这部书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影响极大。

《孙子兵法》虽然是专门讲军事战略的书，但它注意到战争与政治、经济、自然条件等方面的辩证关系。有极为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它把朴素的辩证法和朴素的唯物主义相结合，反映了战争本身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客观辩证运动。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又说"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这就是说，在战争中不仅要了解敌我双方的客观情况，即双方的兵力、士气、装备、指挥、后勤等战斗力的情况，还应了解天时（气候、季节等）、地利（地形、地物等）等自然环境的情况才能取胜。这些自然现象又是千变万化的，作战的双方应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来考虑其战略战术。他用水作比喻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故因敌变化而取胜，谓之神"。这就是说，"用兵如神"的关键是"因敌变化而取胜"。孙子认为战争过程中的千头万绪，变化迅速，所以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战争过程中各种矛盾。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矛盾范畴，如主客、众寡、强弱、攻守、进退、奇正、劳逸、治乱、虚实等，而这些对立面又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他论证了敌我双方优劣形势的相互转化的问题。他的"避实击虚"、"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战略战术，就是为了促成战势的转化的。《孙子兵法》很强调发挥战争中的主观能动作用，"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从而使敌由优势转为劣势，并消灭他们。按《孙子兵法》的说法这就是"要致人"而不要"致于

人”，要“能为敌之司命”。当然，《孙子兵法》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它的军事辩证法思想，虽然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但由于受到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它的军事辩证法，往往只是从军事领域来谈辩证法，还没有能提到整个世界观的高度来加以总结和概括；另外在战争中它还过份地强调将帅个人的作用，从而陷入了唯心史观。

（四）“农家”和“医家”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农家”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即古代朴素的农业辩证法思想，散见于《尚书》、《管子》和《吕氏春秋》等书中。《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中，记载了当时农业生产的情况，是总结战国以来农业生产的重要资料，过去叫这些书为“后稷书”。它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农业辩证法思想，其中包括：农业生产与“天时”的辩证关系；农业生产与土壤的辩证关系；农业生产与人力的辩证关系。这些朴素的农业辩证法思想强调要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处理好天时，地利和人力这三者的辩证关系，特别要着重处理好农业生产与人力的辩证关系，把人的因素摆在重要的位置。这些思想充分地反映了古代丰富的农业辩证法思想。

“医家”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主要见于《黄帝内经》一书。《黄帝内经》是唐朝王冰整理的，全书共三十卷。成书年代相传是从战国到秦汉，由很多学者陆续写成。《黄帝内经》的内容十分丰富，里面有许多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它把朴素的阴阳、五行说应用于医学领域，辩证地说明了人体生理结构的物质和生理功能相互之间的关系，并且运用五行说来说明人体各部位

的关系以及人体和自然界的关系。根据这些认识，中医认为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是由阴阳的相对平衡与协调决定的，如果失去其协调与平衡，则要发生疾病。这是朴素的唯物的辩证法观点。但它对这种从平衡到不平衡、从协调到不协调的转化的条件和斗争认识不足，因而不能准确地解决医学上的复杂问题。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农家”和“医家”的辩证法思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也是我们中华民族辩证思维的优秀传统的一部分。

（五）宋、明以来朴素的唯物的辩证法思想

宋、明以来，由于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有了新的发展，反映在主观认识上也有新的突破。在辩证思维上，由于吸取了以往的优秀成果，发展到较高水平，如王安石、张载、王夫之等人，把朴素辩证法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北宋王安石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是以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为基础的。他发挥了《尚书·洪范篇》的五行学说，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由这五种物质元素构成的，这五行本身又是运行不息的。他提出一切事物都“有耦”、“有对”的观点，认为任何事物本身都包含着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他还发挥了《老子》的“反者道之动”的思想，指出：“有所谓动者，动于反也”。这就是说事物的发展运动就是对立面向相反方向的转化。他还以木燃烧变火，木腐烂变土为例，强调了事物的转化的条件性。他还把发展看成是“新故相除”，即新东西

代替旧东西。

北宋张载从“太虚即气”的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出发，提出了“一物两体”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他的突出贡献在于说明了事物运动变化的内外因关系。他认为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动力是事物的内因，也即是天地间的一切变化都不外是阴阳二端的作用。在这里，张载对“两”和“一”的关系作了比较深刻的辩证的说明：“两”即“二端”，指阴阳两个对立面；“一”即“本一”，指对立面的统一。张载认为，“两”和“一”是相互依存的，如果没有对立的两面，就不会有统一体；反之，没有统一体，对立两面的相互作用就不存在了。这样，张载在当时生产和科学的水平上初步接触到了对立统一的辩证原理。他的辩证法思想较之前人更为深刻一些。

王夫之是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的集大成者。在古代哲学的各个方面，都超过了以往的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

王夫之的朴素辩证法是与朴素的唯物主义结合得很紧密的。他认为整个宇宙都是由物质元气构成的一种物质实体，“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并无他物……”，“道不离器”，气是本原的东西，理、道是由气所派生的。王夫之的朴素辩证法的思想，正是包含在他的唯物主义体系之中，因而得到更大的发挥。

王夫之从“太虚即气”的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出发，进一步指出对立面的相互作用引起事物的变化。“虚空即气，气则动者也”，说明太虚的元气本体的本性就是动的。而运动变化的源泉在哪里呢？他用阴阳二气对立统一的思想作了深入分析。指出了太虚元气包含了阴阳两个对立面，由于它们之间互

相摩荡而引起元气的运动变化。他提出了“唯异生感”的观点，即有对立然后才能产生交感，有了交感就产生了事物的运动变化，所以太虚元气能运动变化的根源在于阴阳两个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作用。王夫之还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孤立的事物，它们是既普遍联系又相互制约的。但是，他把事物的统一看作是绝对的，事物的对立看作是相对的，因而又陷入了形而上学。

王夫之还继承和发展了柳宗元的重“势”的进步社会历史观，他提出“理势合一”，即要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去探寻历史的规律。这是他超出柳宗元的地方。当然从总体上来分析，王夫之的历史观是唯心的，但这并不能泯灭他在唯物史观上的贡献。

到了近代，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发展起来的中国资产阶级，本身就先天不足，经济上软弱，政治上动摇，在思想文化上也极其贫乏，留给我们的东西非常有限。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在近代，与封建阶级旧文化相对立的资产阶级新文化，即所谓新学，基本上都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中间还夹杂不少中国封建主义的东西。“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①中国资产阶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57页。

级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搬来的武器，从哲学上看，是机械唯物论、进化论，当中也包含了一些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这一时期，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辩证法思想，其水平都是比较低的。这当然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在中华民族的辩证思维传统中，当然还包括在文学、艺术、音乐、书法、体育等等文化典籍中的宝贵精神财富。因为悠久的中华民族形成辩证思维传统并作为优秀的文化遗产一代一代地传下来，必然会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艺术等方面闪现出它的光辉。正是这些光辉的精神财富，才使我们的民族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方面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不可能脱离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当然更不可能脱离我们中华民族的辩证思维传统。也就是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相结合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植根于中华民族这块富于辩证思维传统的土壤上，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更加丰富，更加深化。

第四节　毛泽东本人勤于学习和躬行实践的精神

十月革命以前，毛泽东的世界观是比较复杂的。从孔孟儒家、宋明理学到王船山、颜习斋；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孙中山到陈独秀、李大钊；从赫胥黎的进化论、康德的

二元论到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的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以至托尔斯泰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他都有深浅不同的接触和研究。用毛泽东本人的话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成了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等观念的一种奇怪的混合物。”①这当然是当时中国所有最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的一种复杂状况。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候，毛泽东能够那样迅速地、彻底接受过来呢?能够在尔后的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并且在结合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理论见解呢？这除了上面各节讲到的中国特殊的国情这个客观条件以外，还与毛泽东本人的素质关系极大。也就是说，毛泽东本人的勤奋好学和勇于实践，使他具备了渊博的社会历史知识，而他的渊博的社会历史知识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下了改造中国的大志。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在知识的海洋里探索着。博览群书，勤于思索，是青少年时代毛泽东的最大特点。在十七岁前，毛泽东只接触过维新时期改良主义者的主张，曾把康有为、梁启超视为英雄。辛亥革命那年他才知道同盟会，便马上为同盟会的革命思想所吸引，并参加了革命的新军。在感觉到了辛亥革命的失败而退出新军继续自学生活时，他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曾经影响过维新时期改良主义者的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包括最具吸引力的进化论思想。一九一五年《新青年》出版后，

① 参见斯诺：《西行漫记》。

他受到这个刊物的影响，热烈拥护新文化运动，从而游泳于近代那些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中。后来更醉心于哲学的学习和研究，企图为自己、为中国寻找一条达到彻底改造的理想的彼岸的通道。毛泽东来到长沙以后，他在自学和作为学生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的这六、七年之中，他博览群书，博采众家之长，终于走完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之前许多向西方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的思想家所走过的路程。这正反映了近代中国先进人物探索救国救民真理过程是多么曲折复杂和艰巨啊！毛泽东本人在学生时代，经过勤奋的自学生活和艰苦的精神劳动所确定的思想发展方向，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和思想基础。

为了较好地掌握人类的科学文化知识，在湖南一师就读期间，毛泽东充分利用学校较好的学习条件，抓紧时间学习。每天，黎明即起，披着晨曦，进行体育锻炼之后便捧卷读书；晚上，别人就寝了，他还在走廊中、饮茶室等地方读书，直至深夜；课余时间，手不释卷，不尚空谈。他好学、好问，孜孜不倦地探索着知识的奥秘。

毛泽东阅读的范围十分广泛，古今各学派，中外各名著，都是他涉猎的对象。在他的笔记中，先秦哲学、楚辞、汉赋、《史记》、《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著作，都有涉及；在西方思想武库中，凡是他能得到的名篇名著，也都认真学习并作了笔记。毛泽东与他的朋友，当时主张多读新书，但旧书也要研究。这是针对当时一部分人的全盘西化的主张而提出来的。正如后来毛泽东在论及“五四”运动的缺点时指出：“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

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①在“五四”运动以前，进化论曾是进步思想界的主流，毛泽东当时也花了很大气力学习和研究过这方面的著作；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为了彻底反对封建主义，还必须研究封建主义的各种思想流派。这足见毛泽东的远见卓识。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中，坚持了科学与民主的旗帜，而且在“五四”运动之后，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而他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与他勤奋好学，掌握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具有很深的文化和思想修养分不开的。

毛泽东在青少年时酷爱读书，但他不是坐而论道的人。他从来把实践、行动看成是第一位的，而且逐渐从实践中悟出了知与行之间的正确关系。毛泽东同当时一般的先进知识分子截然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从学生时代起，总是想方设法多了解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十分重视同工农群众的联系，寻找机会接近他们、了解他们，虔诚地为他们办事，同时虚心地向他们学习。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利用两个暑假，同他的朋友到洞庭湖周围各县“游学”，了解各地社会经济文化和民间疾苦的真实情况，这决非偶然之举、平常之事。他在《讲堂录》中指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他还提出，不仅要读“有字之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89页。

书”，而且还要读“无字之书”。毛泽东出身于中国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自幼在农村生长，同农民一起在田间长年从事劳动，因而他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的社会历史知识和青少年时代的经历、实践活动，也帮助他逐渐认识清楚农民是中国历代“造反”之源。他在同工人接触的过程中，又了解到工人的一些生活状况以及罢工的原由。这是毛泽东后来能够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原因。徐特立在一次回忆中写到：“毛泽东同志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民主革命思想弥漫在学校里。他注意研究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他的结论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任何革命，若要成功，革命中的知识分子领袖必须同国内的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起来。第一次大战甫告结束，我邀他同往法国留学，他便是由于看到了这一点而拒绝我的邀请。他宁愿多增加一点关于本国的知识。”① 可见，毛泽东注重把理论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是他在学生时代就养成的一种优良品德。而这种品德正是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上作出贡献的重要的条件。

杨昌济是毛泽东所崇仰的师长。因此，杨昌济的追求新思想和躬行实践的精神，对毛泽东有很大影响。但毛泽东在学习上有明确的目的，他说：“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则终身无志”，“探求宇宙真理，改造哲学和改造中国旧思想，进而改造中国，改造世界。”这就是青年毛泽东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也是他在追求新思想方面与他的老师不同的地方。毛泽东还善于把学到的知识有意识地运用到实践中去，用

① 参见班威廉夫妇著：《新西行漫记》第十六章。

先进思想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和组织群众。这是他在躬行实践方面大大超过他的老师的地方。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上学时，利用暑假期间到农村去“游学”，就充分表现出他之所以高于当时一般先进知识分子，正是在于他注重实践。如果说渊博的知识为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文化基础，那么他注重实践、强调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则为他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五四”运动以前，青年毛泽东的社会历史观虽然还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还不懂得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但他不是空怀着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志愿，而是为此寻找一切机会去接触人民群众，接触各种社会实际。因而毛泽东一旦投入到现实的火热的政治斗争中，因此当有了十月革命的榜样，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阶级斗争的理论传到中国，便立即变成他思想中牢不可破的东西。事实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投身到伟大的工农群众运动中，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如周恩来指出的：“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四个阶段都是正确的，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正确方向的。开始的时候，党中央也好，一部分革命群众也好，常常自己弄错方向，迷失方向。但是毛主席的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大革命时期毛主席的主张是对的，但是没有被当时的领导上接受，十年内战时期他是对的，当时也有一些同志搞错了，没有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抗战时期，全党承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抗战成功了。到这次解放战争，更加证明其正确。”① 也就是说，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4—335页。

由于毛泽东在青少年时期就养成了勤于学习、勇于实践的优良品德，所以他投身到轰轰烈烈的伟大的工农群众运动中以后，既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又能最灵活地运用这些原则，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因而中国革命自从他参加领导以后，方向就一天天端正起来。他成为中国革命实践中指出真理、坚持真理、发展真理的带头人。

毛泽东还有一个从其青少年时期就养成的可贵的品德，这就是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十分注意集中和概括群众的智慧。这是他的思想深邃的重要原因。众所周知，“五四”运动时期，全国各地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进步社团很多，但几乎都是“五四”以后成立的。只有新民学会是在“五四”前一年多成立的，而酝酿时期还要早得多。在“五四”时期，这个团体的旗帜鲜明，战斗力强，组织巩固，发挥的作用也大。它为中国共产党湖南小组的建立作了一部分组织准备，并且“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①这个团体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革命活动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后，这个团体中的许多成员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小组。新民学会能够做到这样，究其原委，是同毛泽东的正确指导分不开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坚强的、善于听取别人意见又注意集中和概括大家智慧的、众望所归的领袖，就不可能形成这样一个革命的团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和组织群众的过程中，更是善于听取各种意见、集中群众智慧的典范。

① 参见斯诺：《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

在许多时候、许多问题上，他提出一种意见，是集中了广大群众智慧的，但是当别人不理解或不接受时，他就耐心的等待，不断和你商讨，再三再四地舌敝唇焦地给你讲、反复讲，同时在说服别人的过程中，注意吸收别人合理的因素，以补充和充实自己的意见，使自己的见解、意见更符合实际，更臻完善。我们说，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他的哲学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就是指他从前辈人那里，从同辈人那里，吸取了好的见解和意见，补充和充实了自己的见解和意见，然后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去加以检验，反复多次以后，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哲学的高度加以总结和概括。《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专著就是这样的产物，是对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理性认识。

总之，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出重要贡献，除了客观的历史条件以外，从主观上说，是与他本人的素质关系极大的。即他从青少年时就养成的勤于学习、善于思考问题，躬行实践又善于吸收别人意见和善于总结经验等优良品德。正是毛泽东本人具备了渊博的知识和优良的个人品德，所以他才能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中进行一系列的独创，形成中国特色的理论思维方式——毛泽东哲学思想。当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要有一个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实践中，是在同几次“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是在经过几次大的曲折和反复以后，逐渐形成的。因此，作为一种科学体系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它只能形成于三十年代末期，而不能在这之前，这也是由于主、客观条件决定的。

第二章

毛泽东的早期哲学思想

第一节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以前基本是一个唯心论者

在"五四"运动之前，由于青年毛泽东受到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影响，虽然他坚定地要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和理想，但是，他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

在青年毛泽东的现实生活中，由于他的政治理想、革命愿望同他的世界观常常发生矛盾，又促使他的世界观经常发生动荡。自发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在实践中得到萌生。但他的世界观的彻底转变还是在"五四"运动以后的事。

毛泽东在总结他"五四"运动之前的思想时，曾经指出过："我当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① 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讲堂录》、《体育之研究》、《〈伦理学原理〉

① 参见斯诺：《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

批语》等论文和读书笔记之中。其中，心物二元论是其哲学思想的主要特点。

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处于由唯心主义世界观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转变的前夕。青年毛泽东思想中的唯心主义主要来源于中国封建主义思想、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和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他在《讲堂录》中这样表述："孟子曰：体有贵贱，有大小，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一个之我，小我也；宇宙之我，大我也；一个之我，肉体之我也；宇宙之我，精神之我也。"即是说，物质之我是小我，精神之我才是大我，而大我是世界的本源、主宰。人们的行事必须遵照大我的意志。当然，这是唯心主义的见解。在社会历史观方面，青年毛泽东的唯心史观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长信中，较为详细地反映了他的唯心史观。信中首先谈到天下为何纷纷，以何道救天下的根本问题。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人们"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因而必须从"大本大源"即探求宇宙真理、改造哲学和改造中国旧思想着手。所以，他强调："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如此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并且，他还强调："今后只将全副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有不富强幸福者乎？"所以他认为，立志必先研究哲学和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之以为行为准则，不达目的，誓不休

止，方能谓之有志。只有对哲学深下工夫，日新月进，才能不盲从他人是非，有自己真正的主张。

毛泽东在后来与斯诺交谈时，谈到自己写过一篇《心之力》的文章，并受到他老师杨昌济的高度评价。现在我们已无法看到这篇文章，不过读毛泽东的《〈伦理学原理〉批语》一文，也可体味《心之力》这篇文章的思想。青年毛泽东对《伦理学原理》文中的一段话："国民益进化，则能采其过去之历史，以构成理想。而实则全世界文明历史之生活，乃皆观念之所辖也"，在《批语》中即予以肯定："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此外，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多次提到"精神不灭"。还写到："我即实在，实在即我，我有意识者也，即实在有意识者也，我有生活者也，即实在有生活者也。""观念即实在，实在即观念。"当然，我们认为，毛泽东之所以非常强调人心的作用，强调"大本大源"和改造哲学、伦理学的重要性，是和他救国救民的志向分不开的。他认为只有认识了真理，改造了人心，才会有国家和民族的改造。由于这时他还不可能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因此，只好从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和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的思想中去寻找"真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这种唯心主义观点，如此强调精神、哲学的作用，确是一个对社会有负责精神的思想家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经之路，不经过这条道路，倒很奇怪。距离物质基础越远的精神的东西，被看成是物质现象的内容和动力，在没有深入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以前，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没有摆脱这种唯心主义的羁绊，他们也走过了这样一段迂回然而必经的道路。

但也就在这一时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改造中国社会的志向促使青年毛泽东走向社会、走到人民之中去。青年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其思想也越来越激进，反对封建、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意志越来越坚定。也就是在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青年毛泽东的世界观发生了很大变化。表现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他提出了“物质不灭”的唯物主义思想。对于《伦理学原理》中提出的生死问题，他的批语是：“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有生必有死，即自然物有成必有毁之法则。”这显然是唯物主义的思想。

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上，他认为：“精神不灭物质不灭，即精神不生物质不生，既不灭何有生乎？”这是二元论的哲学观。但它比彻底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是前进了一步的。当然，这是青年毛泽东受鲍尔生的影响所致。《伦理学原理》一书为鲍尔生所著，而鲍尔生又是一位虔诚的康德主义者。这样《伦理学原理》一书当然贯穿着康德的二元论的哲学观点。正因为如此，青年毛泽东有这种二元论的哲学观，倒也是正常的。但青年毛泽东这时的哲学思想还有另一面，即他在研读《伦理学原理》时，又有重视经验和实践的思想，把人放入现实的生活之中，重视主观和客观的统一问题，并认为自我意识同物质世界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所以说，毛泽东在强调“精神不灭”的同时，强调了“物质不灭”。这在形式上虽是二元论，但对于“心灵本之自然”，“吾人之心灵限于观念，观念限于现象，现象限于实体”来说，毛泽东又把“实体”和“自然”同等看待，实已对实体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当然，在强调个性解放的问

题上，在关于人的社会性问题上，由于青年毛泽东所处社会条件和主观方面的局限性，他还不可能认识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而仍陷于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但是，我们要看到，由于他的经历和实践活动，他的世界观中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还是很突出的。比如，他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概念。在阐明体育和人的关系时，基于唯物主义思想，他说："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同时，在认识论上毛泽东也运用了唯物主义的原则。他说："夫知识之事，认识世间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于此有须于体者焉。直观则赖乎耳目，思索则赖乎脑筋，耳目脑筋之谓体，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故可谓间接从体育以得知识。"这些无疑是说人们认识世界、接受知识是以整个身体五官为物质基础的。

关于辩证法的思想，在青年毛泽东的世界观中，也有许多光辉之处。他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曾说过："吾尝梦想人智平等，人类皆为圣人，则一切法则皆可弃去，今已知决无此境矣。"① 这就是说毛泽东曾对社会问题存在着梦想，但随着青年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的认识，他很快就认识到这是不符合现实客观规律的，从而转向用辩证的思想看待世界。在《讲堂录》中，他写到："天下万事，万变不穷"，② 这是指万事万物都是在不断运动的。接下来他又写到："思生于

① 参见《〈伦理学原理〉批语》。

② 参见《讲堂录》。

害，害生于思”，[①]“夫善积而成者也，是故万里之程，一步所积，千尺之帛，一丝所积。差一步不能谓之万里，差一丝不能谓之千尺。”[②]显然，在这里青年毛泽东表达了辩证法的发展、转化和质量互变的思想。青年毛泽东在这时期还认识到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存在着差别的。他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指出："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别、比较而现。”由于他看到事物的差别，因此他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强调事物是对立统一的原则，事物运动变化就是由于矛盾对立的结果。青年毛泽东并没有就止于此，他还在考察矛盾普遍性的同时，对矛盾、差别产生的根源进行了初步考究，指出："差别只所以产生，生于有界限，为界域生活及人类其思想有限，其能力有限，其活动有限，对于客观界逐以思想能力活动所及之域而种种划分之，于是差别之世界成矣”。这显然是说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有自己的特点，客观世界是由千差万别的事物所构成的。在这一时期，青年毛泽东不但认识到宇宙间事物的发展和转化，而且认为这些事物都是在其发展中以对立、抵抗取胜的。他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有这样一段抒情的叙述："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这一段充满激情的对自然界的描写，恰道出了青年毛泽东在社会见识初开的思想和觉悟。这里，理论的深化，哲理的细腻，似乎触景生情地表达了他对旧中国黑暗统治的深恶痛绝，表达了他在变革现实社会的斗争中期望着革命风雨的洗刷，表达了他参加人民抵抗、革命的行列的决心。这里，

①② 参见《讲堂录》。

十月革命的榜样无疑增加了他胜利的信心，他已觉察到人民力量的宏大。

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上，青年毛泽东认为，人并不是自然界的奴隶，人可以改造自然。这是对的。但由于杨昌济老师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宋明理学的影响，青年毛泽东也经常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不免有时又陷入形而上学，这当然是他当时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必然反映。

总的来看，这个时期即“五四”运动之前，青年毛泽东的哲学观基本上是唯心的，但又含有众多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成分。对此，我们认为，毛泽东这一时期哲学思想之所以如此，其原因有三点：

第一，毛泽东当时年岁尚小，社会实践经验少，在校读书主要受杨昌济老师的影响，喜读中国文史哲方面的书籍，喜读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科学书籍，而这些书籍一般又是唯心主义的。这样，就使青年毛泽东的哲学观深受唯心主义的影响。

第二，青年毛泽东具有喜谈、爱交游、悦远涉的性格。因此，他也经常接触到一些现实生活，看到一些社会矛盾，特别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给人民带来的严重危害。这样，在他的头脑中又逐步形成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的萌芽。所以，这段时期，青年毛泽东在哲学观上有时就表现为二元论，即有时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矛盾、有时是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

第三，由于前两项原因，这个时期，青年毛泽东在政治上必然也就只能是一个朴素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正如他自己谈的：“在这个时期，我的思想是自由

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①当然，对于青年毛泽东来说，这些都无疑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不可避免的。

第二节 毛泽东在世界观转变时期的哲学见解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毛泽东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参加了这次伟大的革命运动，并且在运动中接触到社会实际，深入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之后，他又立即投入到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中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在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他的世界观得到了彻底改造，由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由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世界观转变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青年毛泽东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他开始有意识地以十月革命的经验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想考着

---

① 参见斯诺：《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

改造中国的各种复杂问题。这是他的世界观转变的开始。到一九二〇年底，由于先进理论的武装和社会实践经验的积累，毛泽东同各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实行了彻底的决裂。从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视为改造中国的唯一思想武器，使自己成为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

一九一八年底，毛泽东利用当时勤工俭学运动的机会，发动大批新民学会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这一运动，以便到国外学习先进思想。同时，他本人第一次来到北京。毛泽东在北京期间，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哲学会、新闻学会。还利用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机会，学习和研究了各种新的思想和学说，仔细了解和研究了十月革命的情况和经验。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泽东能够接触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有限，他只是一个可以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信仰并可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头脑中的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东西还占绝对的优势。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运动代表团第二次来到北京。这一次来京，他有机会阅读了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在京期间，他精心钻研和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原著。据毛泽东后来回忆，当时对他影响最大的，帮助他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三本书，除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外，还有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尔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他说："到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

者了。”① 这就是说，一九二〇年，是毛泽东从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从唯心主义者向辩证唯物主义者转变的关键的一年。而在一九二〇年前后，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行了三次大论战，对毛泽东的转变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三次大论战，一次是同胡适派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论战；一次是同研究系政客鼓吹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一次是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这三次论战的胜利，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对中国人民的觉醒，对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和很大的促进作用。毛泽东参加了这三次大论战，并在这三次大论战中逐步使自己的世界观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胡适在一九一九年七月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的思想在本质上是实用主义，他所宣扬的是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论，点滴进化的社会改良论和阶级调和的思想，并以此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他认为任何理论都是人们主观臆想的产物，而不是一定社会阶级利益的反映，以此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他主张“多研究些问题”，主张对中国社会实行一点一滴的改良，以此来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斗争。毛泽东在论战中抓住胡适派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中心问题，坚决站在马克思主义方面，强调在中国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极端重要性，鲜明地提出只有用彻底革命的手段，才能使黑暗的中国得

① 参见斯诺：《西行漫记》。

到改造。此后，毛泽东在分析“主义和问题”的关系时，明确提出了两者有不可分离的联系。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是统一的，特别是关于中国的出路这样重大的问题，必须有正确的理论即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才有所遵循。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给中国的社会改造问题指出了唯一正确的道路。他提出中国问题必须用革命的手段对它进行彻底的改造，并指出，决不能企图“改良其旧”，而必须立志“创造其新”。这表明毛泽东在这场论战中世界观发生了很大变化。

第二次论战是同研究系政客鼓吹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它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下半年到一九二〇年期间。这场进攻是由研究系的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发动的。他们一面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一面又伪装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他们提出中国的出路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反对建立中国共产党。这些反动的说教，理所当然地遭到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批判。之后，张东荪又提出基尔特社会主义，也就是行会社会主义。这是把国家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揉合在一起的一种改良主义理论，是欧美反马克思主义者“创造”的一种抵制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动理论。毛泽东坚决批判了这种反动理论。他说，回避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中国要得到彻底的改造，只有采取暴力革命。毛泽东指出，一切社会主义革命者，要看清中国的现实，现在无产阶级要求革命已成为客观的必然趋势，这个事实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俄国革命的成功，各国共产党的兴起，社会主义的胜利，“只是自然的结果”。中国必须走俄国人的路，用俄国人的手段，通过革命斗争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以

达到对中国黑暗社会的彻底改造。这就在理论上有力地回击了基尔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同时，毛泽东也阐明了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自己对于中国出路的见解，鲜明地表示了他的彻底革命的无产阶级立场。

继以上两次论战之后，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同无政府主义思潮又进行了尖锐的斗争。无政府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死敌，它反对最强烈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无政府主义者极力鼓吹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

毛泽东同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一道，对无政府主义展开了全面的批判，并进而展开了直接的斗争。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鲜明地指出：什么绝对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莫克拉西主义，都是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此，他一再强调必须采取革命的方法，走俄国革命的道路。

关于毛泽东在世界观转变时期的哲学见解，我们还可以从一九二〇年下半年毛泽东发表的文章和通信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一九二〇年春天，毛泽东在上海时，就同彭璜等人研究过将来驱逐张敬尧以后，如何使湖南朝着有利于革命方面发展的问题。并草拟了《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一文，提出建设湖南的蓝图。在这期间，毛泽东和彭璜、何叔衡等人，邀集了一批新闻界、教育界人士，发起组织了《湖南改造促进会》，并于六月二十八日在上海《申报》上发表了《对湖南改造之主张》的公开信。提出，湖南自治运动，就是要人民当家作主来创造文明的运动。此后，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许多评论文章。他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以人民的利益为依

归，批判各种错误意见，进一步阐明了湖南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自治运动。针对谭延闿、赵恒惕之流鼓吹的“湘人治湘”的口号，毛泽东在《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一文中，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谭、赵之流进行了彻底的揭露。他针对社会上有人企图由官绅包办自治运动的情况，毛泽东提出，自治运动应该以“民”为主体，即以种田的农人，做工的工人，从事贸易的商人以及努力向学的学生等为主体。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何为将来社会主人的思想。毛泽东还在《释疑》这篇文章中指出：“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理”。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政治易位，法律改观。从前的政治法律，现在一点都不中用。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毛泽东号召人民起来，过问政治法律，过问国家大事。他还主张工人、农民、商人、学生、教员、兵士、警察、乞丐、妇女都要有发言权。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将来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前途及民主政治的内容问题。这些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的。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深入地研究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认为必须从事根本改造中国的计划与组织工作。毛泽东和蔡和森之间，于一九二〇年八月至一九二一年初先后通过四封信，深入地交换过意见。这些意见反映了他们对于创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已经酝酿成熟，对于中国革命的道路已有一个明晰的设想。

一九二〇年八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我认为（这是）现世界革命唯一制胜的

方法。”他在九月给毛泽东的另一封信中说：“研究学问，宜先把唯理观与唯物观分个清楚，才不致堕入迷阵。”而“修正派改良派（即染了有产阶级唯理主义的毒的考茨基、伯恩斯坦）等好胆大，又把中产阶级的唯理主义拿来驳唯物史观，为资本家寻找劳资调和的方法，故他们最终的结果，主张改良而不主张革命。”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的信中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并且，对于“倾向于无政府（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比较和而缓”的观点，“不表同意”；而对于蔡和森“用俄式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赞成马克思的方法”，“表示深切的赞同”。这说明，青年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上，已完全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已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立场上了。但是，毛泽东全面而深刻地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并进一步阐述了他给蔡和森信的观点，是在一九二一年元月新民学会的新年大会上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指出：“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①

总之，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的思想，人民革命的思想，无产

① 参见《新民学会会务报告》。

阶级和劳动人民联合起来实现人民管理国家的思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等等思想，都是通过和工人、农民结合而得来的，是通过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排除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而得来的。这些理论的提出，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结果；另一方面是毛泽东在中国人民革命实践基础上，使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有了中国革命的特色。这就说明，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发展，毛泽东对其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和理论概括而得出来的。当然，作为一种科学体系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要有一个过程，要有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积累。但是，毛泽东在世界观转变时期能够提出一些符合中国实际的、唯物主义的见解，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他后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上作出重大贡献的思想基础。

第三节　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哲学思想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她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到进一步地广泛地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农群众运动相结合，就使得中国革命的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巨大变化。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在这种有利的革命形势下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即他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国化方面迈出了很大的一步。这一时期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的著作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光辉。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毛泽东主要是从事工人运动。他在湖南参加并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长沙泥木工人、水口山工人等十余次的罢工斗争。虽然这些罢工斗争都失败了，但是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充分说明了它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是中国新生的希望所在。在斗争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工人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深深地思索着中国革命的道路、战略和策略等问题。这时，由于毛泽东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不是从自己头脑的想象出发，也不是从书本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和反映事物质的规定性。毛泽东根据历次工人罢工斗争失败的教训，认识到无产阶级要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彻底的胜利，单靠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这个见解和认识同列宁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意见是一致的。列宁在一九二〇年七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革命中无产阶级要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作了指示，并特别提出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左派结成联盟。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认为国民党中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左派是要革命的。所以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出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一九二三年四月，毛泽东曾明确提出：要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党必须联合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力量，结成一个革命联

盟。一九二三年七月，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左”倾关门主义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正确地分析了国共两党在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基础上,实行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强调，在合作中共产党必须保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必须牢牢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大贡献。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和共产党携手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毛泽东、李大钊、瞿秋白、林伯渠等共产党人出席了大会，并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大会正式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封建的主张，并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国共两党的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就使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进入了一个革命高潮时期。但是随着革命的日益深入，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分化越来越明显。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逝世后，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国民党右派，加紧了争夺领导权的反革命活动。十一月国民党一小撮老右派形成“西山会议派”，公开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破坏统一战线。与此同时,国民党中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伪装革命，伺机叛变革命。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和五月蒋介石策划了反革命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事件。这是两起打击中国共产党、篡夺领导权的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内部围绕着统一战线中领导权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在一九二五年二月针对国民党右派势力破坏革命和统一战线的事实，就在《少年中国学会改组

委员会调查表》中明确提出，国民党右派是国民革命要打倒的对象。十二月，毛泽东又在他主编的《政治周报》中指出，资产阶级右派正是基于他们的阶级本性，必然要从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但这并不能阻挠中国革命的发展。只要我们坚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坚决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就能促进革命派的大团结，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未被当时的党中央采纳。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政策，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与陈独秀右倾退让的同时，党内还有张国焘的只要工人、不要农民，实质上是取消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左"倾机会主义论调。这就提出，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中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怎样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深入地了解和研究了农民运动的经验和教训。他从中国工人运动经验教训中，也从中国农民运动的经验教训中，分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问题。为此，他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两篇光辉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早期的两篇重要著作，它充满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初步尝试，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中国社会各阶级实际状况的重大理论成果。它为我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路线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文中，毛泽东唯物地、辩证地分析、研究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态度，从而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根本观点。

第一，它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从而把这一原理具体化。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开宗明义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① "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②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它代表中国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它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一方面，它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反军阀的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到威胁时，它又怀疑革命。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等等，都是小生产经济的代表者。由于帝国主义、封建地主、资产阶级买办对它的压迫和剥削，这使它可以同情和参加革命。半无产阶级是较之小资产阶级更加细小的小生产经济的代表者，"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③他们极易接受革命宣传，"需要一个变革现状的革命。"④ 无产阶级数量虽不多，"却是中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页。

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①毛泽东从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出发，分析他们所代表的生产关系，从而科学地得出了他们的政治思想的归属，找到了他们对中国革命态度各不相同的根本原因。这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同时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丰富。

第二，运用和丰富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时，不但考察了各阶级自身同周围其他阶级的联系，而且考察了各阶级同国外阶级的联系，从而判断这些阶级对待革命的态度。文中在分析中国每一个阶级时，又考察了它在不同的革命阶段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也是很有特色的，从矛盾的普遍性认识它，是一个剥削阶级，有是革命对象的一面；从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它，它又是一个受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大资产阶级压迫剥削的阶级，因此它又是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这是毛泽东把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运用于中国社会实际的光辉范例。

第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运用和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和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确认出谁是人民，谁是敌人，从而使无产阶级能团结最广大的农民、小资产阶级及一定条件下能参加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着中国社会里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页。

最反动的敌人展开斗争。由此，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创造新的社会制度。

总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得出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①这个结论实际上已经奠定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根本思想。其实质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闹革命，以解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是毛泽东于一九二七年一、二月间，亲赴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村考察了三十二天，二月二十六日给党中央写了报告。随后，他写了此考察报告，于同年三月五日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周刊上公开发表。十二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第一九一期登载了这篇考察报告的前半部分，由于当时主管中央宣传工作的彭述之的压制，这篇考察报告没有得到继续刊登。

一九二六年下半年，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迅猛发展，从根本上动摇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基础，地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页。

主豪绅、国民党右派和北伐军中的反动军官，对农民运动又怕又恨。他们诬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民运动”、“糟得很！”各地反动派普遍利用地主武装，捣毁农会，残杀农会干部，甚至进行反革命暴乱。一时间，反对农民运动的反革命潮流汹涌而来。那些动摇不定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也跟在反动派后面，叫嚷农民运动“过火”。各阶级围绕着农民运动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也指责农民运动“过火”了。陈独秀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的党中央汉口特别会议上，完全否定当时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必要性。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决议案》，提出不能以是否赞成农民土地问题来作为划分在国民党中是否为左派的标准。毛泽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热情讴歌了当时轰轰烈烈开展的农民革命运动。毛泽东指出，回到湖南，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情况。听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的报告，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这就是说一切革命的同志不能主观听信反动派的胡言，应深入实际，从实际出发，进行调查研究，才能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即当时中国兴起的农民运动是埋葬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伟大革命。它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它不是“过火”，而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逼出来的；它不是“痞子运动”、“惰民运动”，而是农民成就了几千年来未曾成就过的革命奇勋。毛

泽东的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从而申明了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这一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指出，“‘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结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① 对于农民运动的不同态度和不同结论，完全是由于不同的阶级所处的不同经济地位而决定的。这是毛泽东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后，熟练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基本原理的例证。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还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农民运动，是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权力的革命，这是非常之需要的。在革命斗争中，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建立农会政权，在共产党领导下，推进革命直至胜利。在革命中，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使农民的神权思想动摇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随着农民权力的升涨动摇了。毛泽东还指出了神权及一切封建的宗法思想和宗法制度的完全被推翻，有待于农民经济斗争的完全胜利。在这里他指出了消灭宗教迷信的具体途径，并且包含着对农民进行唯物主义教育的思想。

毛泽东还指出，农民运动推翻封建势力，是中国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这一农民革命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而兴起的，其势如暴风骤雨，无论什么力量都将压抑不住。毛泽东高度赞扬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页。

了这一伟大的创造力，并由此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

总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范例，是毛泽东运用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初步探索的重大成果。

第四节　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哲学思想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中，由于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极为丰富，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也向着系统化方面发展。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国内外的反动势力暂时结成反革命联盟，全国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革命的路应该怎样走？怎样才能把革命引向彻底胜利？这是摆在每个共产党人面前必须思索和回答的问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党中央没有采纳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而招致革命的失败。在新的历史阶段中，陈独秀虽然下台了，但新的党中央能否制定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仍应经过实践的检验。实践证明，新的党中央仍然没有解决好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因而他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及其组织路线是主观主

义的。在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毛泽东独树一帜，他在领导了秋收起义以后，就把队伍带到了井冈山，在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以积蓄革命力量，从农村包围城市，逐步夺取全国胜利。这不仅在实践上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而且在理论上也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这一个时期，毛泽东写了许多著作，都生动而具体地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思想，并且很有中国特色。这说明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我们所以把这一时期的著作仍然称为毛泽东的早期哲学思想，主要是因为毛泽东的哲学专著还没有产生，因而作为一种具有科学体系的完备理论形态的哲学还没有形成。实际上，后来毛泽东在《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阐述和发挥的许多思想在这一个时期已经形成，只是没有系统化罢了。因为在后面的许多章节中，都还会提到这个时期的哲学见解，因而在这里只能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一个简单的分析和概括。

第一，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分析和论述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客观发展规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从而分析和论述了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发展规律，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列宁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分析和论述了帝国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理论，并且亲自领导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

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在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为指导，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不能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的思想，而只能“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藉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① 这就是说中国革命必须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社会的矛盾不仅同欧美国家不同，而且同俄国也不同，它是一个经济十分落后而又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② 给中国人民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带来了灾难。同时这种情况也就决定了农村是反动阶级统治比较薄弱的地方。而正是在这些统治阶级统治薄弱的地区，有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着他们有很强烈的革命积极性。只要共产党人在这些地区向农民作宣传，使他们提高阶级觉悟，他们就可以成为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毛泽东以他对中国社会各种矛盾问题的深刻见解，指出了中国革命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

暴力革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在中国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9页。

怎样进行暴力革命？怎样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夺取全国政权？这就要分析中国社会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透彻地分析了中国进行暴力革命、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战略和策略等问题。他开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他从理论上论述和分析的井冈山等根据地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也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宝库。可以说，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第二，在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斗争极端残酷和复杂。在反动势力的围剿中，中国共产党内和革命队伍中出现了两种错误的倾向：一种是"左"倾教条主义，一种是右倾投降主义。这两种倾向都是主观主义的表现。因此不反对主观主义，革命就不能发展。在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不仅注意分析主观主义产生的阶级根源，而且特别注意分析产生主观主义的认识论上的根源，以教育全党从理论的高度认识主观主义的危害性。

在毛泽东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初，"左"右倾机会主义就已经抬头。右倾机会主义者怀疑"红旗到底打多久"，散布悲观失望的论调。毛泽东针对这种论调从理论上进行了批驳，明确指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新生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左"倾盲动主义者不承认敌强我弱这个基本事

实，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要红军攻打大城市，结果使革命遭到重大损失。毛泽东针对这种“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特别强调在农村积蓄革命力量、壮大人民武装的重要性，特别强调实事求是的分析敌、我、友力量对比的重要性。这就是要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由于毛泽东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地同主观主义作斗争，促使革命的形势很快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天天在扩大，人民武装力量一天天在壮大。但是在胜利面前中国共产党内一部分人的骄傲情绪又滋生起来，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敌人的力量。特别是在粉碎敌人三次围剿以后，“左”倾教条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情绪几乎笼罩全党，错误的论调和意见占了绝对的上风。以王明为代表的党中央执行了一条错误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危害了全党，危害了革命。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充分暴露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性。在“左”倾和右倾错误刚一抬头的时候，特别在“左”倾教条主义横行起来的时候，毛泽东最早发现了它的危害性，就谆谆告诫同志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在这个时期他写的许多著作，虽然也批评了经验主义的错误，但他重点批评的是那种看轻实践、忽视调查研究、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比如，他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都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之间的辩证关系。这就从认识论的高度分析了主观主义产生的根源。后来毛泽东又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进一步展开和发挥了这些思想，形成完整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学说。

第三，以矛盾转化的原理，分析和论述了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中实行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化为实际工作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就比较注意的一个问题。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更加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去指导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的实践，以此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引起了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民族矛盾上升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毛泽东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矛盾转化的原理，重新提出了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思想，并阐述了它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内还有不少人看不到这种阶级关系之间的新变化，反对同非主要敌人联合的“左”倾关门主义的情绪，还相当严重地存在着。这种“左”倾关门主义除了有它的阶级根源以外，主要是一部分同志的思想不能随着时局变化而变化，思想陷于僵化。本来，客观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矛盾也是在不断转化着。人们要想使自己的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就得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然而“左”倾关门主义者不懂得这个道理。为了帮助这部分同志提高认识，毛泽东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专门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一文，系统地论述了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后引起的各阶级之间的变化情况、矛盾的转化情况以及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同时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以及“左”倾关门主义的危害性。他

提出：“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是变中国为殖民地；我们的任务，是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①“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②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中，不仅包括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包括一部分暂时不反对革命的地主买办阶级。

毛泽东运用矛盾转化的原理，分析了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以后的各种矛盾问题。由于这种分析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情况，因而以此为理论依据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也是正确的、科学的。毛泽东把矛盾转化思想具体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重大贡献。在《矛盾论》里他又对矛盾转化问题作了专门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学说。

总而言之，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通过不断地总结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的实践经验，通过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各种错误观点，对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哲学概括，从而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得到充实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否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1页。

则它的生命也就停止了。但是，在中国这个特殊国情的国家，怎样革命，怎样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夺取全国政权，这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新的探索，光靠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知识是不行的。毛泽东正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理论上的探索，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扎下了根。这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抗日战争开始不久，毛泽东又进一步全面地总结了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的实践经验，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著作。特别是《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已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

第三章

毛泽东的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的形成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旧认识论学说的根本改造

在人类的认识史上，围绕着什么是正确的认识，怎样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一直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回答。在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认为，人的正确认识是人先天就固有的"理念"，人就靠"回忆"这种"理念"来得到正确的认识；与此相反，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则认为，人的正确认识是人脑对外界事物的反映，人靠从外部世界得到的"影象"来认识事物，把握真理。这就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认识观。这两种对立的认识观以不同的具体形式，斗争和辩论了两千多年。到了近代德国，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集以往认识论上的各派观点之大成，分别形成了比较系统、比较完备的认识论学说。黑格尔认识论学说的出发点是："精神、思想、观念是本原的东西，而现实世界只是观念的摹写。"① 黑格尔的认识论学说是从"绝对精神"出发，经过一系列的外化，外化为自然界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9页。

人类社会，再回到它自身，最终达到“绝对精神”的完全自我认识，从而取得绝对真理而结束。在黑格尔看来，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思维能够认识那一开始就已经是思想内容的内容”。[①]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观。这种对认识内容和认识过程的黑白颠倒的解释，必然会受到唯物主义者的批判。费尔巴哈就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尖锐地批判了黑格尔的认识论学说。他指出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只是表示思维与自身同一”，[②]是把思维与存在变成毫无差别的精神的东西。他认为，“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关系只是这样的：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③]这样，费尔巴哈就正确地解决了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他以此为前提，正确地回答了人的认识只能是对客观外界的反映。但是，再前进一步，问到人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费尔巴哈的答案就不正确了。他认为，“意识是一面镜子”，意识对物质的反映就象镜子照物一样。他说，“自然界并不让自己躲藏起来，它反而是尽力地自荐于人，或者可以说老着脸去迁就人的。恰象空气通过我们的口、鼻以及一切毛孔，挤进我们身内来一般。”[④]这充分反映出费尔巴哈关于认识论问题上的直观性质。在费尔巴哈看来，主观和客观之间，无须任何中介，可直接发生关系。这就阻塞了他正确地揭示人的认识产生和发展的道路，更不用说科学地解决怎样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了。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

②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54页。

③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15页。

④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630页。

究竟人的认识是怎样开始发生，又怎样向前发展，真理是怎么获得的，又用什么加以检验，等等，费尔巴哈统统不能给予正确的回答。

造成费尔巴哈认识论学说的这种局限性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呢？最根本的、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由于他不懂得实践及其在人们认识中的作用。而这一点又是同他的阶级局限性密切相关的。费尔巴哈作为当时德国软弱的资产阶级的哲学家，他鄙视实践，把实践看成“卑污的犹太人的活动”。他认为只有理论活动才是圣洁的、崇高的。所以，尽管他对人类的认识论学说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他始终没有把认识论学说引向真正科学的大道。

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论学说之所以超出费尔巴哈，并创立了完全崭新的、科学的认识论学说，不在于他们比费尔巴哈有多么高超的思维才能，当然这一点也不能忽视，但最主要的、也是最根本的是他们亲自参加了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践，并通过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使他们找到了“历史之谜的真正解答”，即用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来使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联结起来，合理地把全部世界史理解为一个人通过生产活动而自我创造的过程，理解为一个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产过程，从而确定了人类实践活动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第一点。其次，通过实践，使他们发现了人的感觉能力形成和发展的秘密，即人感知外部世界的能力，依赖于劳动，随着劳动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劳动的发展而发展。再次，通过实践使他们进一步发现了理论与实践本来是应该统一的而不应该割裂的原则，从而把“真正的实践”看作是“现实和实证的理论

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实践引入认识论，这就科学地解决了在哲学史上长期争论而得不到正确答案的一个关键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认识过程中实践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是人类认识史上的根本变革。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认识论学说就是能动的反映论。当然，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学说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在长期的理论和实践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解决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问题而创立了唯物史观，而创立唯物史观的关键是解决生产活动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由此，马克思对从青年黑格尔派那里接受来的“实践”观点发生了动摇并有了决定性的转变。他通过自己的观察开始把生产活动看作是实践的基本内容。以此类推，逐步形成了他的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的观点，从而完成了人类认识论学说的根本变革。概括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对旧认识论学说的根本改造，其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解决主、客观矛盾的基础是实践。

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是经常发生的。因此，寻求它的解决是哲学家们经常的一个课题，或者说它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哲学基本问题的正确解决，是和把实践观点引入认识论分不开的。唯心主义者和旧唯物主义者之所以不能科学地解决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关键在于他们不懂得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积极意义。唯心主义者脱离物质基础而抽象地谈主观能动作用，无限夸大意识的能动作用；而旧唯物主义者则抹煞主观的能动作

用，把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绝对化，从而陷入消极被动的反映论。这两种认识观都不符合客观实际。人类的历史表明，无论是主观对客观的改造，还是主观对客观的认识过程，都必须通过社会实践这个中介。也就是说，人们的认识，只有通过实践，客观才能反映到主观中来；也只有通过实践，主观才能见之于客观。社会实践是使物质和精神、主观和客观这个矛盾解决的基础，也是使这个矛盾在运动中不断达到相对统一的基础。因此，不理解实践，就不能正确理解物质和精神、主观和客观的辩证关系。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充分暴露了唯心主义的根本错误和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抓住了这一认识论的要害问题，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学说进行了批判。他们在许多论著中都精辟地分析了这个问题，从而使人们从理论上划清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心主义认识论以及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界限。

第二，使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底的是实践。

旧唯物主义者虽然在认识论中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原则，但由于他们看轻实践的作用，所以他们不可能把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底。费尔巴哈就认为，“直观是生活的原则”，“主体和对象的同一性，……只有在人对人的感性直观之中，才是真理和实在。”①这是消极的直观反映论。这种消极的直观反映论，不可能彻底驳倒唯心主义的谬论。唯心主义者就曾利用旧唯物主义的这种缺陷攻击唯物主义反映论说：“譬如墙上的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11页，第172页。

钟，我们闭了眼睛可以想象钟的模样，那还可以说是一种摹本。但是我们心里起的钟的作用的观念，也是摹本吗？摹的是什么呢？又如我们说钟的发条有弹性这个观念摹的又是什么呢？这就可见一切不能有摹本的意象，那'和实在相符合'一句话又怎么能说呢？"①这是唯心主义哲学家詹姆士的质问。对于这样的质问，单用直观反映论的观点是无法回答的。因为它没有能力解决理性认识为什么是客观实在的反映这个问题。所以，直观反映论不可能把"思想反映对象"的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底。

可是詹姆士的这个质问，对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说，就不是什么难题。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把实践作为认识的来源，强调人们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对外界事物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看来，尽管我们凭借对钟的直观无法得到钟的用处和发条有弹性的观念，但是人们却能够通过实践，在和钟的直接接触中，逐步得到对于钟的用处和发条有弹性的认识，并根据这种认识把它制造出来证明这个认识是正确的。那末，这是否就改变了钟的用处和发条有弹性的客观实在性呢？丝毫也没有。因为，我们头脑中关于钟的用处和发条有弹性的观念，正是钟的这些客观属性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只不过是我们把这些在实践中所得到的认识用抽象思维的力量来加以把握罢了。这就说明，使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底的是社会实践。也正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实践观点引进认识论，才真正驳倒了唯心主义者的种种责难，在认识论中彻底坚

① 转引《胡适文存》第2卷，第98页。

持了“思想反映对象”这个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

第三，认识论中的实践观点导致了认识论和辩证法的一致性。

在黑格尔关于主体和客体的发展公式中，包含着合理的辩证法思想。这突出表现在他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理解成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但是，再前进一步，要求他在现实的基础上把主体和客体统一起来的时候，他终究没有牺牲他整个唯心主义体系的勇气。因此黑格尔只能在“绝对精神”里面把它们抽象地统一起来。这样一来，他的辩证法只是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即在精神发展的领域内才能够和认识论是同一的。这种认识上的辩证法不能拿来认识现实事物，因为现实本身在这里已经从主、客体的关系中消失了。主体运动的辩证法变成了目的本身，而不再是获得关于现实对象的新的知识的方法和探求真理的手段。所以黑格尔的“同一”，不过是孤零零的、不结果实的、抽象的同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实践观点来改造黑格尔的主体与客体的发展公式。指出，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的途径，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的力量，才是可能的。这就是说，要把实践而不是思想作为主体与客体统一的基础，在实践的基础上把主体和客体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统一起来。这样，对主体和客体辩证发展过程的全部解释就从唯心主义的形式下解放了出来，站在了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不仅保存了主体的全部能动性、创造性，而且通过实践使这种能动性、创造性在客体上表现出来。同时，主体和客体的积极的相互作用也就得到了现实的感性的肯定。这种以实践为基础的

主体和客体的辩证运动过程，就是人类现实认识的运动过程本身，就是人类认识发展史的缩影。它展现了人类认识发展的无限的辩证过程，揭示了人类认识发展的辩证规律。而基于实践基础上的人类的认识也就合理地被理解为是一个按其自身规律向前发展的无限的辩证过程。这样，就深刻地反映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内在的一致性。从而辩证法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第四，实践观点规定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本质。

长期以来，对认识论的本质问题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历代的哲学家都否定实践，不懂得实践的重要性，所以他们都把认识论仅仅看作是说明世界的工具；至于改造世界，他们认为是与认识论毫不相关的。当着实践观点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引入认识论以后，认识论的使命在本质上就发生了突变。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人们认识世界，仅仅是为了改造世界。所以认识论的真正的重要任务不单在于要求对客观现象的原因给以科学的解释，而更重要的在于能够依据这种科学的解释去能动地改变现存世界。也就是说，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不只是提供获得新知识的方法和探求客观真理的手段，更重要的是运用这一方法和手段，使之成为改造世界的一种精神武器。实践观点所赋予认识论的这个批判的革命的性质，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本质所在。

总而言之，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实践观点引入认识论之后，第一次使认识论具有了科学的意义，把认识论变成了研究人的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从这个意义讲，实践性就成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最基本特征。这不仅意味着它对一切既成的思想理论观点都要采取一种革命的批判态度，而且意味着马克

思主义理论本身并没有穷尽真理，对它也要采取一种不断推进的态度。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这个认识论的最基本特征，更加明确地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他结合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又加以充实、丰富和提高，使它更臻完备。毛泽东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并没有又去创造一个新的认识论体系，因为这个体系早已完成。他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特征出发，把它应用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过程中，加以充实和提高，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第二节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学说进行了新的探索

以实践观点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体系，虽然形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尔后又经过列宁和斯大林的发展，使它臻于完备和成熟。但把它应用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并取得革命的胜利，必然会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的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一般原理和原则，不可能解决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的实际问题。甚至会把事情搞糟。因此，要解决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中的实际问题，就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新经验，并对这些新经验不断地进行理论上的概括。毛泽东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学说。

毛泽东在一九二〇年夏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后，就初步掌握了认识问题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他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两篇文章，就体现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思想。

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几经曲折，毛泽东等人创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开创了一条夺取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给全国人民带来了胜利的希望。但是，有人对这条道路表示怀疑，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问题。为了从理论上批驳这种教条式的、悲观的论点，毛泽东于一九二八年十月至一九三〇年一月，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具体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他从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这个事实出发，从中国的反革命营垒内部不统一和充满着矛盾这个事实出发，认为：（一）许多农村小块革命根据地能够在反革命政权的包围下发生、坚持和波浪式地向前扩大；（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和革命根据地，是我国民主革命中工农联盟的主要形式，是我国无产阶级领导全国人民争取解放的主要斗争形式；（三）革命根据地是中国人民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伟大革命阵地，革命人民就是依靠这样的根据地，来打击反革命的进攻，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作为革命

进攻的出发点；（四）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必然会提高全国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逐步动摇反革命统治的基础，促进全国人民大革命的高潮。从以上四点结论中不难看出，毛泽东既没有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也没有照搬外国的经验，而是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出发，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这样，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但是，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曲折而又复杂的。“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①毛泽东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两条战线上，不断地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而斗争。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同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派相结合，成为取消主义者。他们宣布中国革命已经完结，认为中国人民不应该去触动蒋介石的反革命国家机器，而只能在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之下，进行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活动，并且无耻地歌颂蒋介石的各种反革命战争，而把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农民游击战争诬蔑为必将失败的“流寇运动”。毛泽东驳斥了托陈取消派这种反革命的胡言乱语，坚持了中国人民革命的旗帜，认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的武装和革命根据地当时虽然还小，而

---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且还只在农村中，但是它有强大的生命力，它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另一方面，在我们的革命队伍中，当时有一批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冒险主义者，他们在好几年内把持了党的领导机关，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大批正确的领导同志打下去，妄图使这些同志永远抬不起头来。“左”倾冒险主义者否认中国革命斗争的长期性和曲折性，看不到中国革命必须经过由小到大、由农村到城市的发展过程，急于夺取大城市。他们不愿意在人民群众中进行积蓄革命力量的艰苦工作，幻想中国革命可以在一个早上取得胜利，蒋介石的反革命国家机器只要经过一次“决战”就可以被根本打碎。“左”倾冒险主义，实际上并不能达到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目的，也并不能真正壮大革命的力量。相反，这种盲目行动，只能招致革命力量和革命阵地的削弱。毛泽东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十年内战时期，不断地反对了这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各种错误主张，强调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根本原则立场。

为了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为了跟“左”倾教条主义作斗争，一九三〇年五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这是他的第一篇哲学专著。它从哲学高度第一次对党的思想路线进行了科学的总结，有力地批判了党内的教条主义倾向。首先，《反对本本主义》依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原理，第一次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

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的。”毛泽东还说，有的同志认为“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毛泽东还意味深长地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第二，毛泽东分析了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指出了反对本本主义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毛泽东还针对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的倾向，说：“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指示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态度是很不对的。”毛泽东在这里特别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第三，《反对本本主义》中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毛泽东指出：“你对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

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毛泽东还指出：“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才能纠正本本主义，“才能洗刷唯心精神”，从而“阻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不仅从理论上指出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而且亲身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例如，《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这些农村问题的调查，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坚持战斗的唯物主义的榜样。总之，《反对本本主义》一书第一次对党的思想路线进行了科学总结，明确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特别是它把调查研究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充实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因此，《反对本本主义》一书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毛泽东的以实践观点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写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这部著作是为着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写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它通过军事理论的论述，生动地阐明了研究和指导战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贯串全书的中心思想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即从中国内战的实际出发，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和指导规律。提出和说明了如何认识客观规律的问题，并涉及到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许多范畴，如主观和客观相符合、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关系、主观努力和客观物质条件的关系，等等。可以说，这部著作是《实践论》的雏型，是毛泽东

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中，毛泽东从“左”倾教条主义者指挥战争累累失败这个教训当中，从他自己丰富的革命战争实践当中，已经看出来正确处理好主观和客观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研究战争指导战争的根本所在。因此，它从认识论上特别强调：第一，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符合是打胜仗的关键，而调查研究又是做到主观和客观相一致的根本方法。第二，指挥员认识战争情况要有一个过程。列宁在他的哲学著作中曾指出过，人的认识过程，即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的辩证过程。毛泽东结合中国战争的实际，对列宁这一原理作了具体的重要的发挥。他指出，指挥员对某一战争或某一战役战斗的认识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收集材料，进行思考，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①。第二阶段是把计划付诸实行，在实践中检验、修正和发展认识。“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3——164页。

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第三，实践出真知，战争实践是认识战争规律的基础。毛泽东指出，做一个高明的指挥员，实战经验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挥员只有在战争实践中摸熟了自己部队的脾气，也摸熟了敌人的脾气，摸熟了一切与战争有关的其他的条件，才能比较有把握地指导作战。“这是在长时间内认识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找出了行动的规律，解决了主观和客观的矛盾的结果。”①又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②为什么从战争学习战争是我们的主要方法呢？因为“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因此，学习和认识的对象，包括敌我两方面，这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就是说，从根本上来看，人的一切正确认识，都来源于实践，并且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读书、间接经验很重要，但只有通过自己的实践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别人的经验，才能“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5页。

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样，毛泽东就把读书与实践、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关系，讲得很清楚了。第四，《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还强调了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是变胜利的可能性为现实性的决定因素。毛泽东一方面肯定了战争胜负的可能性是由作战双方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又指出，要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还须加上主观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

总而言之，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此都有过论述，毛泽东的贡献恰恰在于他总结了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的经验，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学说的高度具体地解决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二者是如何统一的问题。究竟二者如何统一呢？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进行了初步的论述：(一) 主观要符合于客观，这是认识论的唯物主义的要求；（二）主观符合客观是人们认识中的辩证发展过程；（三）在主观符合客观的过程中，实践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四）主观与客观的符合过程中，要很好地处理好主观指导同客观条件的关系问题。所有这些思想都非常重要。它把《反对本本主义》中的思想大大推向前进，同时也为《实践论》中对这些思想进行系统地论述奠定了基础。《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对毛泽东的系统的认识论思想的最后形成，起了关键的作用。

第三节　《实践论》标志着毛泽东的认识论学说的形成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发表八个月后，又发表了《实践论》这部光辉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学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说明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中国共产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与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路线长期斗争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内的主观主义，虽不是以系统的哲学形式表现出来的，但它对实际工作的指导危害极大。中国共产党内的主观主义，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人身上，其表现的形式不同，但他们都是以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践相脱离为其特征的。毛泽东之所以这样重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问题，是因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许多同志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损失。因此，为了彻底克服党内的主观主义错误，就必须从理论上展开对主观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论的批判，以解决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问题。毛泽东的《实践论》解决了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革命实践统一起来的认识论问题。

正因为毛泽东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不同于马克思和

恩格斯，也不同于列宁和斯大林，所以他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则不可能、也不需要再展开系统地、全面地论述，而只能将其中与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关系最大的理论问题，加以阐述和发挥。

第一，实践与认识的关系问题。

（1）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中国革命中的主观主义错误，跟一些同志没有从思想上解决实践是认识的来源问题，关系极大。主观主义，说到底就是一种唯心主义。在极其艰苦的中国革命斗争中，虽然没有人公开声明自己是唯心主义者，但他们的所作所为说明他们坚持的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他们口头上虽然也承认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对人的认识来源的看法并不正确。他们或认为认识来源于“本本”，或把人们认识的内容和认识的来源混为一谈。认识的内容和认识的来源并不是一回事。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脑中的反映构成了认识的内容。这个内容是怎样来的呢？是上帝放在人的头脑里的呢？是灵机一动想出来的呢？还是有别的来源？这才是认识来源问题。然而在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的实践中，许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不懂，自觉或不自觉地执行着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所以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实践论》里强调指出：“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①一句话，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4页。

你要取得知识，就得参加社会实践。只有社会实践才是人们认识的来源，离开了社会实践人们就不可能了解客观世界的“真面目”。

社会实践之所以是人们认识的来源，这是因为，人类为了生存总要和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以解决物质生活资料问题。离开了生产活动这种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人类就无法生存，也就更谈不上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了。人类正是在生产活动中，基于生产的需要，才开始发生对自然界的认识，以及对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因此，恩格斯说：“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① 但是，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阶级斗争、科学实验、政治生活、文学艺术活动，等等，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都是实践的不同形式，这些也是认识的来源。

毛泽东的《实践论》，从马克思主义以前旧唯物主义不了解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讲起，说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仅同唯心主义认识论根本对立，而且同旧唯物主义认识论，也有原则区别。旧唯物主义不懂得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因而不能科学地说明认识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也就不能彻底驳倒唯心主义。只有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才能战胜唯心主义，揭露教条主义在认识论上的唯心主义倾向。本来，把实践的观点引入认识论并把实践看作认识的基础，实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1页。

人类认识论史上的根本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已解决了的问题。但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之所以还首先强调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因为当时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以不同的方式又否认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否认直接经验对于获得真知的积极意义。为此毛泽东着力阐明“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这个认识论的唯物主义道理，指出：“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① 同时，毛泽东也并不否认接受间接经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只是针对教条主义的错误强调指出，就知识的总体而论，任何知识的获得，都必须经过直接经验这一环节。正是由于毛泽东特别强调认识依赖于实践、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这就为从根本上解决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问题，打下了牢固的理论基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这一鲜明的理论原则，武装了人民，振奋了广大群众勇于实践的革命精神，从而大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

(2) 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人们认识发展的动力问题，是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把实践的观点引入认识论，才从根本上解决了认识发展的动力问题。但在中国革命反复曲折的斗争过程中，主观主义者的所作所为，说明了认识的动力问题在革命队伍内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5页。

部仍然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也就是说，许多同志不懂得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不懂得实践是人们认识发展的动力。

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深刻地阐明了认识的动力问题。

人的认识为什么能从现象深入到本质？从感性发展到理性？又为什么能够用正确的认识修正错误的认识？用比较完全的认识代替不甚完全的认识？这些问题只有在解决了认识发展的动力之后才能讲清楚。认识发展的动力是什么？从认识发展的过程来看，如果我们把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看成一对矛盾的话，认识的发展当然是在这个矛盾运动中实现的，那么，这个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矛盾运动又是怎样实现的呢？列宁曾经指出，主体和客体、精神和物质的"交错点＝人的和人类历史的实践。"①这就是说，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运动，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的。在实践中开始发生认识，主体获得对客体的反映，主观获得对客观的反映；然后，又把认识放回到实践中去，检验主体对客体、主观对客观的反映是否正确，依据是实践的客观结果，即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等结果，从而获得对客体、客观比较正确的反映。如此循环往复，直至达到主观与客观的一致。这种"一致""统一"在认识中就是真理，在现实中表现为实践上的成功。可见，实践作为解决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矛盾的基础，实际上就起着一个推动人们认识发展的动力作用。另一方面，实践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的，

---

① 《列宁选集》第38卷，第310页。

生产活动、科学实验、阶级斗争，等等，都一步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每一步这样的发展，都提出了大量的认识上的新课题，并提供各种条件，推动人们去发展自己对外界事物的认识。毛泽东在《实践论》里指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古埃及天文学、数学、几何学的出现，是由于尼罗河畔农业生产的需要，近代欧洲科学之所以发展迅速，是由于工业生产和航海等的需要，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则是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没有这些实践上的要求，就难以有这些认识上的发展。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个道理，任意贬低实践在认识上的能动作用，甚至把强调亲身参加革命实践的同志诬蔑为"狭隘经验主义者"。这说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一窍不通。他们反对的决不是什么"狭隘的经验主义"，而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真理的标准问题也是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虽然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但不少人并没有从思想上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中国的教条主义者，他们根本不懂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科学的道理。

毛泽东为了克服党内的主观主义错误，尤其是教条主义的错误，反复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并且认为不懂得它，就不可能真正懂得实践与认识的关系问题。他在《实践

论》中指出："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在毛泽东看来，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即主观与客观相符合。要证明某种认识是否符合客观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主观认识不能自己证明自己，客观事物本身也不能直接证明主观认识的正确与否，因而只有"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才是沟通主观与客观的桥梁与纽带。一般地说，当人们以对某种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去变革和改造客观事物的时候，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就证明这种认识是正确的，是真理；否则，就是错误的，不是真理。就是说，只有通过有目的的变革客观事物的实践活动，才能检验出人们的认识是否正确，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并不否定逻辑证明的作用。但逻辑证明归根结底离不开社会实践，它不能取代实践标准。社会实践标准与逻辑证明相比，不能不占更重要的地位。况且，根据中国革命的教训来看，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的胜利，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毛泽东正是从中国革命实践出发，更突出地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科学道理。

(4) 实践是认识的目的

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似乎是不成问题的常识问题。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成问题的常识问题，对于不少同志来说，并没有解决或没有解决好。主观主义者所以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懂得"实践是认

识的目的”这一科学的道理。

马克思主义强调，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没有别的什么目的了。毛泽东在他的《实践论》里肯定了这一科学的论断，并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在毛泽东看来，既然人们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那么把实践看成是认识的目的，就是自然的、符合逻辑的。无论是外国的革命斗争经验，还是中国的革命斗争经验都表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学说之所以具有长久不衰的生命力，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确立了实践的观点。实践，是最铁面无私的。任何违背了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思想、意见、计划、理论等都会被它打得粉碎。中国革命的失败和挫折，就在于党内一部分同志，只知生吞活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词句，不懂得实践才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目的。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之所以反复强调实践是认识的目的，正是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十六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所得出的正确结论。

只有懂得实践是认识的目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问题。毛泽东在《实践论》里明确地提出和论述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就为大家树立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思想原则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第二，人们的认识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

详尽阐明人们认识的辩证的发展过程，是毛泽东认识论学说的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大的贡献。

把辩证法引入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突出贡献。列宁对人们的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问题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

理论见解。毛泽东正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和论述。他在《实践论》里阐明了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以后，着重分析了人们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

（1）关于认识的两次飞跃的问题

毛泽东为了说明人们认识的辩证发展，首先提出了人们认识过程的两次飞跃问题。在毛泽东看来，人们的认识可以分为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初级阶段，属于感觉和印象阶段。它是在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由客观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而产生的。感性认识有感觉、知觉和表象等形式。从感觉到知觉到表象，虽然已经显示出人们认识的发展趋势，但它的基本特征是：只看到了各个事物的表面现象、各个事物的片面、各个事物的外部联系，还没有形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逻辑的结论。随着人们实践的继续和发展，人们在实践中引起的感觉和印象经过多次反复，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于是人们的认识便由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有概念、判断和推理等形式。这个概念、判断、推理的阶段是认识的高级阶段，也是认识过程中更为重要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认识已经不是对于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事物的外部联系的反映，而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和事物的内部联系，即事物的规律性。

毛泽东指出，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是认识发展中的一个能动的飞跃。其所以是一个飞跃，是因为理性认识对于感性认识来说，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其所以是能动的，是因为

要正确地实现这个飞跃，必须深入实践，开动脑筋，发挥主观能动性，“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但是，实现了第一次飞跃，认识运动至此并没有完结，“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毛泽东强调：“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这是因为认识、理论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手段。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十分重视理论的作用，是因为正确的理论能够反映事物的规律，能够为我们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指出明确的道路和方向，避免行动中的盲目性。但是，理论必须通过群众的革命实践，必须掌握了群众，才能化为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认识过程的第一个能动的飞跃即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只是第二个能动的飞跃即理性认识向实践飞跃的必要准备，而第二个飞跃才是第一个飞跃的目的。

毛泽东提出和论述的两个飞跃的思想，对于人们加深理解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十分重要。只有正确地认识和掌握两个飞跃的思想，才能克服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少犯或不犯主观主义错误。

(2) 关于真理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问题

毛泽东认为，要认识和掌握人们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就要进一步懂得真理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道理。也就是说，认识

的辩证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地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的过程。

在毛泽东看来，真理是客观的。它的客观性是指它包含着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或人类的客观内容。因此，凡是在实践中证明与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相符合的认识和理论，就是真理，反之，就是谬误。但是，人们不可能一次就完全获得对整个客观世界的真理性的认识。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辩证过程，这就涉及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问题。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承认真理的客观性，也就必须承认人们认识的绝对性，即绝对真理。因为承认客观真理，就是承认人们认识的内容来自客观外界，就是承认我们可以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人类的认识能力，就其本性来说，完全能够正确地认识无限发展着的绝对存在着的物质世界，这一点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同时，在一定的条件下，尽管人们还不能一下子全部认识客观事物的各个方面或全部过程，而只能认识到客观事物的某些方面或某些过程，但是，只要这个认识和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真实情况相符合，它就具有绝对性。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虽然人类的认识能力，就其本性来说，能够无条件地、绝对地认识无限发展着的物质世界，然而，这只有在人们的实践和认识的不断发展中才能逐步实现。人们的实践总是处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总要受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因此，在一定条件下，人们的认识能力又是有限的、相对的。就是说，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只能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而不可能完全地、绝对地把握客观真理，即不可能一次或几次就

把握全部绝对真理。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的："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① 这就把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及其人们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简单明了地描绘出来了。

主观主义者不懂得真理的绝对与相对的道理，因此他们就不可能懂得人们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教条主义者从永恒不变的原则出发，认为客观世界可以一下子就整个地被认识，可以通过一次认识就把握到全部真理。因而他们照抄照搬别人的经验，把革命引向失败；经验主义者则片面地把局部经验绝对化，否定普遍真理的作用。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都是不懂得"真理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这一辩证的认识论的道理。毛泽东正是在同主观主义的斗争中，阐明了真理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道理，也就是从根本上阐明了人们的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

(3) 关于认识过程总规律的问题

关于人的认识过程的总规律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直十分注意的问题。因为要说明人的认识的辩证的发展过程，就不能不对认识的总规律作一概括。列宁在他的《哲学笔记》中，在谈到人类认识运动的全部辩证过程时说过："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①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提供的新鲜经验，在阐明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两个飞跃和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之后，对人类认识运动的总规律作了如下的概括：“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②这一概括是很科学的，它正确地反映了人类认识运动的全部辩证过程。

在毛泽东看来，在实践的基础上，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中来指导实践，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这样，人们对于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算是完成了。然而对于过程的推移来说，人的认识又是没有完成的。随着客观过程的不断发展和实践的不断继续，人们又产生新的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又开始新的认识运动。客观事物的发展是无穷无尽的，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也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人们的认识也必然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无穷无尽的运动。只有在这种实践与认识的循环往复的运动中，人们才能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毛泽东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既重视社会实践的作用，又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并且把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因此，他能够根据新的历史形势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因为毛泽东极端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所以他坚决地反对了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的以割裂理论和实践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3页。

为特征的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实践论》中总结和概括的认识的总规律，就是与主观主义作斗争的产物。

总而言之，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一部光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它的产生，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实践为基础的毛泽东的认识论学说的形成。认真学习和掌握《实践论》中的基本思想，对于我们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国家，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四节　《实践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出了新贡献

《实践论》的主题思想就是要解决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一知和行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详尽地分析了人们认识发展的过程的基础上，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① 这个结论是对《实践论》基本思想的高度概括，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原则。它以自己的独特的形式、唯物而又辩证地解决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关系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长期以来，在评价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贡献方面，存在着拔高和贬低两种倾向。这是应该坚决加以纠正的。因为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贡献，这是个科学问题，而对待科学问题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在哲学方面，包括他在认识论方面的贡献，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郑重的科学态度，作出了恰当的、准确的评价。我们将以此为指导来展开分析和论述。

《实践论》是毛泽东的认识论思想的代表作，但毛泽东并没有把自己的理论停留在已有的水平上。《实践论》发表以后，毛泽东的认识论思想主要向两个方面发展：一个方面是进一步发挥了辩证唯物论关于自觉能动性的思想，另一方面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化为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这主要体现在《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著作中。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功绩，就是引导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他们创立的革命理论，阐明了这种结合的必要性，指出了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① 毛泽东坚持了这一"结合"的原则，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认识论思想。毛泽东的认识论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的继承，又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第一，毛泽东的认识论思想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把实践的观点引入认识论，这是人类

① 《列宁全集》第4卷，第225页。

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伟大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以往一切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强调“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科学概括。它说明：人类的实践是在一定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指引下，为实现某一目的有意识地进行的活动；这种自觉地活动不是随心所欲的，是受客观条件制约着的，是客观的。所谓客观，并不是说实践活动不依赖于有意识的人，而是说这种实践活动的发生、发展和它的结果，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主观作用于客观的活动，是物质的、社会的、变革现实世界的活动，不是个人闭门思过、修身养性的抽象的思维活动。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实践概念的分析比马克思和列宁的分析深化多了。同时，毛泽东在《实践论》里还进一步概括了实践的具体内容，明确指出“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这就是说，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都是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且是为发展生产服务的。

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经验，除了给实践下了一个科学定义之外，还进一步阐明了实践是过程的原理。他在《实践论》里指出：“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实践之所以是过程，根本原因就在于，不论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或者是为解放生产力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或者是为解决生产上的某个问题搞的科学实验，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所有这些实践活动，都是具体的、历史的，都需要经历一个发生、发展和终结的过程。毛泽东之所以特别强调实践是一个过程的原理，其目的是为了解决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

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要完成这个“结合”的任务，单凭口头上讲一讲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还必须进一步解决“怎样结合”的问题。这就需要抓住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关于实践的观点进行新的探索。毛泽东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深化，特别是通过对实践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考察，明确揭示出了理论与实践统一原则的实质以及贯彻“理论与实践统一”这个根本原则的方法。就是说，由于实践是一个过程，理论和实践只能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才能统一起来，离开了具体的历史要求，无法真正达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所以说，毛泽东的认识论思想，特别是他的实践观，虽然并没有提出更多新的理论观点，但是，它在具体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的过程中，对实践问题进行了新的分析和论述，这就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第二，毛泽东的认识论进一步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分发挥人的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

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了在意识能动性问题上的两种错误观点。他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① 这就是说，自觉的能动性，就是人的主观意识反映客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性能。列宁在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论思想的同时，坚决反对“从思想和感觉到物”的唯心主义路线，坚持“物及其在思想上的模写或反映”这一唯物主义观点，反复阐明“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①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践经验，在论述认识论问题的时候，除了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以外，他特别强调“能动”这一思想。在《实践论》中，多次谈判“认识的能动作用”，谈到“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能动地改造世界”。这里说的“能动”，意思就是通常说的能动性或主观能动性。在《论持久战》一书中，毛泽东完整地、准确地表述了主观能动性的涵义。他说：“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又说：“一切把握和符合于客观事物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在以后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概括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这个科学概括很重要。它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本质的东西——实践标准和辩证方法——突出出来了。没有实践，没有辩证法，就不可能有科学的认识论。这就鲜明地表示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础上，避免和克服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反映论的两个根本缺陷：脱离实践和缺乏辩证法。毛泽东特别强调认识的能动作用，强调发挥人的主观

---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332页。

能动性，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极端困难、异常复杂的环境里，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的哲学概括。

在毛泽东看来，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只有认识自己所处的客观环境，尊重客观实际，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才是可能的。然而，中国的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在认识论上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否认了实践标准，否认了辩证法。因此，毛泽东在认识论问题上，历来就是从两个方面来捍卫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一方面，反对脱离实践来讲认识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也就是坚持认识论上的唯物主义原则；另一方面，反对认识论上的形而上学，坚持认识论上的辩证法。他多次指出，“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① 可见，毛泽东概括起来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正是在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是唯一科学的认识论。

第三，毛泽东的认识论思想是把认识论、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一种科学学说。

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的环境中，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和列宁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等著作中的有关论述，把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又一个重大贡献。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7页。

如上所述，《实践论》讲的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它论述的根本思想，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在唯物辩证法看来，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使自己的思想符合客观实际，首先必须如实地观察和分析事物的矛盾运动，找出矛盾的特殊性，然后才能指出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这就是说，只有把认识论同辩证法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建立科学的认识论。

但是，在毛泽东看来，建立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单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结合是不够的，还必须把认识论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结合在一起。毛泽东在《实践论》里一开始就指出，旧唯物主义者之所以不能正确地解决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就是因为他们“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① 旧唯物主义者的机械反映论，是同他们的唯心史观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同旧唯物主义者相反，毛泽东在论述人类认识问题时，首先是从“人的社会性”、“人的历史发展”上，去分析和考察认识的发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这样，他就明确地把实践观点同群众观点、把认识路线同群众路线结合起来进行了考察。毛泽东在《实践论》里明确指出他讲的实践，就是人民群众的实践，而不是个人的或单个的“实践”。因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生产斗争实践和阶级斗争实践的基本力量。我们说认识来源于实践，就是指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所以，实践、认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9页。

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完全一致的，是同一个过程。既是认识论，又是群众路线。这样，毛泽东就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认识论的论述和思想，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把认识论、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历史观，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样，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展史上，毛泽东第一次把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和辩证法的个别与一般等原理、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等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实践——认识——实践”、“个别——一般——个别”、“群众——领导——群众”三者统一起来了。当然，这三者绝不是机械的等同，而是在根本精神上的一致。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是群众路线的思想基础，群众路线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具体运用。毛泽东的认识论思想就是这样从论述一般原理转向党领导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真正成了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群众科学地认识世界与能动地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这就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第四，毛泽东的认识论思想进一步发挥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大家知道，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把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提了出来。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捍卫和发展了恩格斯的这个思想，进一步提出了认识论上的两条认识路线和两条思想路线的根本对立的问题。然而，由于列宁所处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他主要是从反映论方面来保卫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强调主观

和客观这个矛盾，反复申明在这个矛盾中，客观第一性，主观第二性，主观是对客观的反映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由于当时的历史任务，使他没有更多地展开对思想路线问题的论述。

毛泽东所面临的任务和列宁有所不同，党内没有人来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反映论原则，认识论上斗争的焦点不是要不要承认反映论，而是如何把反映论的原则贯彻到底，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也就是说，是要在进一步阐明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关系的过程中，在全党确立起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在阐明理论与实践、知和行的关系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的思想路线。

当然，这条正确思想路线的确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批判了危害极大的主观主义思潮，才在全党确立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在这期间，就是为了在全党确立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才写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著作，这是延安整风的一些主要文献。在这些文献中，毛泽东坚持和发挥了《实践论》的思想，反复强调了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原则，进一步批判了主观主义，并指出了克服主观主义的正确途径。

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从理论上分析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认识上的片面性，指出它们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东西"。他们从不同的两极出发，达到了一个共同

点：这就是片面性。毛泽东不仅指出这两种主观主义的共同点，并指出克服的方向：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结合起来，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这样就会达到认识上的全面性，达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著作中，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工人阶级的大敌，人民的大敌，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其所以和党性是一致的，在毛泽东看来，这是很明白的。因为“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①同时，毛泽东在与主观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指出调查研究是了解情况的唯一方法。这也就抓住了主观主义者的病根。在一九四二年的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把党内政治上、指导思想上的分歧，提到世界观、思想路线的高度，从根本上加以分析和解决，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实现了全党的大团结，推动了革命事业迅猛发展，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性胜利。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贡献，远不止以上四个方面。比如他对实践是认识论之第一的观点的论述，他对人类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原理的论述，他对真理问题的论述，他对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辩证关系的原理的论述，等等，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8页。

都有很多独创性的意见。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同志着重阐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他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的理论；指出正确认识的形成和发展，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的反复；指出真理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真理是不可穷尽的，认识的是非即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最终只能通过社会实践来解决。"这一段话，概括了毛泽东的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思想。

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讲到列宁主义时曾说过："列宁主义是全世界工人革命运动经验的概括。这个经验是一盏指路明灯，它照耀着实际工作者的日常工作的道路，给他们指出方向。如果实际工作者甚至没有最低限度地掌握住这个经验，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就不会有信心，就不会认识到这个工作的正确性。如果实际工作者不研究列宁主义、不努力掌握列宁主义，不愿意把自己的实际工作同必要的理论学习结合起来，他们的遭遇就会是这样：摸索着工作，在黑暗中工作。"①毛泽东的认识论思想，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的头脑中固有的，而是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经验的总结和概括。虽然它是在长期的斗争中形成的，但它一旦形成，就充分显示出它的巨大的生

---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05页。

命力。给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的实际工作以指导，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所以说，不论是在理论活动方面，还是在实践活动方面，毛泽东的认识论思想都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四章

毛泽东的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形成

第一节　唯物辩证法的创立是哲学史上的根本变革

人类哲学思想的发展有着内在的必然逻辑。任何时代的哲学都是整个人类认识史上的一环，是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辩证法，作为一种世界观和认识方法，早在古代就产生了，并且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日趋完善和科学化。

“辩证法”一词，最早产生于古希腊。它原来是指在辩论中以揭露对方议论中的矛盾、并克服这些矛盾来求得真理的艺术，后来逐渐演变成揭露和认识事物的矛盾以求得真理的方法。

自发、朴素的辩证法，在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以及东方的古代中国和印度，曾经广为流传。比如，被列宁称之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已天才地猜测到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矛盾着的对立面的斗争是

事物发展的动力，向对立面转化的规律是世界的基本规律。他把事物的运动变化称之为：“一切皆流，无物常住”，“相互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一切都是斗争所产生的。”赫拉克利特还断言：“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它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按规律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①对赫拉克利特的这些宝贵思想，列宁说“它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绝妙的说明”②。又比如，古代中国，早在殷周时期的《周易》中，就已经出现了用“阴阳”这两种对立的方面、力量、趋势，来说明万物产生和发展变化的辩证思想。在以后的“五行”说中，有“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的说法，其中包含了对立的东西相结合可以产生新事物的辩证法思想。在老子的《道德经》中，有诸如有无、损益、兴废、难易、美丑、荣辱、贵贱、强弱、刚柔等等对立的概念，以及“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等的论述，它包含了万事万物都有相互对立、相互依赖的两个方面，以及这两个方面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辩证法思想。但是，无论是古代的中国还是古希腊、古罗马，这种带着朴素的、自发的性质的辩证法，都是对自然界笼统直观认识的结果，因而不能完全解释世界。

随着人类认识的进一步发展，人类认识必然进入到对自然界的解剖、分析阶段，进到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认识自然界的细节。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形而上学

---

① 引自《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7、19、21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5页。

的思维方法逐渐代替了古代朴素的辩证法。这种代替是人类认识史上的必然结果，是一种进步。但是，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和整个人类认识的巨大进步，自然界内部的各种联系逐一被揭示出来，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着的。要精确描绘宇宙以及宇宙和人类的发展，就只有把辩证法作为一种认识方法。因此，在十九世纪，形而上学成了自然科学和人类认识发展的障碍。这样，从形而上学发展到高级的辩证法，又成为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

在近代，黑格尔是第一个有意识地、系统地阐述辩证法的人。黑格尔创立了历史上最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并在这个基础上创立了自觉的或概念的辩证法。黑格尔认为，远在自然界和人类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着一个所谓的“绝对观念”，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都是从这个“绝对观念”派生和转化而来的。黑格尔的哲学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他把“绝对观念”当做辩证的发展过程来考察。为了说明“绝对观念”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他提出了关于矛盾是发展的内在源泉的思想，关于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思想，关于发展形式的否定之否定的思想；并且把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过程，从而揭示了概念的矛盾运动。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也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是一种被“神秘外壳”紧紧包围着、头足“倒立着”的辩证法，亦即唯心主义辩证法。在他的辩证法中，有许多人为的虚构和主观的推导，带有严重的神秘主义和思辨的性质。因此，他的辩证法又是同他的唯心主义体系相矛盾的，是一种勇于面对过去，不敢面向未来的、不彻

底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最终不得不被他的保守的唯心主义体系所窒息。哲学要往前发展，就要解决唯心主义体系与辩证法之间的尖锐矛盾。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时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但费尔巴哈却历史地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这是他的一大功绩。这对马克思恩格斯抛弃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发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费尔巴哈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唯心主义体系与辩证法之间的这一矛盾，所以，他并没有把哲学大步推向前进。

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成果的基础上，批判地改造了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吸取了他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并吸取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创立了科学的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创立，是辩证法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的革命变革。这一变革：（1）使辩证法有史以来第一次自觉地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并且具有真正科学的性质，成为科学的唯物的辩证法；（2）由于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且应用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各个领域，也就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的规律，从而形成了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说。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象黑格尔那样给我们留下《逻辑学》这样的哲学专著，但他们却留下了《资本论》、《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这些著作科学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主要内容，阐明了唯物辩证法的一般特征和三个基本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

任何理论体系的发展，都有自己内在的逻辑。唯物辩证法

的理论体系是在总结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吸取了前人哲学研究的积极成果而产生的，并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越来越完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历史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这时，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焦点已不再是承认不承认运动、发展、变化，而在于如何理解运动、发展、变化；在于承认不承认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列宁继承、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他通过研究社会领域和自然领域的大量现象，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自己运动”的“泉源”、矛盾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指出“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列宁的这个意见，在他的《哲学笔记》等著作中进行了初步的勾画并已形成了大体的轮廓。这当然是唯物辩证法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但是也应当承认，列宁的《哲学笔记》还只是读书笔记，还不是系统地阐述辩证法的专著。列宁提出的“说明和发挥”的任务并未完成。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哲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了全面的研究和探索。在三十年代初期，苏联产生了一批比较全面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特别是在批判德波林学派之后，苏联哲学工作者较为重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的思想。并在论述这一规律时提出了内因和外因、矛盾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等新概念、新思想，充实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基本内容。但是，由于这些新概念尚未给以明确定义而又比较零乱，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因此又造成了一定范围内的

思想混乱。当然他们也由于种种原因不可能完成列宁所提出的“这需要说明和发挥”的任务。这就说明，在列宁逝世之后，对对立统一规律进行系统地论述确已成为唯物辩证法向前发展的一种历史必然性。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毛泽东的身上。毛泽东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的异常复杂的环境中，依据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综合了前人和同时代人的优秀成果，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系统地论述了唯物辩证法思想，出色地完成了列宁提出的“这需要说明和发挥”的任务。他第一次把对立统一学说的丰富内容组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辩证法的创立，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的提出，毛泽东对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所作的系统而深刻的说明和发挥，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人类认识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环。

第二节 《矛盾论》是科学地总结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经验的必然产物

任何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它既和前人的思想成果相联系，又和产生它的历史时代相联系。毛泽东的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之所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得到运用和发展，这是由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所决定的。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在社会主义的俄

国和被奴役的东方各国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十月革命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已直接提到议事日程上，成为必不可免的实践问题。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如何革命，怎样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这是世界革命运动史上从未遇到过的新任务，是时代向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重大新课题。列宁曾对东方的共产党人说过："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同时它又是特别崇高的任务"，"这些任务的解决方法，你们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找不到"，而只能由东方的共产主义者"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这个任务。"① 列宁的这个分析是很深刻的。中国革命就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竞相掠夺和瓜分的对象，新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已经出现，而旧的阶级矛盾依然存在，旧中国的社会矛盾呈现出一种内外交织、错综复杂的特点。在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里，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新的思想武器来回答、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课题。照列宁的说法，就是要"依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这个任务"，即科学地分析中国的特殊矛盾，并在实践中解决这个特殊矛盾。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就是对中国特殊矛盾的总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104——105页。

结和概括。

毛泽东的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是在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机会主义，它们共同的思想特征是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理论与实践相脱离，都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三十年代初，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一切从本本出发，照搬照抄苏联的经验，具有极大的欺骗性，是当时党内主要的错误倾向。党内当时存在着的另一种错误倾向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者轻视革命理论的作用，醉心于局部的经验，把局部的、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把它当作到处可以套用的教条。在教条主义统治时期，经验主义成为它的助手。为了彻底纠正党内的错误路线和错误倾向，保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贯彻执行，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批判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还必须从世界观的高度，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与教训，揭露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根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武装全党。为此，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自觉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分析和研究中国的特殊问题和特殊矛盾。当时，中国革命首先碰到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道路问题。在正确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毛泽东用很大的精力对中国社会的特点进行了调查研究并给以科学的分析。如，对中国社会阶级特性的具体分析；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人民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之间矛盾实质的具体分析，以及对各帝国主义之间、国内各种反动势力之间的矛盾特点的具体分析，等等，在理论上较为科学地解决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从小块根据地的

建立到取得全国政权的历史转折的问题。特别是在井冈山的军事斗争以及长征途中的军事斗争中，毛泽东在军事战略上的英明决策，充分反映了他善于运用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军事辩证法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有机地相结合的才能。毛泽东早期的一些著作，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等著作，充分说明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注重分析社会矛盾，注重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并善于从这种分析中认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性。

如果说在红军到达陕北以前，毛泽东还没有时间坐下来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那末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有了大块立足之地。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为了从理论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肃清“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就可以十分系统的从事于某些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了。毛泽东本人更是废寝忘食地带头发愤读书，较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有关哲学思想，提高了自己的哲学修养，从理论上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可以说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有一个飞速的发展，他的系统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日趋形成。

这里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一九三五年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一九三六年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两篇著作。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通过分析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中国、民族危机迫在眉睫之际，

国内阶级关系出现新的变化的情况，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进一步阐明了矛盾的特殊性思想以及事物中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转化的理论问题，并以这种理论为指导详细说明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问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他说："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①。为此，毛泽东探讨了一系列的军事辩证法问题：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全局和局部，战争和阶级，战争和政治，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战争中主观指导和客观条件，围剿和反围剿，防御和进攻，退却和反攻，运动战和阵地战，歼灭战和击溃战等等。毛泽东特别强调了研究中国军事斗争的特殊规律的意义。他说："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②这就是说，研究战争要"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③为此，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专门写了一章《中国革命战争的特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7页。

点》。指出，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毛泽东批评了“左”倾教条主义者，他们无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结果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他转述列宁的话：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总而言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军事著作，在认识论上奠定了后来为《实践论》所发挥的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关系、认识的辩证过程——从感性到理性、从理性到实践的原理；而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特别是对特殊规律的论述，以及抓主要环节的思想，也为《矛盾论》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它是“两论”（《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前导。

诚然，《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两部著作的思想已把毛泽东辩证法的代表作《矛盾论》的骨架搭起来了，但要从理论上阐明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并且又有新的突破和独创，还需要作大量的工作和各方面的努力。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① 也就是说，历史上每一代人总是把前一代人认识的终点作为自己认识的起点，并吸收前人的成果加以发展。毛泽东在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发表以后，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尤其是他们的哲学著作。并且以此为指导，研究中国革命和中国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页。

战争中的实际问题。他通过分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所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新变动，科学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在反对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基础上，十分注意矛盾各个侧面特点的变化。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充分准备，就为《矛盾论》的写作，即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学说的建立，创立了条件。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在《实践论》发表以后，紧接着又于八月发表了《矛盾论》。《矛盾论》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发展史上，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对立统一学说的丰富内容，出色地完成了列宁所提出的"说明和发挥"的任务。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宝库中又增添了新的内容。这当然是辩证法发展的历史必然。同时，毛泽东对辩证法的贡献，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了新的生命力。

第三节　《矛盾论》标志着毛泽东的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辩证法思想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并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以扫除教条主义为主要目的，着重发挥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并把它充分展开，形成了一个有丰富内容的理论体系，从而写下了唯物辩证法史上的光辉文献——《矛盾论》。《矛盾论》集中反映了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它

标志着毛泽东的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形成。

第一，《矛盾论》明确提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宇宙观。

马克思、恩格斯在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问题上，主要是批判机械唯物论的“不变论”，确立了客观事物是变化和发展的观点，指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为“两种思维方法”的对立。如，恩格斯就曾指出，旧的思维方法就是在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① 关于辩证法的本质，恩格斯指出：“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② 列宁在二十世纪初结合对庸俗进化论的斗争，深刻地揭示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概括为“两种基本发展观”，并指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根本分歧在于：是否承认对立统一。

毛泽东在前人“两种思维方法”、“两种发展观”的基础上，明确肯定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宇宙观。他指出：“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③ 在毛泽东看来，辩证法，特别是唯物辩证法同形而上学在发展观上的根本对立，集中表现在三个问题上：其一，是联系地看问题还是孤立地看问题。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5页。

互制约的，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由无数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事物所构成的复杂的矛盾总体。事物的联系又是多种多样的，有内部联系也有外部联系，有本质联系也有非本质联系，有直接联系也有间接联系，离开同其他事物的联系、绝对孤立存在的事物是没有的。由于唯物辩证法认为客观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所以它的第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联系的观点。它要求人们树立联系观点，用联系观点去观察世界、处理问题。与辩证法相反，形而上学则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彼此孤立、互不联系、互不相干的，整个世界是一些孤立的事物和现象的偶然堆积。它的第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孤立的观点，它要人们用孤立的观点去观察和处理问题。其二，是发展地看问题还是静止地看问题。唯物辩证法承认客观事物是永恒发展的。它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处于永不停息地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的。在辩证法看来，任何一个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都在一定条件下走向自己的反面，并被另外的事物所代替；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永恒不变的事物和现象，都是不存在的。辩证法也有它“保守”的方面，它承认人的认识和社会的一定阶段，对于一定的环境和时代来说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但是，辩证法的这种观点的保守性是相对的，它的关于事物发展的那种革命性、批判性则是绝对的。因此，唯物辩证法的第二个基本观点就是关于发展的观点，它要求人们用发展、变化的眼光观察世界、处理问题。同辩证法相反，形而上学却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静止不动、永远不变的。如果说有变化，也不是质变或飞跃，不是前

进的、上升的过程，不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而只是事物的场所的变更，数量的增减，或者是由一事物到另一事物的直线运动。它的第二个基本观点就是静止不变的观点，它要求人们用静止的观点看问题。其三，是全面地看问题还是片面地看问题。也就是说，是把事物看作矛盾的统一体，还是否认事物的矛盾性。唯物辩证法承认事物的矛盾，认为事物的联系和发展的实质或根本原因，是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因此，唯物辩证法不仅是关于联系的学说、发展的学说，也是关于矛盾的学说。在这一学说看来，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任何过程，任何思想，都无不包含着矛盾，无不处于各种矛盾关系之中。事物的联系是事物矛盾诸方面以及各种事物之间这一矛盾和另一些矛盾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表现；事物的运动和发展，是事物矛盾（包括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亦即内因和外因）诸方面又统一、又斗争的必然结果。因此，所谓认识事物，就是要深入地认识事物的矛盾及其相互关系。也就是既认识事物矛盾的这一方面，也认识事物矛盾的另一方面；既认识这一矛盾两个方面的本身，又认识这一矛盾与另一些矛盾的相互关系。这些认识，也就是辩证法要求的全面性，或者叫做唯物辩证法的第三个基本观点——全面观点。同辩证法相反，形而上学在观察问题时，不是从事物的总体上去把握矛盾各方面的特点，往往只看事情的一个方面，不看另一个方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种片面性和表面性是形而上学的第三个基本观点。总之，毛泽东提出的两种根本对立的宇宙观，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积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二，《矛盾论》在深入研究矛盾普遍性的同时，突出地

阐明了矛盾特殊性的理论。

列宁曾明确指出过，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是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这个见解是很精辟的。但列宁并没有从理论形态上考察矛盾特殊性的发生、发展的整个过程；而且在论述矛盾特殊性时，也主要是指出矛盾特殊性的一种情形，即不同运动形式的矛盾的特殊性。然而，由于中国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正如列宁在一九二三年所预见的那样："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① 中国革命的实践，特别是反对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的斗争，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对矛盾特殊性进行深入的研究。毛泽东对矛盾特殊性问题的研究就构成了关于矛盾特殊性的一个完整的学说。也就是说，毛泽东在他的《矛盾论》里，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概述了：（一）事物矛盾发展的不同层次及其相互联结上矛盾的特殊性，以及矛盾特殊性的五种情形，即：各种运动形式的矛盾特殊性，各种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特殊性，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个方面的特殊性；各个发展过程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个方面的特殊性。联系自然、社会特别是中国革命的实际，对客观事物的矛盾做这样的具体分析，层层剥皮、纵横结合，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确具有独到之处。（二）《矛盾论》从事物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上分析了矛盾的特殊性，进一步指出了矛盾特殊性的两种重要情形，那就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692页。

以及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并对这两种情形的具体含义，如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定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相互转化，等等，都做了极其深刻而精辟的论述，从而形成了一个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三）《矛盾论》从矛盾斗争的形式上分析了矛盾的特殊性，具体指出了矛盾特殊性的另外一种情形，也就是矛盾斗争的形式因矛盾的性质不同，也具有自己的特殊性。

在分析矛盾特殊性时，毛泽东特别强调反对主观随意性。他指出，不论研究何种矛盾特殊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他们实行具体的分析。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殊性。”这是对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和概括。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在中国革命中一无所得。要正确地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必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作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这就是说，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把握住矛盾的特殊性，才能找到正确解决矛盾的办法。

第三，《矛盾论》具体论述了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坚持和发挥了列宁关于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相互关系的思想。

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曾针对各种不同的情况，分别作了论述。在他们的著作中，同一性的概念，也有多种含义。

列宁关于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关系的思想是比较丰富的，他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一方面讲发展是对

立面的斗争，接着又讲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关于同一性与斗争性在辩证法中谁是重点的问题上，列宁针对不同的问题也有不同的论述，例如，针对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问题，列宁曾明确表示，把矛盾统一性规定为辩证法的研究重点："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同一的，是互相转化的"。[①]在辩证法十六要素中，也有很多条涉及同一性的内容。同时，列宁针对黑格尔追求最终的绝对的统一观点，又提出对立面的统一是相对的，而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这一辩证法的命题。随之，又指出在"辩证法中，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观的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说来，相对只是相对的，是排斥绝对的。"[②]列宁的这些光辉思想，在苏联三十年代后期一度被歪曲。当时的哲学界片面夸大了矛盾的斗争性，而贬低了矛盾同一性的作用。米丁在他的《新哲学大纲》一书中就用矛盾斗争的绝对性来排斥矛盾的同一性。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也把事物发展的动力规定为矛盾的斗争，而不谈矛盾的同一性。

毛泽东在《矛盾论》里，针对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否认同一性这一实际情况，继承了列宁关于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思想，并展开论述。其一，毛泽东概括和表述了同一性的两种含义。不但明确地阐明矛盾内部的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依存，而且还指出了同一性包括着矛盾的转化；其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1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8页。

三，《矛盾论》中用事物运动呈现出的两种状态来肯定和论证了列宁的关于对立面的统一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和斗争性则是绝对的思想，同时又明确地提出："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的重要思想，着重批评了某些人把同一性和斗争性割裂而又将某一方面绝对化的错误观点。

第四，《矛盾论》提出并论证了共性个性、相对绝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精髓的思想。

《矛盾论》在全面而深刻地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关系以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① 这一结论，是《矛盾论》中对唯物辩证法的最突出的贡献之一。

关于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问题，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作过论述，他说："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我们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暂时中找到永久，并且使之确定起来。"②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对一般与个别关系问题，以生动的事例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等等东西开始；从任何一个命题开始，如树叶是绿的，伊万是人，哈巴狗是狗等等。在这里（……）就已经有辩证法：个别就是一般。"又说："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9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4页。

（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任何个别经过千万次的转化而与另一类的个别（事物、现象、过程）相联系，如此等等。”①这也就是说，个别和一般是对立的统一；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一般也只能存在于个别之中。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把一般称作共性、普遍性，把个别称为个性、特殊性，并在肯定列宁关于一般和个别的相互联结的思想的基础之上，明确了两点：一是明确指出，“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一般（共性）和个别（个性），在不同的场合可以相互转化。“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②二是把一般（共性）和个别（个性）、绝对和相对的关系的理论上升到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高度。这是对列宁关于一般和个别对立统一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展。

在毛泽东看来，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之所以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主要是因为：（一）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任何矛盾，都是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对立统一。比如，从事物的总体来看，矛盾的存在是普遍的、绝对的，矛盾的具体表现是特殊的、相对的；从事物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主要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矛盾方面来看，它反映了复杂的事物中各个矛盾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每一对矛盾中矛盾双方的不平衡性，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9—41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93页。

在这中间，不平衡是普遍的、绝对的，平衡是特殊的、相对的；就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而言，矛盾的斗争性是普遍的、绝对的，矛盾的同一性是特殊的、相对的，等等。总之，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相互关系，象是一条中轴线，贯串于对立统一规律乃至整个辩证法的每一个规律和范畴之中。正因为如此，懂得了客观事物的这种关系，也即懂得了这个精髓，就可以对辩证法、特别是它的对立统一规律，真正做到融会贯通。相反，如果割裂了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关系，就会陷入形而上学：或者成为只承认个性而否认共性的相对主义、诡辩论，或者成为只承认共性而否认个性的绝对主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这样讲：懂得了它，也就从根本上懂得了辩证法。（二）因为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不仅反映了客观事物的一种最普遍、最本质的关系，也从根本上揭示了人类认识过程中的正常秩序。人类认识事物，总是从现象到本质、由感性到理性的不断发展和不断深化的过程。在其中，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的认识秩序，特殊和一般相结合的认识方法，贯穿于人类认识的整个过程。毛泽东指出，"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

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① 在毛泽东看来，只有遵循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的认识秩序，采用特殊和一般相结合的科学的认识方法，也就是坚持了唯物辩证法——认识的辩证法，因而也就能够全面地、深入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相反，如果违反正常的认识秩序，割裂特殊和一般的关系，就会在实践中陷入形而上学，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教条主义只承认共性，绝对性，而否认个性、相对性，用一般代替特殊，把理论变成僵死的教条到处套用；经验主义相反，它只承认个性、相对性，而否定共性、绝对性，用特殊代替一般，把局部经验当成普遍真理。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因为不懂得特殊和一般相结合的辩证法，或者说不懂得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的。

总之，毛泽东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概括为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并且强调“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这就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理论。可以说，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贯串和统帅《矛盾论》全书的主题思想，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有独创性的贡献。

第五，《矛盾论》进一步阐发了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相互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84—285页。

转化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很重视矛盾的对立面相互转化的思想。恩格斯在总结当时自然科学成果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转化过程是一个伟大的基本过程。"① 恩格斯还常常把同一性、斗争性和转化作为同一序列的范畴来进行阐述，他说："各种自然力的同一性及其相互转化"②，"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③ 是在同一发展过程中发生的。列宁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转化思想，他在同庸俗进化论的斗争中非常重视矛盾的转化问题，他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④ 列宁在谈到唯物辩证法时，还指出，不仅应当注意研究对立面的统一，而且应当注意研究对立面的转化。

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列宁的矛盾转化思想。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把矛盾转化思想看成是唯物辩证法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最具有革命性的部分。也就是说，毛泽东通过对矛盾转化思想的发挥，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的最本质的精神具体化了，并以此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他指出，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关于毛泽东的矛盾转化思想，长期被人忽视，往往以同一性的又一种含义取而代之。这是应当加以纠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2页。

③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8页。

④ 《列宁选集》第2卷，第850页。

正的。毛泽东的矛盾转化思想有很多独到的见解，贡献很大。概括起来他的主要贡献有二：其一，是把矛盾转化思想运用于阐述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相互转化，主要矛盾方面和次要矛盾方面的互相转化；其二，把转化与同一性联系起来，发挥和发展了列宁的同一性思想。列宁在他的哲学著作中谈同一性主要意思是指“共同”、“一致”、“不可分离”、“结合”、“联系”等含义，即是指事物相对静止状态的联系性。而毛泽东在肯定了列宁这一观点之后，又把列宁的“一切都是互为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的”，“联系也就是转化”① 的思想，与同一性联系起来，把对立面的统一当作一个过程来考察，从而揭示了同一性不仅是事物横的联系形式，而且是事物纵的联系形式、联系环节、过渡、桥梁。这样一来，同一性不仅包括作为一种静态的相互依存的联系形式，而且包括一种动态的相互转化的联系形式。

中国革命的实践是极其丰富的。毛泽东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关于矛盾转化的思想，科学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从理论上论述了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矛盾方面、同一性和斗争性等相互之间转化的条件、特点和规律诸问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对立统一学说。可以说，继列宁之后，毛泽东最系统地研究了矛盾双方的相互关系，进一步揭示了矛盾着的双方如何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变化。正是由于毛泽东对事物矛盾相互转化原理的发挥和发展，对于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彻底的、革命的辩证法，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03页，第192页。

反对形而上学、诡辩论，推进革命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总之，毛泽东一九三七年八月撰写的《矛盾论》，是一部伟大的辩证法著作。这部著作深刻地论述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特别是在全面展开对立统一规律内容和系统论述矛盾法则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精髓”的思想，从而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推进到一个新水平。《矛盾论》的诞生，标志着毛泽东的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形成，它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四节　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在多方面的展开和成熟

毛泽东的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并不是独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之外的哲学思想，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懂得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就要首先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一般规律，同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了解和掌握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基本特点。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也是包含着丰富内容的科学的理论体系。这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就已经确立起来，尔后又经过列宁的丰富和发展，使它的内容更加充实。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因而它的研

究对象，是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它的任务，就是要揭示整个世界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①这说明：唯物辩证法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并且这个研究对象是现实的物质的世界，而不是象古代的朴素辩证法以及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那样，是臆想的和神秘的王国。唯物辩证法所研究的，既不是存在于世界某些领域的特殊的发展规律，也不是存在于某些领域的普遍发展的规律，而是存在于整个世界一切领域、一切方面的最普遍、最一般的发展规律，例如适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各个领域以及各个方面的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等。唯物辩证法所研究的世界的最一般的规律，不是脱离各种具体事物的个别或特殊规律而单独存在的，它存在于个别或特殊规律之中，并且成为个别或特殊规律中的更加稳定的一部分，而个别或特殊的规律，又受到最一般规律的制约。它是指导各门具体科学得以发展的科学思维方法。

唯物辩证法是一系列规律和范畴的总和。恩格斯曾指出：“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实质上它们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②除了上述三个基本规律即质量互变规律、对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4页。

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以外，唯物辩证法还有一系列基本范畴，如本质和现象、内容和形式、原因和结果、偶然性和必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等等。这些范畴，也可以说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的补充和展开，它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揭示了客观事物各种各样的矛盾关系。总之，唯物辩证法是由三个基本规律和一系列基本范畴所构成的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这个科学体系，全面、深刻地揭示了客观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完整、生动地描绘了客观世界发展变化的一般图景，从而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指出了一个总方向。

列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的时候，特别强调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它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他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①又在《辩证法的要素》一文中指出："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②毛泽东正是依据列宁这个思想，不仅在《矛盾论》里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地、极其详尽地说明和发挥，而且在他的其他许多著作中，都对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可以说，毛泽东的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一般规律的前提下，突出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中的地位和作用。

《矛盾论》发表以后，毛泽东更加自觉地应用对立统一规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7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608页。

律，并不断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和概括，使他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在多方面展开，并日趋系统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又写了一系列论述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的著作。比如《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论政策》、《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共产党人〉发刊词》等等，均是应用对立统一规律对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中的诸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同时又对唯物辩证法思想加以充实和提高。马克思说过："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① 中国革命面临着异常强大的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三大敌人，因此，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显得特别重要。因而毛泽东在辩证法方面特别突出地强调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不仅表现在《矛盾论》里，而且在以后的著作中都较充分地论述了这一问题。在毛泽东看来，第一，人的主观能动性必须建立在客观规律性的基础上；第二，物质条件仅仅是使战争胜利、工作成功具备了可能性，要把它变成现实性，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提出精神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决定作用的论断；第三，把主观能动性和群众的首创精神结合起来；第四、把主观能动性和不断总结经验结合起来。这样，毛泽东就把主观能动性的问题植根于唯物的又是辩证的物质运动序列中，同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划清了界限。

如果我们把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作一简单地概括的话，大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

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认识的辩证法。主要著作有《实践论》和《矛盾论》。毛泽东结合我们党与各种机会主义思想斗争的实践经验，系统地阐述了实践和认识的关系，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了人们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的立场和观点，把辩证法和认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条正确的认识路线。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杰出贡献。

第二，军事辩证法。主要著作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等。毛泽东从长期的、复杂的、大规模的、残酷的战争实践中研究战争、总结战争经验，深刻地阐明了许多军事理论问题，战略策略问题，科学地预见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进程和客观规律，系统地阐述了军事辩证法的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增加了新的财富。

第三，历史辩证法。主要著作有《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等。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首先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建立一个中国式的特殊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这个社会的结构及其发展动向，揭示了这个社会发展的历史辩证法。

第四，工作辩证法。主要著作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等。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作出的一个杰出贡献，就在于他在空前未有的规模

上，在空前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上，把辩证法同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仅把辩证法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对形势和任务的分析，对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而且形成了一系列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使辩证法原理通过这个重要环节和桥梁，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接受，由理论形态转化为实际形态。比如，他强调必须做好调查研究，从不同地区、不同条件的具体情况出发，决定当时当地的工作任务和实现这些任务的方法；要实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善于抓典型，一切经过试验；坚持两分法，对于任何问题采取分析的态度，不能搞绝对化，不能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要分清事物的本质方面和非本质方面，分清主流和支流，对于支流方面的问题也要注意解决；要学会“弹钢琴”，注意重点和统筹安排，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同时不忽视解决次要矛盾，把中心工作和其他工作结合好，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

总而言之，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特点，就是把对立统一规律作为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而加以理论上的发挥和实际上的应用。这不仅表现在《矛盾论》产生以前，更表现在《矛盾论》产生以后。《矛盾论》发表之后，毛泽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而他始终坚持对立统一规律这个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在毛泽东看来，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因为，（一）从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内容来看，它揭示了唯物辩证法的最深刻的本质，懂得了它，也就从根本

上懂得了辩证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二）从对立统一规律同其他规律和范畴的关系来说，它处于首要和统帅地位，是理解其他规律和范畴的钥匙。唯物辩证法所包含的规律和范畴，都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过程。其中，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实在内容和根本原因，它贯穿于事物发展、联系的各个方面、侧面和环节。这就是说，唯物辩证法的其他规律和范畴，尽管都有其内涵和外延，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但是，它们又同对立统一规律有机联结在一起，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体现和必要补充。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三）从对立统一规律做为方法论来看，它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学会运用它，也就从根本上掌握了辩证法。因为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具有一致性，它是世界观，也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最根本的科学方法，亦即方法论。因此学会了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于客观世界，也就找到了分析矛盾和处理矛盾的途径，获得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根本的方法。所以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强调要学会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四）从两种宇宙观对立的情况来看，承认或否认对立统一规律是两者斗争的焦点，把握对立统一规律能够从根本上划清同形而上学的界限。唯物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对立表现在各个方面，但是，归根结底，集中到是否承认矛盾，亦即是否承认对立统一规律的问题上。形而上学之所以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看问题，就在于它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立斗争以及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

下相互转化这样一个真理。否认矛盾，正是形而上学之所以趋向极端、片面、僵化、死板的认识论根源，而唯物辩证法则承认矛盾，并从承认还是不承认矛盾的高度，揭露和批判形而上学，这就从根本点上击中了形而上学的要害。也正是由于承认和不承认矛盾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斗争的焦点，是区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最后分界限，所以说把握了对立统一规律，也就从根本上同形而上学划清了界限。

当然，这并不是说，毛泽东把对立统一规律视为唯物辩证法的唯一规律、全部规律，它就等于唯物辩证法。我们从《矛盾论》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对立统一规律只是唯物辩证法的一部分，是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说它是“根本”就意味着还有非根本，说它是“实质”就意味着还有表现非实质的东西，说它是“核心”就意味着还有围绕着核心的东西。根本与非根本，实质与非实质的表现，核心与围绕着核心的东西，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如果否认了非根本、非实质、非核心的东西，那么，说根本、实质、核心，也就毫无意义了。因此，我们既不能把辩证法的三条基本规律和一系列基本范畴平列起来，不分主次，必须看到对立统一规律在整个辩证法中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又不能用一条规律去代替所有规律和范畴。任何偏废，都不符合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的要求和基本精神的。

这就说明，从哲学体系上来说，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并没有再创造一个新的思想体系，它仍然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唯物辩证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从思想内容上来说，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中的重点问题突出了，

即突出地阐明了客观世界的矛盾问题。虽然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同程度地加以论述过，但象毛泽东这样系统、完整和多方面地展开，还是第一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把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称之为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思想。这样，一方面可以说明毛泽东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学生和忠实继承者；另一方面又说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的实践中所进行的独创性的理论活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同志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他指出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尤其重要的是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因此，不能把辩证法看作是可以死搬硬套的公式，而必须把它同实践、同调查研究密切结合，加以灵活运用。他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特别是他论述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重要著作，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①这段话虽然文字不长，但言简意深，扼要地、概括地说明了毛泽东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基本点，也说明毛泽东本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主要贡献。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第五章

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

第一节　唯物史观的创立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伟大革命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曾经用“一整块钢铁铸造的”来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绝不能分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统一体。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继承和改造了旧历史哲学中的优秀遗产，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创立了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创立使社会科学从矛盾和昏暗的迷宫中解放出来，使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避难所——社会历史领域中被驱逐了出去，从而把唯物主义哲学提升为一个完整的、首尾一贯的和彻底的世界观，并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在人类的思想史上，曾经有过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有过近代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而不曾有过本质上是唯物史观的历史哲学。自然观上的旧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家，在历史观上都是唯心主义的。他们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彻底和不完整的。他们哲学体系中的那些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合

理思想，是偶然的，是或多或少的“天才的猜测”，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或“个别情况”，不能当作有确定科学含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来理解，也不能说是什么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或什么其他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所以恩格斯把唯物史观当作马克思的一个“伟大发现”。事实上也正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宣告了旧的历史哲学的终结，实现了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根本性的大革命。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是近代历史哲学发展的合乎规律的必然结果，是对旧历史哲学的扬弃。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简略地说到自己唯物史观形成的过程及其得出的基本结论。他说：“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

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历史观的基础上，相继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内容极其丰富，后来列宁在此基础上又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大大推向前进，从而使唯物主义历史观更加完善和系统化。这样，作为研究社会运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社会运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时候，首先揭示了历史进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问题。他们认为，一般说来，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肯定这一点，就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9页。

是决不会出现的。"①恩格斯也指出过:"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②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社会历史进程,找到了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因。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正是由于社会内部所固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和发展,引起了社会革命,引起了社会制度、社会形态的更替。这就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科学地否定了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观念,使社会历史观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恩格斯分析和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

列宁根据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经验,在理论上坚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他强调社会历史是"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③列宁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3卷,第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4—425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页。

在实践中特别尖锐地批判了历史唯心主义者抽象地谈论“一般社会”的谬论，驳斥了“那种把社会看做可按长官的意志……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① 列宁认为，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列宁还进一步阐明了必须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关系，并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社会历史现象，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根据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创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马克思强调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② 列宁系统地分析、研究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各种矛盾，认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一个国家首先胜利的新学说，并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通过城市武装暴动，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些思想都是极为光辉的，具有普遍的真理性。

马克思、恩格斯还根据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即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首要的根本的标志，就是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1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2页。

夺得国家政权，建立由无产阶级实行国家领导的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①马克思还指出："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②列宁对马克思这个思想进行了充分的发挥，他强调指出："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其繁杂，但本质是一个：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③但是，在不同的国家里，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道路是不相同的，革命胜利后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也是不相同的，不可能有一个适用于一切国家的固定不变的模式。而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究竟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只能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来决定。这是列宁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原则。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不懂得这一点，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看成死板的教条，到处搬用。为此列宁批评机会主义时指出："他们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却迂腐到了极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懂得。马克思说在革命时期要有极大的灵活性，就连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完全不了解。"④列宁确实根据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情况和新经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第200页。
④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31页。

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批判了种种否定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论调，论述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而，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生产方式向前发展和新陈代谢的历史。从这个根本观点出发，历史唯物主义必然肯定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决定作用，同时承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指出："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他还强调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①列宁称这是"一条最深奥同时也是最简单明了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并且进一步指出："我们所要实行的改造愈深刻，就愈要唤起人们对这种改造的兴趣和采取自觉的态度，使千千万万的人相信这种改造的必要性。我们的革命所以远远超过其他一切革命，归根到底是因为它通过苏维埃政权发动了那些以前对国家建设漠不关心的千百万人来积极参加这一建设。"②列宁还说："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③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具体分析和论述了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之间的辩证关系，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5，104页。
② 《列宁全集》第31卷，第452页。
③ 《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9页。

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日益尖锐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创立了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创立，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卓越贡献就在于他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和灭亡的理论运用于俄国的实际，领导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

毛泽东的唯物史观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毛泽东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反映在他的许多著作中，特别是《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这两部重要政治著作，更放射出毛泽东的唯物史观的灿烂光芒。

第二节　毛泽东的唯物史观是在同各种错误观点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需要，概括总结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

恩格斯逝世后，列宁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并且根据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新经验，充实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列宁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对中国革命也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帮助，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但是，无可否认，斯大林在其长期的领导工作中，特别是在理论上，有的时期有的方面又偏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同时斯大林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也产生过坏的影响。正如毛泽东所说："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① 因此，毛泽东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尤其是在继承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过程中，就面临着来自"左"的和右的两个方面、两条战线的斗争。毛泽东的唯物史观正是在这种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的唯物史观的萌芽，在他的青少年时代已有表露。但毛泽东的唯物史观的逐步成熟，还是与中国革命运动密切相关的。主要是从总结中国近百年来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从总结多少年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发展起来的。二十世纪最初十年，是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疾风暴雨的年代，它以义和团勇士们的热血宣告了光华灿烂的开端，但却又完结在辛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7页。

亥革命那悲惨的胜利之中，辛亥革命的失败是中国近代史乃至近代世界史上富有教益的一课。中国共产党正是诞生在这悲壮而又使人感奋的年代之中。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行动指南，但进行什么性质的革命，怎样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面临着的一个重大的课题。有人主张进行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也有人主张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革命的性质看法不一，首先是因为对中国的国情认识不清。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① 毛泽东的这一思想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对毛泽东唯物史观发展的探讨，应该首先从这一问题上开始。

自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早期先进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就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的国情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毛泽东吸收了他人的研究成果，并亲自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大量的考察和深入的分析。毛泽东认为："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②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正是在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这种社会形态的基础上，在同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产生和形成的。

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革命就是在这些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一个从旧民主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89页。

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过程，这两者之间有着原则的区别。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人民的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使中国的民主革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它的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毛泽东指出："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①这样，毛泽东就从理论上驳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种纯粹的农民革命或是一种纯粹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的错误论调。这是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原理来观察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所得出的科学结论。后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年代里，毛泽东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原理。通过对中国国情的具体分析，他提出了以武装斗争为主要特征，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革命根据地为依托的三位一体的思想，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思想。由此，中国革命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的这一理论是在不断同党内的"城市中心论"、"害怕农民势力超过工人运动"的错误理论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的这一理论，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反映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7页。

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①毛泽东利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先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建立红色政权，在巩固中发展，在发展中巩固，“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②这样，毛泽东就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批判了党内的教条主义不具体分析中国国情，生搬硬套外国经验，使中国革命归于失败的错误。

毛泽东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在理论和实践上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理论，提出了在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他坚决抵制和批判了陈独秀的中国无产阶级不能领导、也不应该领导革命和张国焘的只有工人阶级才革命，否认无产阶级要有同盟军的错误观点；坚决抵制和批判了王明后期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观点和作法；也坚决地批判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企图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各种错误论调。毛泽东从社会主义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出发，充分论证了中国无产阶级的特点和优点，得出只有无产阶级有能力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的结论，在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捍卫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毛泽东又正确解决了无产阶级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8页。

领导谁和如何领导的问题。首先是对农民的领导。他指出："贫农和中农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① 其次是对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毛泽东还根据他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将资产阶级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两部分。这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即有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一面，又有向敌人妥协的一面。所以，无产阶级就有对其"争取领导权的任务。"② 对于大资产阶级，根本谈不上领导，而是要同他们作斗争。但是，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统一战线中可以包括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但这只是为着无产阶级的总的战略原则而采取的策略手段。这些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关于社会革命的原理，是毛泽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伟大的贡献。

在这里，还有一个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毛泽东娴熟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毛泽东指出："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③ 在领导的过程中，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0页。

“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与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①这些思想，毛泽东在革命初期，就已身体力行，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步形成了系统化的理论。它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结合，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党的具体工作方法融为一体的光辉典范。

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理论，毛泽东是将群众观点和领导方法结合起来加以解决的。他认为没有坚定的群众观点，就不可能在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单有为人民服务的热情，而无正确的领导方法，也不能把工作做好。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坚持彻底的唯物辩证法原则，批判了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两种错误倾向。命令主义，超出了群众的觉悟程度，害了急性病；尾巴主义，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害了慢性病。因而，都是错误的。毛泽东提出既要从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实际出发，又要放手发动群众，积极领导群众前进。这正是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和实现领导权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总结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批判了“左”右倾两种错误倾向，从而科学地奠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思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卓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68页。

越贡献。

毛泽东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总结概括出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个战胜敌人的“法宝”；精辟地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和策略是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的思想；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深刻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方面的理论，提出了许多具有长远意义的思想，成功地摸索了一套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经验。这样，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人民的长期艰苦的斗争实践中，形成了独具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它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第三节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的唯物史观

《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是毛泽东的两部政治论著。在这两部光辉著作中，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他所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典范，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光辉思想。

首先，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认为这是研究中国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首先应该明了的问题。他指出，

自周秦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封建社会。自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以后，中国就逐渐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这种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首先要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状况，才能造成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由于分析了束缚中国社会生产力、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是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及其阶级表现，从而也就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性质等基本问题。

毛泽东在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阐明了革命的基本问题之后，又以此为指导，详尽地分析了这些特点在国内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上的具体表现，为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提供了依据。在这两部著作中，毛泽东着重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状况和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这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斗争的两个基本问题。陈独秀夸大了资产阶级的作用，拱手把革命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王明则把民族资产阶级推向敌营，鼓吹“中间力量危险论”。而且他们都看不到农民的作用。能否正确处理这两个问题，是革命成败的关键。毛泽东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科学分析，进一步发展了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思想。毛泽东对中国资产阶级分析的独到之处，是把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为附属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和具有两面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又通过比较揭示了民族资产阶级同旧俄资产阶级的区别，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斗争策略提供了依据，从而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问题。毛泽东对中国社会进行政治和经济分析中，大量使用比较法，例如各阶级的比较、历史的比较、中

国和外国的比较、不同理论的比较等。通过比较揭示事物的特点和相互联系，把握中国历史的发展及其规律。同时，毛泽东还把分析事物矛盾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殊性的原理和方法，应用于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过程，指出，在整个民主革命阶段中，虽然革命的基本性质没有变，但因为敌情和同盟军的变化，又分为若干小的阶段与之相适应，“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在几十年中，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是不变的。但是在这个大阶段的各个小的阶段中，情形是变化了和变化着的，我们的具体纲领便不能不有所改变。”①这也是从国情出发的重要方面，是着眼于国情的发展变化的。这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这个彻底的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基本观点。

毛泽东在这两部著作中，详尽地分析了各阶级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特别强调要时时刻刻注意分析人民群众的动向。这就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这方面有很多正确的、原则性的指示，而毛泽东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许多基本原则都给予了充实、丰富和发展。

其次，毛泽东以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为指导，科学地解决了中国的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关系问题，这是《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的一个重要思想。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毛泽东总结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63页。

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理论为指导，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关系给予了辩证的说明。

第一，毛泽东坚持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明确提出，把是束缚还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衡量政治经济制度和政党政策好坏的标准，阐明了制定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的根本依据。他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①毛泽东以这个标准对旧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作了深入的分析，指出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是一般私有制，不是一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是地主阶级、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所代表的反动生产关系，这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变革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而要变革这种经济制度，就必须摧毁为它服务的反动的上层建筑。同样，由于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与这种生产力相适应，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也不能立即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只能实行"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政策，建立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经营三者组成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以发展生产力，"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②只能建立既不是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苏联式的无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56页。

产阶级专政，只能是过渡性的国家形式，即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反映这种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的文化，就只能是无产阶级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下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第二，毛泽东坚持政治对经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性的反作用的观点，阐明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重要性。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这两部著作中，毛泽东反复强调政治革命的重要性。他指出："政治不改革，一切生产力都遭到破坏的命运，农业如此，工业也是如此。""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① 毛泽东把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民主联合政府，作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其他纲领的前提。在阐述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时，他明确划分了国体和政体，提出了建立适应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的、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形式，强调人民武装是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后又发展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这些见解，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贡献。

第三，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这两部著作中，突出地阐明了思想文化战线在革命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在《矛盾论》里说过："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1-982页。

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①在这两部著作中他又进一步阐述和发挥了这一观点。概括起来，他在这里着重强调：（1）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重视文化战线的斗争，坚持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文化既反映又反作用于政治和经济。因此，在中国社会的新旧斗争中，也包括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毛泽东认为，在文化领域，我们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加强无产阶级对思想文化的领导，坚持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此要扩大共产主义思想宣传，坚持用共产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使我们的党员和干部都用科学的世界观武装起来。（2）强调文化必须为政治和经济服务，这是由文化和政治、经济和辩证关系决定的。如果文化不为政治和经济服务，那它就失去了意义，在革命中也就不可能有它的地位。当然，如何服务，因时间、地点、条件不同应有不同的形式。（3）根据社会意识形态都具有继承性和阶级性的特点，毛泽东提出了对待外国文化和中国文化遗产的正确方针，即对两者应该分清其精华和糟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取其精华也不能生吞活剥，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经过消化，和民族特点相结合。后来毛泽东又明确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都是讲的批判地吸收。

再其次，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书中，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提出了党的三大作风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了如何进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问题。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0-301页。

毛泽东讲的党的三大作风即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关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作风、关于自我批评的作风是唯物史观的应用和具体化。也就是说，毛泽东科学地总结了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反映无产阶级政党本质特征的三大作风，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贡献。几十年来，它武装了全党，渗透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全部活动中，保证了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坚强的战斗力，保证了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证了中国共产党能够以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人民夺取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

总而言之，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这两部著作，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其中有中国革命的战略步骤、无产阶级领导权、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和建设等问题，重申了武装斗争和建设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坚持了关于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正是通过这些政治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充实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可以说，在这两部著作中，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和观点，都讲到了，并且作了很好地发挥和论述。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这两部著作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的以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为核心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完全成熟。当然，毛泽东的唯物史观不仅仅表现在这两部著作中，而是表现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因此，要认识和掌握毛泽东的唯物史观，就必须研究他的全部著作。如同他的其他思想一样，毛泽东的唯物史观也有一个形成和发展过程。只有了解和掌握这个形成和发展过程，才能认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突出贡献。

第四节　毛泽东的唯物史观的基本特征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史观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时代对毛泽东提出的历史任务。但是，怎样才能结合起来，如何结合好，这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探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和理论创造，为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斗争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特别是列宁反复强调过要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同本国本民族的实际斗争结合起来，不能照抄照搬马恩经典著作和外国革命经验。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要同来自“左”的和右的两方面的错误倾向作斗争，毛泽东正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在同“左”右倾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了自己有中国特色的、有独到见解的唯物史观。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毛泽东就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进行了斗争，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具体地分析了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分析了中国社会这种矛盾运动的特殊性，这种矛盾运动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在一九二六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就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进行了科学分析，明确地指出，分清革命的敌、我、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他说：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① 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的分析，确立了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革命的对象、动力和同盟军诸问题。这是毛泽东具体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的结果。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从中国当时的具体情况出发，分析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经济的特点，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即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农民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根据地为主要阵地的思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和抛弃了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谬论，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这种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和具体形式，打破了无产阶级革命起义总是从大城市开始的观念，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的学说增添了崭新的内容。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都是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页。

史观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探索的初步成果。《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学说，分析和观察社会的运动和发展，指出了社会的变化，主要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新旧社会的新陈代谢的观点。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已经理论化和系统化了。这说明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已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毛泽东一九四〇年一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一九四五年四月发表的《论联合政府》这两部光辉著作，是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典范，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系统的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后来，毛泽东又把自己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形成了一整套适合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如果把毛泽东的唯物史观的基本特征作一概括的话，大体上有以下几点：

第一，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为核心的社会历史观。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系统化，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一切工作中必须坚持的群众路线。在毛泽东看来，所谓群众观点，最根本的就是一切为了群众和一切依靠群众的观点。一切为了群众，这是由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所决定的，是中国共产党从事一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他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

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又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①一切为了群众的观点必然派生出一切向人民负责的观点。向人民负责，这是共产党人言行的根本原则。向人民负责，就是要敢于为人民的利益而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毛泽东指出：“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②一切依靠群众，这是相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的必然结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具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的历史活动创造了自己的一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因此，要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反对恩赐观点和包办做法。一切为了群众的观点、一切向群众负责的观点、一切依靠群众的观点，还必然引申出向群众学习的观点。因为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而个人的才能和力量是有限的，所以必须向群众学习，从群众的实践中汲取思想营养和行动力量。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在群众面前，只有当好学生才能当好先生、当好领导。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由于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反复不断地教育党员和干部树立牢固的群众观点，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保持鱼水关系，中国革命才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战胜了帝国主义支持的中国近代史上最强大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5-996页，第99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26页。

反动派，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且在建国后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毛泽东认为领袖人物的天才不是靠一个人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领袖人物的天才是靠集体智慧、群众路线取得的。毛泽东把天才归结为集体智慧，进一步发展了列宁关于领袖是一个集体的思想，从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天才观。总之，毛泽东在结合中国革命斗争实际阐述哲学问题的过程，特别是阐述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过程，也正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他对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提得这样高，这样系统，这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是没有的。

第二，以社会基本矛盾为根基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学说。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的实践经验则进一步将这两对矛盾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并以此为根基，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客观世界，观察社会的历史发展，提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道路和形式诸问题，并且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及其必然导致在中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但它却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专政形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毛泽东在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中，又进一步论述了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认为一切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其基本矛盾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根据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实践

经验，他肯定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同时又特别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及其方针政策、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革命的主观能动性在历史活动中的巨大作用。在毛泽东看来，社会基本矛盾贯串于人类社会的各个社会形态及每个社会形态的始终。是社会运动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源泉。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社会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决定着由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飞跃。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就是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史，就是这种矛盾不断产生、不断解决的历史。毛泽东这些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提出的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第三，唯物史观与认识论的高度统一。

毛泽东把唯物史观中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实践第一的观点结合了起来，他不仅强调认识依赖于实践，而且强调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认为人民群众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与认识活动的主体是一致的。他在《实践论》中，就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活动、关于社会的成员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的论述，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实践观点融为一体，作了卓越的阐发。他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在论述群众路线时，又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个别与一般的原理融为一体，作了精辟的说明。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

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① 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就是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把群众的意见、要求、愿望和智慧集中起来，形成领导的决定、方针、政策和办法，这大体上相当于从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的过程。这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特点，第一次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实践观点、认识的辩证过程的原理同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第四，唯物史观与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的高度统一。

在长期复杂的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的实践中，毛泽东不仅把唯物史观与认识论统一起来，而且又把这种统一直接化为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这是毛泽东唯物史观中的又一独特内容，也是他的突出贡献之一。当然，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作到这一点，并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很长时期内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里和条件下开展革命活动的。除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得到群众的充分信任和强有力的支持，没有其他可以依靠的力量，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为根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同强大敌人和无数困难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总结出来的无比宝贵的历史经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4页。

验。毛泽东把这一历史经验在哲学上进行概括，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内容。

总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研究、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在实践中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也是毛泽东的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特征。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问题出发，创立了唯物史观。同时，唯物史观一旦创立，他们又以这个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用以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列宁通过分析帝国主义阶段的各种社会矛盾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以此为指导，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的实践中，在同主观主义的斗争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观察和指导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创立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这些都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以上这些是毛泽东的唯物史观的基本特征，也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突出贡献。毛泽东的唯物史观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不断进行新的探索的结果。这种新的探索是富有成果的，充实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各种原因，毛泽东虽然没有留下一本全面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专著，但是他写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其他许多著作中，都反映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毛泽东本人虽然不在人世了，但他给我们留下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以及他的革命实践

活动，却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主要依据。当然也是我们研究他的唯物史观形成和发展的主要依据。毛泽东的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必须毫不含糊地给以充分肯定。

第六章

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第一节　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形成的理论前提

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此要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就不能不研究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军事辩证法方面取得辉煌的成果，是他勤于学习前人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再创造的结果。毛泽东在他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一方面注意研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借以武装自己的头脑；另一方面又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军事辩证法思想。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同中华民族的民族形式、民族特点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军事理论的研究。他们通过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的批判，把军事理论

和军事思想牢固地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体系之上。特别是恩格斯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深入地研究了历史上大量的有关战争的资料和军事文献，并深入地调查研究了欧洲各国的战争情况。他在掌握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撰写了一批军事科学论著，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对军事问题给予科学的分析和论述。马克思对恩格斯的军事理论评价极高，认为它是经得起实践考验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战争作为一个具体的社会现象，是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并将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失。这是战争观上的历史唯物论。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人们要进行战争，就要有军队，而要建设军队和进行战争，就必须有一定的物力和财力。要得到可供战争消费的物力和财力，就必须大力发展物质资料的生产。恩格斯指出：暴力是军队，军队需要“巨额的金钱”。但暴力不能铸造金钱，“归根到底，金钱还必须通过经济的生产才能取得；就是说，暴力还是由经济情况来决定，经济情况供给暴力以配备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但是还不仅如此。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①又说：“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6页。

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①反过来说，暴力、军队的状况也必然反映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从一定意义上说，军队的建设是一定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一个缩影。所以通过对军队和战争史的分析和研究，就可以了解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发展史。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任何一种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都是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反映。无产阶级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反映。但这并不否认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的继承性，恰恰相反，无产阶级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是在吸取了前人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立的。在阶级社会里，各个阶级为了本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进行战争。特别是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资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在战争理论和战争实践上为人类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主要是指它进行的反对封建阶级的战争。由于资产阶级在军事上绝对地压倒封建阶级，即它的军队、作战体系的庞大和作战方法的灵活性、机动性、运动性，这些都正是封建阶级所不具有的。当然这是由于生产的高度社会化造成的。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以后，它所用以进行侵略的战争就是非正义的战争。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无产阶级要想取得政治统治地位，就要有自己的作战体系和作战方法，否则难以战胜资产阶级。但无产阶级的军事作战体系和作战方法的理论表现，即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6页。

产阶级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不是在资本主义现有的基础上后退，而是在它已创造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前进；无产阶级在军事上的任何特点，不在于减少资产阶级的特点，而恰恰相反，在于把它提高到更新的水平。但是，无产阶级进行的战争怎样体现出高度的灵活性、机运性、运动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具体的分析，因为他们还缺乏足够的实践。后来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在战争实践中充分发展了这些思想。

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战争规律的客观性和掌握战争规律的重要性。

战争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但只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加以分析和研究，就会发现它有自身的发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强调，军队建设、作战、武装斗争等是一门艺术，它本身有其固有的规律性。因而，从事军事斗争的人们必须尊重军事斗争的规律性，否则就会到处碰壁。他们在总结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斗争经验教训时，指出了三条重要的原则：（一）尊重军事规律的客观性，不要玩弄起义。起义前必须有充分的物质和精神准备，并准备应付一切可能出现的恶果。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极不确定的各种因素的方程式，这些不确定的数值天天时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二）掌握军事规律的灵活性。他们提出，武装起义的人们，必须在敌人未集中以前，集中优势兵力，出其不意，灵活机动，消灭敌人，取得战斗的胜利；并且在战斗中，能逐步取得有助于全局胜利的局部胜利。他们还提出，保持武装起义第一次取得胜利，以造成起义的人们在精神上的优势。（三）运用战争规律的游击战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

场上，第一次为被压迫的、弱小的民族指出了求得解放的道路。历史证明，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都是在极其艰苦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从事解放战争的，这样在战争初期，就往往有一个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保存自己的过程，避免与敌人进行决战和正面作战，而最有力的手段是游击战。恩格斯指出：游击队可以“扰乱前进和退却中的敌人，使敌人经常惊恐不安，……并使他们对于一切运动都失去信心。”①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通过对这些原则的分析，论证了战争规律的客观性和掌握战争规律的必要性、重要性。

第三，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地分析了战争中人和武器的相互关系以及各自的作用。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任何军队都是由一定数量和一定质量的人组成的。因此军队中官兵的思想状态、军事素质、文化程度、技术水平、勇敢与否等因素，对战争的胜利关系最大；但军队的技术装备、武器配备、对敌人的杀伤能力，对战争的胜利关系也是极大的。因此，在人和武器的关系上，只重视人的作用是片面的；反之，只重视武器的作用，也是片面的。恩格斯说：“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②赢得战争胜利的不是枪而是人。因此，恩格斯认为，军队的士气，严格训练，军队所有人员的充沛精力和灵巧，吃苦习惯，对军事知识的学习和掌握，对武器构成性能和构成原理的掌握等等，对军队的作战能力的获得，都是重要的。同时恩格斯还批判了忽视武器的作用、忽视新的武器与新的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217—21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1页。

战方法的唯心主义思想。他认为现代化战争的内容之一，就是现代化武器之间的较量，是技术的较量，钢铁的较量，杀伤人的较量。在战争中，光强调赤手空拳是错误的。恩格斯指出：生产上不搞发明创造，军事上也不能用旧手段达到新的目的。只有创造新的更有威力的手段，才能具有新的更伟大的力量。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人和武器关系的问题上，既坚持了唯物主义又坚持了辩证法的观点，即把战争中的人和武器有机地统一了起来。

第四，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正义战争必胜的原则。

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指出：巴黎工人六月起义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这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这是为保存或消灭资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战斗。"①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史上却留下了极其辉煌的一页。"1848年革命运动的主要成果不是人民赢得了东西，而是他们失去了东西，——他们丢掉了幻想。"②就是说，无产阶级通过这次斗争的失败认识到，无产阶级要想得到解放，只有革命，只有进行革命战争。马克思形象地指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③恩格斯也称无产阶级革命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④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对历史发展能够起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6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30页。

“火车头”、“发动机”的作用，是因为它可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冲破各种反动的、落后的罗网而走向彻底解放的道路。人民群众的革命战争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是必胜的。但正义的战争要取得彻底胜利，还必须有自己的特殊方法，即“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方法。”① 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的方法，是建立在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敌我双方力量的基础之上的。正义的战争虽然必然战胜非正义的战争，但正义战争要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就得有一个积蓄力量的过程，不可能在一个早晨就把资本主义制度彻底推翻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它要教育群众，发动群众，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到人民战争的队伍中去。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军事思想，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军事问题上的运用和发展。列宁和斯大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列宁和斯大林根据无产阶级战争新的实践经验，系统地论述了无产阶级战争与政治的辩证关系。他们着重强调了建立无产阶级军队的必要性，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军队的领导以及全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等问题。斯大林在直接指挥作战的实践中，更突出地强调了建立一支强大的无产阶级军队的重要性。列宁和斯大林以新的战争经验充实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军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36—337页。

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更趋完善。

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的过程中，还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毛泽东在成为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前，就阅读和研究过大量的中国历史古籍和兵家著述。在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从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思想同中国古代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进行了比较，批判地吸收了其中有用的东西，从而充实、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思想。从这个意义说，中国古代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也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

中国古代兵家著述中，有极其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比如，《孙子兵法》一书就有极为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它对毛泽东形成军事辩证法的科学体系发生过重要影响。因此简略地分析一下《孙子兵法》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对了解和掌握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是十分有益的。

《孙子兵法》中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孙子兵法》坚持“天”是没有意志的，只不过是阴阳、寒暑、时令变化的自然现象。孙子从这一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认为战争的胜负不取决于“天”，而是人们在战争进行之前可以预见的，这就是“先知”。先知的关键是“知己知彼”。他说：“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全可。”[1]所以《孙子兵法》

① 《孙子·地形》

主张在作战当中，要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并及时总结实战经验。《孙子兵法》在战争问题上反对天命观的影响，主张从战争这一实际存在的客观规律出发，从中找出可以取胜的经验。虽然这些见解还是直观的，但它确实闪耀着朴素唯物主义的光辉。

《孙子兵法》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非常突出。它反复强调“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① 孙子看到了战争是尖锐的生死斗争，所以要达到“自保两全胜”的目的，不仅要客观地而且还要全面地考察战争的本质特征。只了解一方，不了解另一方，是不行的。孙子在战争史上第一次提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个命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的实践中把这个命题称谓“科学的真理”。为此孙子提出要认识和处理好几个关系：第一，有利与不利的关系。《孙子兵法》提出“杂于利害”的思想，即“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② 就是说，一个聪明的将帅，要在不利的条件下，看到有利的条件，促其转化；同样，在有利的条件下，看到不利的因素，防止其转化。这是辩证地分析问题的方法。第二，虚与实的关系。要避其实，击其虚，以实击虚，以达到攻必克，守必固。《孙子兵法》主张要在战争中捕捉战机，争取主动，以实现以实击虚，大获全胜。它写道：要“以迂为直，以患为利。”③ 这就是说，要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达到径直的目的，化不利为有利，

① 《孙子·计》
② 《孙子·九变》
③ 《孙子·军争》

战而胜之。毛泽东认为这个原则有普遍的意义，他说："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①。第三，在战术指导上，要认识和掌握奇与正的辩证关系。《孙子兵法》认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②就是说，作战总是以"正"兵挡敌，以"奇"兵取胜。但奇与正的变化是无穷无尽的，要很好地运用它并不容易，这是一门指挥的艺术。关于奇与正的问题，历来为兵家所重视。毛泽东在实践中充分发挥了这一思想。第四，"不可为"与"可为"的关系。《孙子兵法》中虽然未提出"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范畴，但它提出了著名的"不可为"和"可为"的问题，这就含有尊重客观规律性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思想。《孙子兵法》认为，违背客观条件和限度的行为，是"不可为"，"不可为"就是要求在战争中不能违背客观规律性；符合客观条件和限度的行为，是"可为"，"可为"就是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孙子兵法》中特别强调要把客观有利条件和人的主观努力相结合，即把"不可为"与"可为"二者结合起来，才能使自己的军事力量得到充分发挥。《孙子兵法》的这个思想对毛泽东影响很大，他在论及军事战争的著作中，几乎都充分论述了尊重战争的客观规律性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可以说这个问题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孙子兵法》在分析和研究战争的时候，将朴素的唯物主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0页。

② 《孙子·势》

义和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强调一个指挥员对待战争，应该“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不算乎。”①这是说作为一个指挥员，在战前制定计划越符合实际就越有胜利的把握，“先胜而后求战”，就是周密的制定计划。但它又反对机械地实施计划，指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②即是说用兵作战没有固定不变的方式、方法，只有依据敌情变化而变化自己的作战方法，去争取战争的胜利，才算用兵如神。为此《孙子兵法》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原则：“践墨随敌，以决战事”。践，是实行，墨，是绳墨。它既要求“践墨”，即坚持原则，但又要求“随敌”，即抓住战机，以决战事。在这里，《孙子兵法》提出了一个如何对待军事理论原则和作战行动的关系问题，并给予了恰当解决。毛泽东极其重视《孙子兵法》中的这个思想原则，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实践中把这一思想进行了充分的发挥，强调在战争实践中学习战争。

当然，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不单是批判地继承了《孙子兵法》中的辩证法思想，而是批判地继承了历史上一切先进的思想遗产，其中包括象《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文学名著中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他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地吸收了中国历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一切有用的思想，使之为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服务。这就是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哲学、政治学、军事学等方面作出贡献的重要原因。

---

①② 《孙子·计》

总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的长期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与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实际情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不是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条文，而是通过批判地吸收中国古代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通过总结无产阶级军事斗争的实践经验，逐渐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军事理论和军事原则。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形成，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军事原则，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二节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探索

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头脑里固有的，而是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毛泽东在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就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探索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规律问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因素，毛泽东还不可能在战略战术问题上提出更多的创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给中国共产党人上了生动的一课，逐渐使他们认识到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就是以军队为主要组织形式，以战争为主要斗争手段，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农村为根据地，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

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客观规律性的探索、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主要产生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以后，率军进入井冈山地区。在井冈山时期，由于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工农红军就不得不在反“围剿”中求得生存。因此，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十年间，中国战争的主要斗争形式就是“围剿”与反“围剿”。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的初期，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探索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和道路，初步解决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方式方法问题。后来，毛泽东通过总结反“围剿”胜利的经验，在军事上提出了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和对敌作战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①。这些战略战术原则，是唯物辩证法思想在战略学战术学上的具体体现，也可以说它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雏形。

中国工农红军的反“围剿”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问题上作祟，致使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我们的红军主力不得不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转移到中国的西北地区。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8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五年结束长征，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后，为了迎接新的革命斗争，开创新的斗争局面，迫切需要从政治上和军事上系统地总结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经验和教训，清算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回答党内在政治路线、军事路线上的重大争论和原则分歧。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毛泽东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系统地解决了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政治路线上的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又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地说明了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问题，从军事路线上清算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党内军事问题上的重大争论作了科学的总结。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思想。这篇文章的第一章，毛泽东着重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对战争的基本观点和研究战争的基本方法，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方法论，即研究战争必须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研究战争必须要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战争必须处理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研究战争必须善于学习、努力实践，使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第二章，毛泽东运用第一章所论述的战争观、方法论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指出中国革命战争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战争的领导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由谁来领导，这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三章，着重论述了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关键是要正确认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否则，就不可能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第四章，是第三章的继续，

它进一步从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形式，阐述了战争的特殊规律。第五章，着重论述了战略防御问题，这是中国工农红军作战中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在这一章中对战略防御的论述是很全面的，它系统地论述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和一系列作战原则。总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一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军事著作，也是一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它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的客观规律中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

为了便于研究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必要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基本思想作一个概略的分析：

第一，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战争观。

毛泽东指出："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①"我们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出发于我们要求消灭一切战争的志愿，这是区别我们共产党人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界线。"②这是无产阶级立场的体现，是唯物史观在战争问题上的集中反映。

（一）战争的产生、发展和消灭，是由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所决定的。

毛泽东指出："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③这一概括，精辟地阐明了战争的起源和实质，指出了战争是阶级社会矛盾斗争的产物，是斗争发展到采取外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5页。

部对抗的形式的表现，是一种最尖锐、最高的政治斗争形式。因此，依据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和所怀有的政治目的，历史上的战争可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两类。马克思主义者对待战争的态度，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历史使命就是打起正义战争、革命战争的旗帜，经由我们革命者之手来消灭阶级以至最后结束人类战争，实现共产主义。

但是战争的弃取不能由人们的主观愿望来决定，而是由社会的发展的客观规律、由社会的经济条件所决定的。因而战争的指导要符合战争的客观规律，“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因此，我们红军的指导者，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即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之上，就必须发挥我们的威力，提挈全军，去打倒那些民族的和阶级的敌人，改变这个不好的世界。”① 这就是说，指导战争，既要从客观物质条件出发，反对主观臆想；同时还要掌握客观规律，去能动地改变条件，达到人们的目的。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在战争问题上的运用。

（二）军队的装备、编制、训练、作战及战略战术是由武器生产和国家整个工农业生产水平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战争观的实质，就是强调战争的物质决定战争的精神，战争的存在决定战争的意识，战争的实践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6页。

决定战争的理论，战争的客观规律决定人们对战争的主观指导。战争的一切物质运动是可以认识的。毛泽东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不但坚持了上述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而且在战争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一观点，强调战争是由阶级社会敌对阶级双方有组织有训练掌握武器的军队，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为了达到各自的经济、政治、军事目的而进行的你死我活的流血斗争。在战争中比较或评价作战双方战斗力的强或弱，是由双方军队使用的武器优劣和掌握使用武器的士兵军政素质的高低而决定的。由恩格斯提出为列宁赞赏的关于战争形态的发展是以武器为基础，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为基础；军队的装备、编成、编制、战略战术是以当时社会物质生产技术水平和交通状况为基础等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战争物质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当然也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的物质生产决定武器的生产，武器的生产决定军队的装备，军队的武器装备决定军队的编制，军队的编制决定军队的训练，军队的装备、编制、训练决定军队的作战形态，军队的作战形态的实践决定军队作战的战略战术。符合战争客观物质运动规律的战略战术可以指导战争取得胜利。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工农红军没有一个统一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没有自己独立的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化军事工业，人民军队的武器来源不是由我们自己的工厂来制造，主要是取之于敌人，其方法有二：一是起义部队带过来的；二是歼灭敌人缴获来的。而其中主要的是依靠多打胜仗，多歼灭敌人，多缴获敌人的武器来装备自己。因此我们军队的编制主要的是步兵，我们的训练主要是步兵的技术和战术，战争形态主要的是点、线、

面相结合的陆地步兵战。所有这些物质因素是研究中国战争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

（三）战争的胜负是由作战双方全部物质力量的互相竞赛、彼此较量与双方在战略战术指导上的正确与否决定的。

斯大林曾指出：战争的胜负是由后方的巩固性，军队的战斗精神，师团的数量和质量，军队的武器，军队长官的组织能力来决定的。毛泽东在中国战争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了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出："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①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工农红军的武器装备主要来自敌人。敌人的武器装备虽然优于我们，但差别不太大。因此在武器装备上我们还是可以和敌人较量一番的。特别是由于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有全国人民的支援和拥护。在这种情况下，装备较差的人民军队，只要在主观指导上不发生失误，是完全可以战胜敌人的。第一次、第二次，以至第三次、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事在人为，主观能动性的不同发挥会得到不同的结果，而只有实事求是，从客观的物质基础出发，才能正确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从反面说明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的重要性。

第二，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的战争方法论。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就关于研究战争要着重把握的方法论问题，毛泽东作了充分的系统的论述：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6页。

（一）在毛泽东看来，战争这种社会现象，比起其他事物来带有更大的流动性、不确实性和偶然性。但是战争同世界上其他事物一样，也有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且这些规律是发展变化的而不是凝固不变的。因此人们要研究战争，就要研究战争规律，着眼其特殊性和着眼其发展变化，反对机械论即形而上学。

毛泽东还把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原理用来分析、研究和把握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阐明了战争有其共同的规律，又有其不同的特殊规律。所以“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①一般的战争规律，揭示了战争双方诸因素的内在的联系和发展趋势，是诸种战争的共同本质。它可以给从事各种具体战争实践的人们提供一般的指导和预见。然而有了对一般战争的规律的了解，还不等于认识和掌握了具体战争的特殊规律，还不等于解决了具体战争的特殊矛盾。为此，毛泽东提出，战争的指挥者必须从一般战争深入到特殊的革命战争，再深入到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这个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的研究方法，是人们认识事物的科学方法。但是，如何研究战争的特殊规律呢？毛泽东从方法论指出：研究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要根据时间、地域和性质不同，“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②也就是说，所谓要研究特殊规律，就是要捕捉具体事物的特殊本质，要从事物矛盾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特殊性出发对事物进行研究，即由于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7页。

战争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这是对王明等人的战争机械论观点的有力批判。

（二）毛泽东强调了研究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必须从战争的全局和局部关系上，研究具体战争的特点及其发展。

战争的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也是战略学和战术学的关系。毛泽东通过对战略和战役、战术关系的研究，深刻地阐明了全局和局部的关系：第一，要树立全局观点。在战争中，一个指挥员只有从总体上、全局上把握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才能自如地驾驭战争并夺取战争的胜利。第二，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局部对全局的关系。“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① 因为客观事物的发展的不平衡性，各个局部在全局中的地位是不同的。毛泽东提出要善于抓住带有决定意义的局部。“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这一着就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局部。第三，要掌握好全局和局部的相互关系。由于客观事物的范围极其广大，它的发展是无限的。所以在一定时间、地点和场合为全局的东西，而在另一时间、地点和场合则变为局部的东西，反之也一样；在一定时间、地点和场合为局部的东西，而在另一时间、地点和场合则变为全局的东西。毛泽东提出，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因此不应当把全局和局部的区分绝对化。也因此要从全局和局部的相互转化中研究战争并指导战争取得胜利。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9页。

（三）研究战争和指导战争，要深入到战争的实践中去认识、分析、掌握具体战争的特点及其发展。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分析和论述了人们认识战争规律的过程：第一，制定战争计划的过程。毛泽东指出："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①这是制定作战计划的过程，即通过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广泛地收集敌方的一切情况和动向，然后把这些材料进行联贯的思索，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②的加工，以求在总体上对敌方的情况有所认识，然后下决心，"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③这是科学的认识方法。第二，执行战争计划的过程。在执行战争计划时仍需要科学的方法。毛泽东指出："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④这是因为一个作战计划制定以后，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情况，必须在战争中加以检验。事实上，在战争中部分地改变、甚至是全部地改变原定计划的事，是常有的。因此执行计划的过程也就是检验、修正、补充计划的过程。针对教条主义者轻视战争实践的错误，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指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

①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3页，第164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4页，第165页。

主要方法。”① 这就强调了战争实践在认识战争的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四）毛泽东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具体地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揭示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

毛泽东通过对十年内战中敌我双方诸矛盾问题的分析，指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中国是一个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敌人的暂时强大；红军暂时的弱小；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这四个特点之间有本质的联系，它说明中国革命战争的持久性和艰苦性。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的战略战术都应该在遵守这个规律的前提下制定和执行。

第三，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的战略战术原则。

毛泽东根据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及其特殊规律的认识，提出和论证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一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贯串其中的是实事求是的思想，是辩证法的思想。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积极防御

坚持积极防御还是坚持消极防御，是两条军事路线在战略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在军事指导上的尖锐斗争。

毛泽东指出，积极防御，也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也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5页。

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毛泽东讲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充分体现了防御和进攻的辩证统一。因为积极防御把战略上的防御和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有机地结合起来。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是达到战略防御的主要手段，因此防御中有进攻，进攻是为了防御，防御和进攻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消极防御论者如王明等人，把防御和进攻机械地对立起来，认为防御就只是防御，只看到它们之间的对立，看不到它们之间在一定条件下的统一，而积极防御体现了是——否，否——是的辩证法公式，消极防御则体现了是——是，否——否的形而上学的公式。

（二）诱敌深入

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两条军事路线在战略退却阶段，主要表现为“诱敌深入”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分歧。“诱敌深入”是第一次反“围剿”时毛泽东提出来的。这是劣势军队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唯一正确的战略步骤。毛泽东认为，只有采取“诱敌深入”才能造成或发现敌人的过失，这是使中国工农红军最有把握地打破敌人进攻的办法。“左”倾教条主义者如王明等人则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反对符合实际的“诱敌深入”。毛泽东深刻而又生动地阐明丧失土地和不丧失土地、打烂和不打烂坛坛罐罐，应该辩证地看待。即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只有打烂才能不打烂。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战胜了敌人，再加以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在一部分人家中一时打烂些坛坛罐罐，就可以使全体人民长期地不打烂坛坛罐罐。为此毛

泽东批评了“左”倾教条主义者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没有通观全局。

（三）在战略反攻阶段要处理好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以及采取正确的作战形式

毛泽东认为，战略退却阶段造成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还只是具备了战胜敌人的可能性，而要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还要在战略反攻阶段处理好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以及采取正确的作战形式

反攻开始问题，即初战和续战的关系问题。慎重初战，不论在战略防御或战略进攻时都要认真地对待。对于还处于防御地位的红军，第一个战斗的胜败关系尤为重大。为此，毛泽东提出了反攻开始时的初战三原则：(1)必须打胜；(2)要有好的全战役计划；(3)要照顾到下一战略阶段。这些原则充分体现了关于事物普遍联系的思想和全面地发展地把握事物的部分与整体辩证关系的思想。

集中兵力问题是毛泽东对抓主要矛盾的思想和质量互变规律的灵活运用。“左”倾教条主义者主张“全线出击”或“两个拳头打人”，反对集中兵力。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上批驳了这种错误的论点，阐明了集中兵力的重要性。毛泽东在论述运动战、速决战和歼灭战时，运用和发挥了辩证法思想，反对了形而上学，对作战过程中的“打”与“走”、流动与稳定、持久与速决等对立关系进行了辩证分析，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提出和论述了正确运用运动战，速决战和歼灭战的作战形式，以达到战略反攻的目的。

总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

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原理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问题的光辉典范。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的一些基本观点在这篇著作中均已产生，但是由于社会和历史条件的限制，还不可能形成完备的军事辩证法的科学体系。随着抗日战争实践的发展，毛泽东根据新的战争实践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展开了他的军事思想，从而形成了完备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体系，其标志就是《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的问世。

第三节 《论持久战》等著作的问世标志着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种科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和一定的社会实践密切相联的，都是对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形成，是在中国共产党有了比较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中国共产党从建立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前，经历了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积累了一定的武装斗争经验。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总结。接着，毛泽东又于一九三七年七、八月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对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的经验进行了哲学总结。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根据新的斗争经验，毛泽东又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这是毛

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和哲学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丰富和发展。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的问世，标志着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作为一种科学体系，已经形成。特别是《论持久战》一书，更能代表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它不仅是一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著作，也是一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是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应用于研究和指导战争的光辉范例。因此分析和研究《论持仍战》中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对于了解和掌握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是极为有益的。

第一，《论持久战》客观地全面地分析了中日战争的特点。

客观地全面地看问题，是唯物辩证法和辩证逻辑的首要前提。所谓客观地全面地看问题，就是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事物，全面地分析研究事物内部矛盾的基本因素及其相互联系。

在毛泽东看来，研究任何问题首先应该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不能脱离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研究战争问题也一样，不能脱离战争发生的时代特征。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从时代特征上考察中日战争矛盾的特殊性。列宁曾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毛泽东遵照了列宁提出的这个原则，指出时代的基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

本特征规定和影响着中日战争双方相互矛盾着的诸种基本因素。他说："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①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在苏联十月革命后，帝国主义进一步走向没落，社会主义革命走向胜利，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特别是三十年代爆发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更加剧了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危机。这个时代特征给予中日双方以不同的影响。日本帝国主义虽然看起来很强大，但从时代条件来考察，就会看到它走向灭亡的必然性；同样，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虽然暂时看起来是弱小的，但随着时代的推移，它必然会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毛泽东从时代特征上进行考察，就从总体上抓住了中日战争的特殊本质及其发展趋势，这就有力地批判了"亡国论"。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还全面地分析了中日战争中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及其相互关系。列宁曾指出："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②毛泽东正是用分析和综合的辩证方法，客观地全面地分析研究了中日战争，把中日双方的各个方面分解开来，进行比较研究，找出其特点，找出其本质，把握其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中的全部基本要素，揭示出抗日战争的发展趋势。毛泽东指出中日双方各有四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5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个基本因素，日本方面：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小国，人力、物力不足；国际上失道寡助。中国方面：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弱的；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大国，人力、物力足以支持持久战；国际上得道多助。中日双方这些基本因素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它们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构成中日战争相互矛盾着的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这是对事物本质的分析。但仅仅是分析还不能从总体上了解事物的本质，还必须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把各个方面联系起来考察其相互联结的特殊性和质的规定性。综合就是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事物的本质。毛泽东就是通过综合，通过一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得出了中国必胜，但必须是持久战的科学论断。这是毛泽东通过分析和综合后得出的结论，从根本上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同时也从根本上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强调用发展的观点分析中日战争矛盾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恩格斯曾指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① 这是讲的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毛泽东依照这个原理分析战争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认为战争的发展变化尤其迅速。因此他在分析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后说：“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240页。

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①毛泽东根据对这些特点发展变化的分析，科学地预见了中日战争发展的三个阶段。他指出：第一个阶段，由于敌强我弱，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退却的时期；第二个阶段，由于敌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敌将不得不停止其战略进攻，使战争进入敌战略保守、我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由于我们的力量逐渐超过敌人的力量，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时期，结果是敌败我胜，收复失地，驱敌出国。毛泽东对抗日战争三阶段的分析，不仅显示了理论的预见能力，而且也为我军的战略战术原则的制定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抗日战争的进程，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科学分析。他从质和量两个方面分析敌我力量的消长变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方法。它丰富和发展了辩证法的量变质变规律，对我们研究问题、认识客观世界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总而言之，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和片面性。毛泽东客观地全面地考察战争的思想和实践，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宝库增加了新的光彩。

第二，《论持久战》强调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的自觉能动性是和哲学基本问题密切相联的一个重大问题。马克思曾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8页。

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旧唯物主义错误观点中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人的自觉能动性的理论。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人的自觉能动性的理论。他说：“一切事物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②人们在战争中是可以强烈地表现出这种特点的。也可以说人们只有在革命战争中充分发挥其自觉的能动性，而又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才能在战争中做到智勇兼备。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还强调人们自觉的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对战争胜负具有决定作用。他指出：“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③他在论述战争力量的变化时还指出：“战争是力量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5—446页。

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①人们的自觉能动性强烈地表现于认识战争、实行战争的一切活动中。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是自觉能动性在战争中的突出表现。主动权是军队在战争中克敌制胜的关键。但主动或被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分不开的，因而也是和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分不开的。所以毛泽东指出，在战争中，主观指导上的正确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变劣势为优势。这就是事物的矛盾双方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原理在战争问题上的一种应用。毛泽东关于自觉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对战争胜负具有决定作用的思想，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是对弱军战胜强军的历史事实的理论概括，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认识论。

但是，毛泽东同时又认为，人的自觉的能动性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条件和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有两种不同的自觉能动性，一是正确的自觉能动性，即建立在一定的物质条件和客观规律基础之上的自觉能动性；另一是错误的自觉能动性，即离开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和客观规律的自觉能动性。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明确指出：“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4页。

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①为了在战争中取得主动权，我们必须反对那种不顾敌强我弱的现实情况，期求抗日战争速胜的思想和行动，因为这是一种脱离客观物质条件，违背客观规律的主观臆想，是盲目的蛮干。这种主观蛮干的劲头越大，革命事业的损失就越大。

《论持久战》通篇都贯穿着发扬人的自觉能动性的精神。这是因为革命战争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必须动员、依靠广大军民来参加和支持，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要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因此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发扬自觉能动性，既要发挥指挥员的主观能力，更要发挥广大军民的主观战斗力。

第三，《论持久战》运用了对立统一观点研究和指导战争。

马克思主义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毛泽东在《矛盾论》里指出：“我们从事中国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相互联结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②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些基本原理分析和研究了战争现象中的一系列关系、范畴，如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7页。

进攻和防御，持久和速决，内线和外线，主动和被动，等等。这些矛盾既互相排斥又互相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因此，指导战争的人们，必须认识和把握战争现象中的对立统一关系，并以此规定自己的战略战术原则。

毛泽东认为，研究战争要首先把握战争矛盾的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在《论持久战》中，他反复阐明了“战争是武装集团为了实现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暴力对抗活动，对抗双方都力求消灭对方。保存自己，消灭敌人”①就是战争的本质和目的。这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一切战术行动和战略行动，都是贯彻这个根本目的的。因此毛泽东分析了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的辩证关系：消灭敌人是为了保存自己，只有大量消灭敌人，才能有效保存自己。反之，保存自己，也是为了消灭敌人或准备消灭敌人。只讲消灭敌人，不讲保存自己，会导致拼命主义；只讲保存自己，不敢去消灭敌人，会导致逃跑主义，最后也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进攻和防御是实现战争目的的两种手段，二者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渗透，又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毛泽东根据进攻和防御的辩证关系，结合抗日战争的具体特点，论述了抗日战争的具体战略方针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战斗的外线作战。这个方针体现了内线和外线、持久和速决、防御和进攻的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在毛泽东的关于敌我优劣、主动被动辩证关系的分析中，体现了分析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思想。由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9页。

于矛盾诸方面力量的不平衡，其地位和作用也各不相同。力量优势的一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着主导和支配的作用；力量劣势的一方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处于非主导的被支配的地位。战争双方力争主动，实质上是争取矛盾主要方面的主导地位，使自己能够主导和支配战局。毛泽东这些从对立面的统一中认识和把握战争中的规律的思想，是很深刻的。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详尽地分析了战争双方矛盾斗争的手段和方法。他根据事物内部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的原理，分析和研究战争矛盾。他认为战争研究除了研究矛盾各个方面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外，还要研究战争双方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进行斗争，从而把握战争的本质和规律。根据中日双方的特点，毛泽东具体地分析了抗日战争三个战略阶段中抗日武装的作战形式：第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第二阶段，则游击战将升到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第三阶段，运动战上升为主要形式，而辅之以阵地战和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反对毛泽东提出的以游击战为八路军的主要作战形式，主张普遍地实行运动战，配合国民党军队打大仗，这是脱离了中日双方的特点，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的。

《论持久战》中关于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转化的思想是极为深刻的。毛泽东根据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原理，研究了战争双方矛盾转化及其转化的条件。在毛泽东看来，中日双方的基本因素决定了敌强我弱，敌是优势，我是劣势。但是，双方的强弱、优劣又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一定

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只要我们在抗战过程中努力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就可以改变敌我原来强弱优劣的态势。“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① 就是敌我强弱优劣转化的军事的和政治的条件。也就是说，中国由失败转化为胜利需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② 在此，毛泽东又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他指出：“亡国论”只看到敌强我弱，看不到敌我强弱优劣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而“速胜论”则看不到我败敌胜转化为敌败我胜需要一定的条件。关于矛盾转化的思想，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的分析大大地超过了他在《矛盾论》中的分析，充实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思想。

第四，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详尽地阐明了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强调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物。“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③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战争的力量是人力和物力的结合。

毛泽东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④ 的思想。他说：“战争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2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37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6页。

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①“兵民是胜利之本”，“军队的基础在士兵”。②在毛泽东看来，抗日战争是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因此必须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来参加和支援战争。依靠人民群众，兵源和财政问题都容易解决。人民军队才能有源源不绝的补充，十分困难的财政问题，也才能够得到解决。毛泽东的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战争问题上的体现。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者，想依靠国民党的力量迅速打败日本侵略者，这种“速胜论”同“亡国论”一样，都没有看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是唯心史观在战争问题上的表现。

毛泽东指出：“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③这就是说，普遍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发动群众的关键。要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首先，必须正确解决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从根本态度上尊重士兵，尊重人民，作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只有官兵一致才能激发官兵的抗战热情；只有军民一致，军队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无敌于天下。所以，毛泽东把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规定为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其次，就是把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即要采取多种形式，向人民群众进行生动活泼的宣传鼓动，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

《论持久战》是一部寓有丰富哲学思想的军事著作，特别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8页。

是它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极其丰富深刻。《论持久战》发表以后，紧接着毛泽东又发表了《战争和战略问题》这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军事著作。这篇著作文字不长，但内容很丰富。它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了十七年中国政治斗争的历史，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和战略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它把《论持久战》中的一些基本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展开。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充分显示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原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力量。从毛泽东的军事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生动的发挥和发展，可以看到他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具体运用和发挥。因此可以说，《论持久战》等著作标志着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的形成。

第四节　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因为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发展，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和发展。突出的表现是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这十大军事原则是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时候，毛泽东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提出来的。但是在解放战争初期，在《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

敌人》、《三个月总结》等文章中，十大军事原则的基本内容就已经被提出来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即十大军事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理论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如前所述，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作为一种科学体系是在抗日战争初期形成的，中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实践检验，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补充和提高，从而形成了系统的十大军事原则。这十大军事原则是：（一）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三）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四）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五）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六）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七）力求在运

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八）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九）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十）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毛泽东指出：这十大军事原则，“是人民解放军打败蒋介石的主要的方法。这些方法，是人民解放军在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锻炼中产生出来，并完全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的”。①虽然这些方法，为蒋介石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在华军事人员所熟知，但他们却无能为力，找不到对付的办法。这是因为“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②可见，这十大军事原则，是在长期进行的人民战争中逐渐形成的，它只适用于人民战争，是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而反人民的战争、非正义的战争，是决不能应用这些战略战术原则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提出的这些战略战术原则是完全正确的、科学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国民党有总兵力四百三十万人和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44页。

三亿几千万人口的统治区；而我方在军队数量和解放区的人口两方面均不及敌人的三分之一。开战初期敌人是“全面进攻”，继而又是“重点进攻”。由于毛泽东提出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开始虽然我们退出了许多城市和地方，但歼灭了国民党的大量有生力量，平均每月歼敌八个旅(师)。人民解放军勇不可当，越战越强。一九四七年七月以后，国民党兵力下降到三百七十万人，我方发展到一百九十五万人，于是我军转入战略反攻。一九四八年秋，我方已有了二百八十多万军队；而国民党军队人数已下降到三百六十五万人，用于第一线的只有一百七十万人。敌方被迫由“全面防御”转为“重点防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毛泽东为主要领导的党中央的指挥下，发动了三次大的战役，即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全歼敌军一百五十余万，为取得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蕴涵了极为丰富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可以说它是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的精髓。

第一，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的总的精神，是彻底地贯彻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因而它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原理总结我军长期作战经验的结果。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的基本原则。懂得这个原则并不难，但是要把这个原则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特别是运用到军事实践中去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需要下一番苦工夫的。毛泽东在十大军事原则中科学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基本原则，并进行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发挥。

例如，在战争中，对待攻城问题，毛泽东强调：要察明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并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中等程度，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则主张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这种根据不同情况、从实际出发制定战略战术原则的思想，不仅在军事上有重大指导意义，而且也适合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中的一切实际工作，因而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再如，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的战略战术原则，也充分体现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它要求大量而又准确地掌握敌人的情况和动向，在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才实行作战计划。初战必胜，续战也必胜。这种战略战术原则只有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才能制定和实行之。

第二，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充分体现和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思想。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通篇贯串着唯物辩证法思想。比如，要实现我军由弱向强的转化必须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只有这样，才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使我们逐渐强大起来。可见，强和弱是相对的，是可以转化的，问题是我们要在战争实践中创造这种由弱变强的条件。再如，关于抓主要矛盾的思想，这是毛泽东在《矛盾论》里论述得很详尽的一个思想。《矛盾论》发表以后，毛泽东又把这一思想推向新的高度。十大军事原则就是一例。毛泽东强调在战争中要把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把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作为战略目标，不要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这就抓住了战争中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解决了，其他矛盾就会迎刃而解，就会取得战争

的最后胜利。再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在十大军事原则中也充分体现了出来。列宁曾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称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毛泽东运用这一原则，强调在战争中不能按老框框办事，而要根据变化了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分别不同的情况制定出不同的打法和战法，以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和壮大自己的目的。那种不调查、不研究、不分青红皂白的"一刀切"、"一种打法"的思想和行动，实在是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的大敌。因为这种唯心的、形而上学的思想和行动，只会断送中国革命。

第三，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辩证地说明了战争中的物质条件和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之间的关系，强调了在客观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中，对战争中的物质条件和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详细论述。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根据新的经验，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这些新的认识集中体现在十大军事原则中。比如，在十大军事原则中，他认为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我军处在有胜利把握的物质基础上，要充分"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①这是要求人们把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发挥出来。同时，十大军事原则还强调"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②养精蓄锐。但是"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③从这些原则可以看出，毛泽东不是

①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43—1144页。

一般地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是对于如何才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作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

第四，毛泽东在他的十大军事原则中贯彻了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具体体现。

总之，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化为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理论。这十大军事原则，在解放战争的后期，在具有决定意义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得到了全面的检验和运用。毛泽东根据每个战场的具体情况，抓住决定每个战役全局的关键问题，确定了不同的作战方向和制定出不同的作战方针。毛泽东把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战略进攻和战略决战适时地、恰如其分地结合起来；把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全部消灭敌人的大兵团作战结合起来；把大规模的运动战和具体的阵地战、攻坚战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战役中的防御和进攻、持久和速决、内线和外线结合起来；把用战斗来消灭、瓦解敌军和用和平方式改编敌军结合起来。在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指挥下，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空前广阔的领域里经历了漫长的历程。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军在指挥艺术上达到了世界军事史上绝无仅有的高度。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实践和人民革命战争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军事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此，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是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七章

毛泽东关于建党的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毛泽东建党的哲学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样，毛泽东在党的建设方面的哲学思想也是在斗争中逐步形成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旧哲学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它是无产阶级批判的、战斗的精神武器。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的批判的、战斗的哲学思想要体现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各个方面。其中，如何建设好工人阶级政党更是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

列宁在谈到工人阶级政党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时曾指出："它是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也是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①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提出过一系列理论原则和一些具体的方针、政策，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史上有巨大功勋。从哲学上说，他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578页。

们主要是强调和确立了以下理论原则：第一，要以唯物辩证法考察社会的发展进程，用先进的思想体系武装无产阶级政党。他们认为，只有先进的宇宙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宇宙观，才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思想基础。为此，他们同各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体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第二，确立了无产阶级政党要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来制定战略策略的原则。无产阶级政党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根据客观实际情况制定一整套战略和策略思想；这些战略和策略思想不是凝固不变的，而要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地加以修正。没有唯物的、辩证的思想原则作指导，就不能制定出实事求是的战略和策略。第三，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组织原则。无产阶级政党建立起来后，它要存在、壮大和发展起来，就要有一个好的组织原则。而建立好的组织原则，就是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解决好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个人与组织、领袖与群众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列宁在俄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为了把布尔什维克党建设成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继承和坚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建党学说，并且进一步提出：第一，"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第二，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批评和斗争，认为这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壮大和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第三，强调了在无产阶级政党成为执政党后，更要密切联系群众，等等。这些思想原则，不仅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运用，也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了苏联党的建设工作，但是他的建党理论在许多方面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特别是斯大林到了晚年，由于他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在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个人与集体、领袖与群众等一系列问题上，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潭，给苏联党和世界各国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毛泽东从中国更为特殊的历史条件出发，为了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他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另一方面又根据中国革命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进行了新的探索，包括从哲学的角度所作的新探索。

如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整个体系一样，毛泽东在党的建设方面的哲学思想也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又是一个无产阶级人数很少但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怎样才能建设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显然，要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只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又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了长时期的新的探索，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在这个过程中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问题。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章，不仅是“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

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而且是光辉的建党文献。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章中提出的一系列的建党原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的特殊性进行艰苦探索的结果，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则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但是，当时毛泽东的这些正确的、唯物主义的建党哲学思想并未被全党所接受，更没有化为全党的实际行动，结果导致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中国共产党也受到了重大损失。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的惨痛教训，教育了全党，也更坚定了毛泽东本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新的建党的哲学思想武装全党的信心和决心。从此以后他的建党的哲学思想逐渐趋向理论化、系统化。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上有了重大突破，连续发动和领导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等革命运动。毛泽东在发动和领导秋收起义以后，把起义部队带到了井冈山，在农村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毛泽东在开辟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根据红色政权建设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提出：第一，要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他认为，“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是“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的最“要紧的条件”。因此要在军内外积极发展党员的同时，把党支部建在连队。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创造。而这又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原则。第二，要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他认为“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份的党，若

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①这就强调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改造党、建设党的重要性。第三，强调要从思想上清除教条主义对党的不良影响，使全党逐渐树立起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

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建党的哲学经历了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这个时期毛泽东特别注意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并且写了很多调查研究的报告和专著，《反对本本主义》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篇。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从哲学上总结了建党理论和建党实践，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着重指出了端正思想路线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建党思想中的一篇极为重要的著作。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延安后，毛泽东鉴于几次“左”倾错误的经验教训，更感到从哲学上总结我们党的建党经验、完善他的建党学说的必要性。

毛泽东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不仅充满了军事辩证法思想，而且也闪烁着党的建设的辩证法思想。而《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哲学专著的发表，更说明了我们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已从理论上得到完善。它们标志着毛泽东建党的哲学思想已达到相当高水平。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中国革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基本任务也有所改变。因而党的建设也面临着一个新的课题。为了解决党的建设所面临的新的课题，毛泽东用了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6页。

很大的精力来探索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问题。他先后撰写了《反对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学习和时局》、《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著作。毛泽东在这些著作中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具体的充分的论述和发挥。从建党的哲学思想的角度来讲，毛泽东又着重强调了以下几点：第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宇宙观，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这个科学宇宙观的指导；第二，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的战略策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灵魂，因此要同形形色色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思想作斗争；第三，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更重要的是要在思想上入党，而思想上入党的重要标志就是自觉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宇宙观，防止和克服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的错误；第四，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是每个党员必备的条件；第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正确处理好个人与组织、个人与群众、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领袖与人民等方面的辩证关系；第六，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保持党的纯洁性的重要思想武器；第七，明确概括出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第八，提出了党内斗争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些建党的哲学原则的提出，是同形形色色主观唯心主义建党的哲学思想长期斗争的结果。

一九四二年在延安开展的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全党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特别是学习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方面的哲学思想，思想上都有了很大的

提高。延安整风就是要使全党明白主观主义是党的建设的大敌。毛泽东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不反对主观主义，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就确立不起来；不反对主观主义，毛泽东的建党的哲学思想也不会为全党所接受。毛泽东在党的建设方面的哲学思想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经受了新的检验。延安整风证明了毛泽东所创立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整套哲学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正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为了帮助广大党员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突出地强调了以下几点：第一，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① 并且还说："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② 这是毛泽东

---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9页。

在党的建设方面的哲学思想的灵魂，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第二，反对主观主义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长期任务。毛泽东认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①又说，主观主义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它的实质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②为此，毛泽东特别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的主观主义的作法，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为了更好地解决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的实际问题。毛泽东不愧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敏锐地看到了党内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因此提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彻底的一元论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这就从思想上武装了全体党员，使全党有了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的思想基础。第三，坚持调查研究、坚持群众路线。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十分注意的问题。毛泽东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一系列论述，结合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的新情况新经验，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始终坚持调查研究、坚持群众路线。在延安整风时期，他反复强调全党要树立起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的观点，认为这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根本特征。毛泽东在这里不光是指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前应当做到这一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点，而且也是指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成为执政党后，更应当坚持和执行这一点。事实上也是这样。建国以后毛泽东又多次提出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的问题。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的问题不单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而且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问题，因而也就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延安整风运动以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中，根据新的实践经验，毛泽东的建党学说又有了多方面的展开和发展。这对于我们取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是非常重要的保证。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总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观察问题，不断探索着新的关于党的建设方面的问题。新中国建立前夕，他根据中国共产党就要成为执政党这一新的情况，及时提醒全党要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提醒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官僚主义的滋生和发展。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发展，毛泽东又多次提出：要反对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要尊重群众、尊重群众的社会实践，逐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发展规律；并且还进一步论述了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之间的辩证关系。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受到挫折以后，在党的建设上，毛泽东又特别强调民主集中制、强调调查研究。所有这些理论和见解，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重要部分。

总之，延安整风时期，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毛泽东都形成了一整套建设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些路线、方针和政策一方面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的继承，另一方面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发展。我们从毛泽东的建党理

论的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关于建党的哲学思想到延安整风时期已经形成。但是因为客观事物是不断地运动和发展的，毛泽东建党的哲学思想也是不断发展的。因此，延安整风以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毛泽东建党的哲学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认真总结毛泽东建党的哲学思想，对于我们了解和掌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第八章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化为工作方法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以往一切哲学的区别，就在于它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用来指导广大人民群众改造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的强大的精神武器。而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从总体上来说都是剥削阶级的世界观，它不能也不可能指导人们为改变旧世界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马克思指出，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马克思主义认为，隐蔽自己的哲学世界观的阶级性，不但违背了客观事实，而且会模糊无产阶级哲学的实践任务，因此是非常有害的。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②因此马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

思主义者就必然要求把自己的哲学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结合起来。“哲学不仅从内部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①恩格斯也认为我们应当把唯物辩证法称作“我们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哲学只有在广大群众的实践斗争中，不断地用新的实践经验充实和丰富自己，才能使自己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因而他们十分注重方法论的研究，注重使世界观和方法论有机的统一起来。

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以及它在俄国的变种（经济派，孟什维克等）的斗争中，十分重视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尤其是对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同一的研究，他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③基于这个认识，列宁在长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十分重视唯物辩证法的群众化和通俗化的工作，他曾把辩证逻辑原理概括为：普遍联系的观点，自己运动的观点，实践的观点和真理的具体性观点。④列宁特别反对片面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他反复告诫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2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④ 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人们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列宁的许多著作，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并取得了巨大成果。列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了俄国的工人运动，在俄国创建了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并在其领导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无任何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这与列宁坚持了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关系极大。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要真正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变为现实，就不能使哲学仅仅停留在理论形态，即只在理论范围内加以论述和论证，还必须有一系列把哲学转化为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人民的实践活动的重要环节。毛泽东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出的一个杰出贡献，就在于他在空前未有的规模上，在空前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上，把唯物辩证法同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仅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对形势和任务的分析，对革命和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而且形成了一系列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当然，毛泽东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在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毛泽东就提出要注意工作方法的问题。他指出："领导方式不对，不能采取各种正确的有效的工作方法，那就会立刻影响到工作的成效，使我们的各项工作不能得到广

大群众的拥护”。[1]在这里，毛泽东已把工作方法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统一起来。就是说，只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并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才是唯一正确的工作方法。毛泽东还指出：“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为了完成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的任务，坚持马克思主义工作方法的问题，就严重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2]毛泽东在这里就把完成革命和战争的任务同实行科学的工作方法有机地联系了起来，并且批评了那种只提出任务而忽视科学的工作方法的错误观点，指出不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工作方法问题，革命和战争的任务也只是一句空话。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是极为深刻的，既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又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为了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更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3]不久，他又在《矛盾论》中指出：“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4]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9—11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9页。

可见，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的原则，根据列宁提出的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的一致性原理，把唯物辩证法化为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方法论的理论。

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又进一步强调了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对于完成革命任务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性。他指出："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①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面临着更为艰巨的繁重的任务。为了把中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针对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提出我们现在的重要目的，是在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面提高一步。他在许多讲话和文章中，经常讲到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特别是在全面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由于我们党在经济建设上受到了挫折，有了反面的教训，毛泽东更感到正确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重要性。从一九六〇年秋以后，毛泽东多次号召全党改进工作方法，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指出，不走群众路线，不调查研究，主观地决定问题，工作就要失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专门发了关于调查研究的通知，还制定了工作方法的"条例。"于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纷纷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着手解决各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虽然我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30页。

国经济暂处困难时期，但由于工作方法的改进和提高，不仅使我们渡过了暂时困难，而且使社会主义事业日益兴旺发达起来。

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在他们各自的实践活动中，都是把科学的方法论视为无产阶级哲学的重要内容来加以阐发和运用的。虽然他们各自处的时代不同，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和论述有所侧重，但他们都是把科学的方法论的研究放在了极为重要的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来分析和论述科学方法论的现实指导意义；列宁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个观点，着重强调了唯物辩证法的群众化和通俗化的问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把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变哲学为亿万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锐利武器，并且能正确地使用这一武器。由此补充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发展为更高的理论形态。

毛泽东曾指出：我党二十几年来，天天做群众工作，近十几年来，天天讲群众路线，其目的就是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① 毛泽东提出并论述的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同时应当指出，毛泽东在论述工作方法、领导方法时，总是把思想方法放在首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4—1215页。

位，认为没有科学的思想方法，就不可能贯彻执行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这个思想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大指导意义。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方法问题，毛泽东非常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教育。毛泽东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同时又是无产阶级认识周围世界的方法论和革命行动的方法。毛泽东还指出，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方法论，是认识的方法，是理论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观。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正因为思想方法不解决，就难以实行正确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所以毛泽东指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点，关于辩证法，需要做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①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作广泛深入地宣传，使大家都懂得这个道理，那么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就很容易被人所接受、所执行。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总是把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宣传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总是把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为指导所制定、执行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同贯彻执行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毛泽东的独特的创造。分析

---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8页。

和研究毛泽东的这些独特创造，对于我们全面地认识和掌握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极有意义的。

第二节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化为工作方法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的实践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工作，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不仅表现在《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人的正确思想从那里来的?》等哲学著作中，而且表现在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全部革命活动中，当然也表现在毛泽东对工作方法的论述上。

第一，毛泽东在实际工作中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运用于党的领导工作，提出并论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

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① 还指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2页。

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①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世间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对立统一体。正是事物的特殊性的矛盾规定着事物的特殊本质。我们说认识事物，就是认识和分析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只有认识了事物发展的特殊原因和特殊的运动规律，才能找到解决事物矛盾的方法。所以，认识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是正确解决矛盾和改造事物的关键。毛泽东指出：“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走上胜利的途径。”②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一个个的具体事物，认识到它的特殊本质，然后再进行抽象和概括，上升到一般，由此才可能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事物的共同本质存在于它的特殊本质之中。没有特殊就没有一般，因而不认识特殊就无从认识、发现一般。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这个认识规律，毛泽东积极倡导人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应该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解决矛盾、解决问题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来。这种从分析具体问题入手，从中发现一般性原理、原则的方法，就是从特殊到一般的方法。

从认识事物的特殊到认识事物的一般，人们的认识是否就完结了呢？不是这样。“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1页。

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①这就是说，认识了一般还必须回到特殊中去，通过一般来指导认识世界其他的新的特殊，以检验、丰富和发展人们认识的一般，从而达到改造特殊的目的。这种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又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在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工作中，一切带有普遍性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办法，都是一般性的东西。它反映的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马克思主义又认为，从一般回到特殊，不仅是具体地改造特殊的过程，而且是不断丰富、补充和发展一般的过程。从特殊中形成的一般并不是僵死的东西，在指导新的特殊的实践过程中，它将得到检验和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原则，把党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当作我们研究特殊的向导和指南，而不能把它看成僵死的、教条的东西。应当不断地丰富它。这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毛泽东一贯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之一，就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其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这种领导方法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实事求是的。这种领导方法是从对客观实际情况的分析中，从总结实践的经验中，找出解决问题的方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8页。

法，形成正确的工作方针和领导意见。还因为这种领导方法充分体现了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原则，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因而能够充分地正确地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达到解决问题，完成任务的目的。毛泽东指出："在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①又说："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②

毛泽东反复讲的正确的领导意见是从群众中来的，正确的认识是从实践中来的，这两者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人民群众在无限广阔的实践领域中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有丰富的智慧和经验。因此，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利益的各种领导意见必然是为群众所接受的。毛泽东经常讲，正确的领导意见必须回到群众中去。这就是由理性认识能动地去指导群众的革命实践的过程。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被群众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都要坚持；凡是被群众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都应当坚决改正。根据这个道理，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5页。

毛泽东提出了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领导方法。他告诫人们，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是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任何工作时必须采用的方法。毛泽东还指出："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①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娴熟地运用了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领导方法。他在任何有群众的地方，都很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而这些领导骨干又是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的，不是脱离群众斗争而产生的。毛泽东提出的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是在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典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二，毛泽东根据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提出并论证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指出："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②马克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2页。

思主义哲学所指的一般，是对同类个别事物的特性的抽象和概括而得出的共同本质。一般即共性。因此，一般对同类事物的个别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在广大群众的实践过程中，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可以使领导的意见、方针、政策迅速地直接地与广大群众相结合，并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并可以广泛地普遍地把广大群众动员起来，行动起来，变为实际行动。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① 抓住对世界规律性的认识，"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② 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特别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实际，以一般号召去指导个别的重要性。任何领导者，在其领导工作中，只要离开了个别指导，就无法检验一般号召是否正确，当然也就不可能丰富和发展一般号召，从而使一般号召失去了基础，失去了具体的丰富的内容，变成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抽象空洞的口号和公式，因而也就根本无法进行普遍的指导。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提出，调查研究是一个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其所以基本，是因为，调查研究既可以使人们掌握个别情况，同时又可以使人们在掌握个别情况的基础上得出一般性结论。毛泽东说："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9页。

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①

应当指出，毛泽东在强调一般号召必须同个别情况相结合的时候，他要求实际工作者必须尊重客观的具体情况。要根据客观的实际情况决定具体的工作方针，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要根据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的实际去解决问题。毛泽东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② 他还指出：“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③ 这些都说明，毛泽东既重视个别上升到一般，更重视一般再回到个别，并且，在个别中加深对一般的理解。可见，毛泽东提出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完全融为一体的。领导方法就是工作方法，工作方法也是领导方法。作为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在实际工作中不能不讲究方法。正确的方法来源于对事物的正确的认识。而正确认识的获得必须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实践过程中，为了达到预期目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化为具体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他提出并多次论证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个别和一般相结合的工作方法，等等，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47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3页。

第三，毛泽东把唯物辩证法的原理具体化为一整套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对方法论的研究又深入了一步。为了取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不但从理论上再次强调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个别与一般相结合的工作方法，而且进一步提出了处理好各种关系的问题，从而形成了一整套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在这个时期，毛泽东专门讲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著作，主要有《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等。在这些著作中谈到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虽然都是很具体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但却有很普遍的意义。它涉及到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个时期工作的各个方面。实践证明，这些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在全党的普遍实施，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起了非常重大的历史作用。

（一）关于健全党委制，保证集体领导的问题

毛泽东曾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这就要求凡属党的重要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杜绝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这对于加强党的集体领导，提高工作效率，有重大的促进作用。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党的领导方法上的具体体现。

（二）关于处理好“班长”和“一班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处理好“班长”和“一班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这是因为，“班长”和“一班人”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要真正做到少数服从多数，就要解决好个人与群众的关系问题。这是个方法问题，但又是一个原则问题。所以毛泽东强调：“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① 在党委会内部，“班长”与“一班人”不是上下级关系，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因此，大家要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班长”不能个人包办和个人专断，“一班人”也都要执行集体的决定。

（三）关于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的问题

毛泽东强调，在领导工作中，党的书记和委员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② 有了问题不要在背后议论，这会影响团结。因此，毛泽东指出：“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规定它几条，问题就解决了。”③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既可以把工作做好，又可以团结同志。这种工作方法在我们党的一切工作中，是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的。

（四）关于互通情报的工作方法问题

毛泽东要求在党的工作中，“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④ 只有这样，大家才能有共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3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3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30—1331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31页。

同的语言，广泛展开讨论，才能把各种具体情况综合起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既是群众路线，又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所要求的。

（五）关于先做学生，再做先生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毛泽东指出：党的领导干部，对“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①就是说，对有些问题在弄清楚以前，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这种先做学生，后做先生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既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又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观点。只有坚持这种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才能有效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

（六）关于学会“弹钢琴”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学会“弹钢琴”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毛泽东所作的形象的比喻。它的实际意思是说，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这就是说，在抓主要矛盾的时候，也要注意解决次要的矛盾。要注意全面地看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是唯物辩证法的要求。

毛泽东指出：弹钢琴“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②党的工作也是这样。“党委要抓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3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32页。

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①中心工作，就是指抓各种工作中带关键性的工作。在抓中心工作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抓住和解决其他的问题，又可以反过来促进中心工作的开展，有利于主要矛盾的解决。这样在实际工作中，有效地避免了“单打一”和“一刀切”的形而上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七）关于要“抓紧”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毛泽东指出：“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抓而不紧，等于不抓。”②这就是说，党的各级干部和工作人员都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去开展工作，反对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无实际行动的作风。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这不但需要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也需要有好的精神状态，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

（八）关于要“胸中有数”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的实践中，根据质与量的对立统一关系，提出了“胸中有数”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他指出：“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③在实际工作中，一定要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否则就难以把握事物质的方面，把握不住事物的质就不能做好工作。所以只有“胸中有数”才能不断地把革命和

---

①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32页。

建设推向前进。认真掌握“胸中有数”的工作方法，就可以防止和克服“左”的或右的偏差，使党的工作沿着正确路线发展。

（九）关于“安民告示”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毛泽东指出：“开会要事先通知，象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而且早作准备。”① 这是对唯物主义的运用和发展。

（十）关于“精兵简政”的工作方法问题

毛泽东要求各级党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党的干部，“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会议也不要开得太长。”② 不了解情况，不弄懂弄通自己要解决的问题，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所以调查研究，有针对性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是“精兵简政”的基本前提。因此，“精兵简政”的工作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和具体化。

（十一）关于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的问题

毛泽东提出的这一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它渗透着极其丰富和深刻的辩证法思想。这样，可以更多地团结群众开展工作，也可以更全面地认识世间的各种问题，从而有利于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的发展。这个思想至今仍不失其真理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33页。

的光辉。

（十二）关于力戒骄傲的问题

毛泽东把力戒骄傲的问题看成是对领导者的一个原则问题。其所以是原则问题，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历来反对在历史中夸大个人的作用而贬低人民群众的作用。突出个人、骄傲自大是唯心史观的表现。唯物史观坚决反对突出个人，反对骄傲，反对对领导者的歌功颂德。只有这样，才能使党的领导者和人民一道同甘共苦，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

（十三）关于划清两种界限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两种界限，即“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记着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自然，要把界限划好，必须经过细致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对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应该采取分析研究的态度。”①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看问题或看人，都要建立在质的分析的基础上，然后，再进行量的分析。这种质和量的分析都要置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之下，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以上十三条，都是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和一些范畴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总之，毛泽东运用辩证唯

---

① 《毛泽东选集》4卷，第1334页，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于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实践，把哲学原理化为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迄今为止世界上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不可比拟的。他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直接交给了亿万人民群众，指导亿万人民进行了伟大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创举，也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所做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以及后来对它的完善和发展，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九章

毛泽东艺术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艺术哲学思想

毛泽东艺术哲学思想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毛泽东艺术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艺术哲学。研究、理解毛泽东艺术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艺术哲学思想作一概略的阐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文化史上一切优秀文学艺术理论的基础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以往历史上的文学艺术理论进行了根本性改造，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艺术哲学。马克思主义艺术哲学创立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但马克思、恩格斯的艺术哲学思想，由于第二国际的主要领导人的破坏，长期不被世人所知。到了一八九〇年至一八九六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战友——保尔·拉法格、爱琳娜·马克思以及艾威林和李卜克内西等人在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时，才开始涉及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

艺观点和文艺见解。一九〇二年至一九一八年，梅林在《马克思传》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中，曾用了不少篇幅叙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学艺术理论观点。一九〇二年梅林还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及拉萨尔的《文学遗产》（四卷集），第一次较为详细地披露了两位革命导师对历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的评论。人们可以从中了解到一些马克思主义艺术哲学的基本观点。一九二四年后，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相继在苏联公诸于世。一九二五年苏联又首次公开发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就历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致斐·拉萨尔的信。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苏联又将恩格斯致保·恩斯特、致敏·考茨基、致玛·哈克奈斯的三封信公布于众。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著作和信件的公开发表，才使人们有可能对马克思主义艺术哲学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

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虽然是一部尚未完成的著作，虽然其中还有相当数量的不成熟的观点。但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运用正在形成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论述了关于美、美感、人性、人道主义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艺术哲学的基本观点，为马克思主义艺术哲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第一，马克思在美学史上第一次科学地提出了美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劳动创造的。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第一次科学地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

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①这样，马克思把美和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联系了起来，在美学史上，成为通向认识美的本质这一未知国土的最早拓荒者。它带来了美学史上的根本性的革命。马克思关于美的论述，既承认事物的美有它的美的规律，又承认事物的美是由它本身的内在标准和美的规律形成的，同时也承认人们可以认识事物本身的内在标准和美的规律，并且可以依照它们来创造美。

第二，马克思提出了人的社会性劳动是美感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还把人的美感同劳动实践及其他一切领域的生活实践密切联系起来进行了考察。马克思认为，美感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感觉”，而人的社会性劳动是美感产生和发展的基础。马克思在《手稿》中全面、深刻地论述了美感和实践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所说的人“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②就是一种审美感受、审美欣赏。人们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包括物质世界和艺术世界，在人化的自然中，在自己创造的作品中，肯定了人作为社会的人的本质，发现了人的“本质力量”，从而引起了愉悦的审美情感。人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建立了人对世界的实践关系，同时建立了人对世界的审美关系。这样，马克思在实践基础上解决了美和美感的关系，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基础。

第三，在人道主义、人性论问题上对费尔巴哈学说的革命改造。

---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

《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早期著作，因而它不可避免的残留着青年黑格尔派学说的痕迹，同时，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也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学说进行了革命的改造。在与文艺理论、美学有密切关系的人道主义、人性论问题上也是如此。费尔巴哈是使用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概念的，但他是在否认阶级矛盾的基础上宣扬抽象的博爱；而马克思所使用的人性和人道主义概念是立足于现实，是和阶级论相一致的。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批判费尔巴哈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思想的基础上，从分析异化劳动入手，指出资本主义扼杀了人性和人道，因此要恢复和发展人性和人道，就需要扬弃私有制，就需要进行社会革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一思想总的来讲是极其光辉的。

继《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于一八四五年二月发表了《神圣家族》一书。这部著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同青年黑格尔派决裂之后对该派的思想体系所作的首次系统的清算，也是他们对前一阶段自己思想的一次清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对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及其评论者施里加作了深刻的批判。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正在形成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观察和分析文艺现象、探索文艺规律的一次重要的尝试。这次成功的探索，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现实主义理论，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因此，《神圣家族》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围绕《巴黎的秘密》，同青年黑格尔派施里加之流的斗争，首先是一场哲学论争。他们在论争中表述的文学

见解，也是同他们的哲学思想紧密联系着的：第一，对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的剖析。《神圣家族》第五章第二节中，通过对果实这一概念以及它同具体的果实的关系的分析，精辟地揭露了施里加在评论《巴黎的秘密》时所体现的思维方式正是黑格尔的思辨方式，用马克思的话说，施里加的思维方式是对黑格尔的“思辨结构的各个细节方面的应用”①，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思辨结构。第二，对欧仁·苏的小说和施里加评论中的思辨幻想作了深刻的批判。欧仁·苏在小说《巴黎的秘密》中，向读者展现的社会图景和描写的种种人物和事件，其依据和出发点，并不是当时法国社会的真实的现实关系，而是从一些抽象的观念，即抽象的贫富对立和抽象的善恶对立的观念出发的。通过这样的抽象，作者实际上抹煞了人与人关系的现实内容，特别是阶级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文学要真实地反映时代的社会生活，要揭示现实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即阶级关系，就必须要打破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的思辨的幻想。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欧仁·苏的小说以及施里加的评论所作的批判的主要内容。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欧仁·苏的人物塑造和施里加的人物评论中的思辨原则进行了深刻批判，坚持了文学创作中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原则。

《神圣家族》发表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他们已形成的观点，对艺术哲学继续进行着新的探索。恩格斯于一八四六年至一八四七年写了两篇书评，即《卡尔·倍克〈穷人之歌〉，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诗歌》、《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1页。

点论歌德〉》。恩格斯通过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倾向的批判，进一步强调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立场和观点。而马克思于一八五九年一月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一八五七年八、九月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则进一步深刻而精辟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理论原则。就艺术哲学而论，马克思主要阐明了以下几点：第一，文学艺术属于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所决定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马克思看来，文学艺术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之一，它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为经济基础所决定；文学艺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而变化；文学艺术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而对这种反作用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夸大就会陷入唯心主义的境地，缩小也会陷入机械唯物主义的泥潭。但对于这种反作用，一定要注意它的条件性。第二，在特定历史时期内物质生产同艺术生产发展的特殊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强调：（一）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的发展是不平衡的。马克思说：“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①什么是社会的一般发展？按照马克思的解释，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所谓艺术生产发展同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也就是指的艺术与物质基础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二）怎样正确理解古希腊艺术的不朽魅力？对这个问题，也要有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理解。因为每一历史时代的文学艺术，是适应一定历史时代社会物质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113页。

生产发展的需要的。也就是说，文学艺术只有在适应一定时代的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需要，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某些社会本质面貌，才能源远流长和亘古不朽。古希腊艺术之所以具有不朽的魅力，是因为它表现了古希腊的劳动人民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认识和理解，即它是根植于生产劳动的现实基础之上，对自然和社会充满着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同时，马克思指出：希腊人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它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它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它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① 由此可见，马克思通过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分析和论述，指出了既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文艺观，又要反对机械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文艺观；既要看到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和文学艺术的反作用，又要看到上层建筑诸因素的相互作用及文学艺术本身发展的特殊规律性。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是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比起四十年代，他们对文艺问题的探讨，更广泛更深入了。一八五九年四、五月间，马克思、恩格斯就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同拉萨尔的通信中，集中地论述了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问题、悲剧因素的社会根源问题、现实主义的问题、现实主义的人物塑造等文艺创作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可以说，这两封信，是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辩证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4页。

物主义文艺思想的集中体现。到了八十年代，随着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更加完善。一八八五年，恩格斯致敏·考茨基的信，通过对敏·考茨基的长篇小说《旧与新》的评论，围绕着艺术典型的塑造、艺术倾向和真实性的关系以及当时社会主义倾向文学的历史使命等问题，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倾向文学"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创作倾向。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也是八十年代的一篇重要文献。恩格斯通过对哈克奈斯的中篇小说《城市姑娘》和对巴尔札克创作的评论，集中地阐述了他对文学艺术中现实主义问题的见解，提出并论证了诸如现实主义的真实性、现实主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原则、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使命以及继承和借鉴现实主义优秀遗产等问题。恩格斯在这些问题上所表达的一系列重要见解，是他和马克思长期以来对现实主义问题所作的探索的成果，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现实主义理论的形成以及进一步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即恩格斯的晚年，他对文学创作中的唯物主义原则更是坚信不移，并有新的见解。这集中体现在他致保·恩斯特的信和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一八九〇年六月五日，恩格斯在致保·恩斯特的信中，集中论述了唯物主义方法是研究历史的指南这一基本原理，揭露了恩斯特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①的卑劣行径，从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恩格斯示范地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精辟地剖析了以易卜生为代表的挪威文学及其形成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2页。

的社会历史根源，这对于正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文艺现象，具有普遍的深刻的指导意义。一八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恩格斯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也为我们研究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马克思主义艺术哲学的创立，是人类文学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个根本变革。正是这场变革，无产阶级文学艺术事业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新气象。然而，马克思主义的艺术哲学也如同他们的其他方面的理论一样，需要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不断得到补充、充实和发展。列宁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对马克思主义艺术哲学进行了新的探索。列宁在这方面的论著很多。这里，我们将着重介绍《列·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给阿·马·高尔基》、《青年团的任务》等论著的基本思想，以便从中体察列宁在对马克思主义艺术哲学进行新的探索过程中取得的重大成果。

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一年，列宁针对当时各种反动势力歪曲和诬蔑托尔斯泰的政治企图，撰写了一系列评述托尔斯泰的论文，诸如《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尼·托尔斯泰》、《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托尔斯泰和无产阶级斗争》、《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等等。这些论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地分析和评价了托尔斯泰的思想和创作，表达了列宁关于文学艺术的许多重要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关系问题：

第一，文艺和生活的关系问题。列宁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来分析和评价托尔斯泰的文艺作品的。他称赞这位

"天才的艺术家"创作了一幅"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①作为"俄国革命的镜子"，"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②恩格斯曾提出"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③的著名论点，作为对现实主义艺术反映社会生产本质的基本要求。列宁则通过对托尔斯泰创作的分析和评论，进一步发挥了恩格斯这一著名论点。列宁认为，托尔斯泰之所以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是因为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从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来看，是因为"托尔斯泰极其熟悉乡村的俄国，熟悉地主和农民的生活。他在自己的艺术作品里对这种生活描绘得这样出色，使这些作品列入世界最优秀的文学作品里。"④熟悉俄国社会生活，是托尔斯泰创作成功的根本原因。

第二，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列宁称赞"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这就肯定了他的作品"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列宁是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特别是直接从文艺与革命的关系上来分析、研究和评价托尔斯泰的作品的。为了把这种分析、研究和评价引向深入。列宁十分"注意从俄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这个观点去分析他的作品。"⑤他指出：（一）托尔斯泰的作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俄国革命的性质和特点；（二）托尔斯泰的作品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俄国革命的力量和弱点。也就是说，一方面托尔斯泰深刻揭示了俄国革命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370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36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
④ 《列宁全集》第16卷，第330页。
⑤ 《列宁选集》第2卷，第369页。

的根源、性质和特点，真诚地表达了俄国农民的革命要求；另一方面又狂热鼓吹“勿以暴力抵抗邪恶”的反动说教，抵制、取消革命。这样，托尔斯泰便成了“不革命”的“革命家”。①

第三，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的关系问题。列宁从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的观点出发，强调生活对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的决定作用，同时强调世界观和创作的一致性，着重分析了托尔斯泰世界观的转变、矛盾及其根源。列宁指出，“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急剧的破坏，加强了他对周围事物的注意，加深了他对这一切的兴趣，使他的整个世界观发生了变化。”②当托尔斯泰的世界观转变到宗法式农民的立场上来之后，使他能够比较自觉地用农民的眼光观察各种重大的社会问题，从而使他的作品、观点和学说呈现出新的面貌，打上了宗法式农民的鲜明的印记。列宁不仅分析了托尔斯泰的世界观的转变，而且深刻指出转变后的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宗法式农民世界观所包含着的显著的矛盾：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另一方面，他是一个发狂地笃信基督的地主。这就是托尔斯泰世界观的双重性。列宁还分析了托尔斯泰世界观和创作中的矛盾的社会阶级根源，指出这是十九世纪后三十年俄国实际生活所处的矛盾条件的表现。列宁这些分析，为我们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或原则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提供了光辉的范例。

---

① 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370—371页。

② 《列宁全集》第16卷，第330页。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苏维埃政权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即使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列宁对文学艺术的探索也没有停止。一九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列宁《给阿·马·高尔基》的信，就说明了这一点。

列宁在给高尔基的信中，从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立场出发，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根本利益出发，从他和高尔基的革命友谊出发，对高尔基文学活动的成就给予了热情鼓励和高度评价。但当高尔基思想出现反复时，列宁又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及时的帮助。列宁的这封信，就是针对高尔基思想上的反复所做出的深入细致的分析。首先，列宁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深刻分析了高尔基出现反复，出现“不健康”情绪的原因。列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剖析了高尔基来信的内容，联系过去同高尔基谈话的印象，坦率地指出：“您的结论，或是您的一切印象，都是完全不健康的”①，这是“一种在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环境中变本加厉的病态心理”②，“是人为地置身于无法观察新生活而受资产阶级大首都腐败印象折磨的境地的人的情绪。”③就是说，列宁认为高尔基的不良思想情绪，是因为他“不能直接观察工人和农民，即俄国十分之九的居民生活中的新事物。”④为此列宁在这封信里，不仅在理论上作了精辟的阐述，而且还从实践的高度向高尔基提出了“彻底改换环境”的建议，要他“无论是接触的人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58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59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61页。
④ 《列宁选集》第4卷，第60页。

或居住的地方，或工作都得改换一下”，“到农村或外地的工厂（或前线），去观察人们怎样以新的方式建设生活。在那里，单靠普通的观察就很容易分辨出旧事物的腐朽和新事物的萌芽。”①列宁还指出，只是到工人、农民、士兵中还不够，还应该在下面观察即深入工农兵的火热的斗争生活，直接观察他们之中的新生事物，这才是无产阶级文艺家改造世界观，获得文艺创作源泉的光明大道。

列宁的“要观察，就应该在下面观察”②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艺术哲学，对文学艺术家的创作和生活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后来这个思想被毛泽东在实践中加以充实和发展。

一九二〇年十月二日列宁作的《青年团的任务》的演说，更加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艺术哲学。列宁在这篇演说里，以相当的篇幅论述了无产阶级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深刻地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民族虚无主义的胡说，揭示了正确地发展无产阶级新文化的道路。列宁的论述，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如何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的具体运用。列宁认为：（一）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全部人类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列宁针对那种认为不掌握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就能成为共产主义者的错误认识指出：“如果认为不必领会产生共产主义学说的全部知识，只要领会共产主义的口号，只要领会共产主义科学的结论就已经够了，这也是错误的。”③并进而指出，马克思主义学说之所以能够成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61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60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347页。

为千百万无产者的思想武器，正是由于它借助于充分领会过去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对社会发展规律进行了深刻研究的结果。因此列宁认为“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① （二）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都要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吸收，任何一点都不要忽略过去。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的演说中，明确地指出了继承文化遗产对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意义。他尖锐地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派”对文化遗产采取的虚无主义的态度，充分肯定了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及其对发展新文化的作用。他指出：“你们不仅应当领会你们学到的知识，并且要用批判的态度来领会这些知识，使自己的头脑不被一堆无用的垃圾塞满，而能具备现代有学识的人所必备的一切实际知识。如果一个共产主义者不用一番极认真、极艰苦而浩繁的工夫，不理解他必须用批判的态度来对待的事物，便想根据自己学到的共产主义的现成结论来炫耀一番，这样的共产主义者是很可怜的。”② 列宁这段话，既批判了对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态度，又批判了对文化遗产的顶礼膜拜主义态度。列宁关于批判地继承优秀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人们确切地了解和正确地对待旧文化。对待旧的文化遗产的继承之所以发生右的或“左”的偏差，常常是由于对遗产的了解不够确切造成的。当然，批判地继承旧文化遗产，还必须根据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革命实践，实事求是地进行检验。按照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利益和需要去加以取舍，加以改造。这种取舍和改造的过程，也就是

①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348页。

批判地继承的过程。

斯大林坚持和发展了列宁的艺术哲学的思想，进一步强调了深入工农实践生活的必要性。在他的领导下，苏联文学艺术曾出现过繁荣的景象，发展了社会主义的文化和文学艺术。但是斯大林在晚年，由于个人崇拜思想作怪，苏联的文学艺术事业也被引向了狭窄的胡同。这种严重的教训，曾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消极影响，其中包括对中国文艺界的消极影响。人们通过接受教训，总结经验，才使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毛泽东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艺术哲学，总结了国际国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的实际，继续探索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艺术哲学。

第二节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标志着毛泽东艺术哲学思想的形成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探索文学艺术发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工作者的一项严肃任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同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艺术哲学。列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艺术哲学进行了新的探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毛泽东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与此同时，毛泽东丰富和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艺术哲学。

毛泽东从参加革命之初，就十分重视文化建设。他特别重视文学艺术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积极作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系统地总结了中国“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运动的经验教训，并把它系统化、理论化，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艺术哲学。毛泽东的艺术哲学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九三九年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一文中，就提出了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的思想。不久，他又在《新民主主义论》里，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了文学艺术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末，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① 这个分析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毛泽东还分析了革命文化与革命工作的关系，他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4页。

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而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因此，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①因此，“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②毛泽东特别提出要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因为“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③毛泽东并不反对吸收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用的文化，但坚决反对“全盘西化”的错误主张。他提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④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提出的许多思想、见解，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的直接继承和发展。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这些见解大大地丰富了，形成了系统的中国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的艺术哲学的形成。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部具有划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7页。

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献，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的文艺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它系统而深刻地总结了从“五四”运动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思想斗争的历史经验。它在世界观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精辟地阐明了存在与意识、主观与客观、动机与效果、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等一系列重大哲学问题。它在文艺理论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精辟地论证了文艺与生活、文艺与群众、批判与继承、内容与形式、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的文艺理论问题。

第一，毛泽东强调了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① 这个问题关系到文艺的性质和方向。因此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工作者所一贯关注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但已经提出了文艺要有社会主义倾向，要正确地表现工人阶级，要正确地描写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问题。列宁曾指出：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为饱食终日、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上等人服务，而应当为国家的精华即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也就是为国家的未来服务。列宁这里讲的写作事业也包括文艺事业在内。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的思想，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② 这个结论是从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际中引申出来的。因而毛泽东要求作家、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0页。

艺术家，必须深入工厂、农村、部队和党政机关，去了解和熟悉各种人、各种事。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作家、艺术家还必须使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①当然，对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我们不能作简单的、狭隘的和绝对化的理解，而要历史的、发展的和辩证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历来反对把理论原则看成是静止的、孤立的、一成不变的僵死的条文。毛泽东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理论原则，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

第二，毛泽东强调文艺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这就阐明了普及和提高的辩证统一关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在指出了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之后，接着阐明了如何去服务的问题，即我们的文学艺术是努力致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致力于普及？正确地理解这个问题对于发展革命文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②提高以普及为基础，普及又在提高指导下，二者互相依赖，不可或缺，这就是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关于普及与提高的不同作用，毛泽东运用了形象而贴切的比喻，他指出，普及的作用好比"雪中送炭"，提高的作用好比"锦上添花"；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既需要普及，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9页。

也需要提高。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民群众对于二者的需要程度是不同的。根据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处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人民群众文化水平很低。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毛泽东认为"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① 他指出："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② 所以，在抗日战争条件下，对于人民群众，"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③ 同时，毛泽东坚决反对孤立地谈提高或谈普及，他指出，"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 ④ 毛泽东还把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联系起来，指出："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 ⑤ "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 ⑥

第三，毛泽东强调文艺来源于生活，又要真实地反映生活。毛泽东在论证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时，针对当时文艺界存在的问题，着重阐明了文艺的源泉问题。毛泽东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9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9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9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8卷，第816页。

物。革命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①文艺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客观反映，还是作家头脑中所固有的？这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创作原则相互斗争的焦点。社会生活是文艺作品的唯一源泉，文艺作品是反映社会的观念形态，这是唯物主义创作原则的基本观点。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一贯重视文艺要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过：“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②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文中也指出：“物、世界、环境、是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只是外部世界的映象；不言而喻，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被反映者是不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的。”③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离开社会生活这个存在，就不可能有文学艺术的反映。从这个意义说，“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65页。

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① 当然，文艺反映社会，不是消极被动和简单的摄像，而是积极能动地和有取舍地进行加工。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②

第四，毛泽东强调文艺创作的典型化问题。文艺的典型化，首先是矛盾和斗争的典型化。毛泽东要求作家、艺术家，把日常生活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③ 革命的文艺作品，虽然必须真实地反映生活，但又必须比生活更高。这就是要着眼于生活中的矛盾冲突，着力于矛盾冲突的典型化。从事物矛盾的普遍性来说，没有矛盾就没有社会生活，也就没有典型化本身。所以，文艺的典型化，既不能掩盖社会生活中的矛盾，也不能忽视典型化过程中的矛盾。当然，文艺典型化的中心是形象的典型化，形象典型化的关键又是人物的典型化。毛泽东指出：“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进历史的前进。”④ 这里所指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就是要作家塑造典型人物。这种典型人物，就是作家艺术家运用典型化的方法所创造出来的既反映一定社会本质，又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的人物形象。要做到典型化，作家、艺术家就要深入生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的千差万别的个性特点，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独具鲜明个性特点的典型人物来。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7页。

②③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8页。

第五，毛泽东认为必须批判地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才能发展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关于这个问题，列宁讲得很充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针对中国作家、艺术家的思想状况，又着重强调指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那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①我们对文学艺术遗产的批判继承，一方面不应割断历史，要给文学艺术遗产以一定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也要注意文学艺术遗产所由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确定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作用。只有对文学艺术遗产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才能既不苛求古人，否定传统；又不颂古非今，不顾今用。

第六，毛泽东关于文艺批评与思想斗争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论"的第四部分，对文艺批评问题作了许多论述。他深刻地阐明了有关文艺批评的许多重大问题。如文艺批评的性质和作用；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对反动文艺思想的批判等等。在这里，毛泽东主要强调：（一）文艺批评是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十分重视，认为这是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重要手段。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更加强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7页。

调了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二）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毛泽东指出："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①这里，毛泽东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出发，提出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去评价作品。他反对在文艺批评中，把作品变成某种政治观点的图解物，即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仅仅归结为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提出我们应该把文艺作品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和作品中包含的其他方面的思想内容（诸如，社会观点、哲学观点、历史观点、道德观点、艺术观点等等），它对生活的认识价值，以及同艺术的形象、题材、构思、艺术所反映的生活真实等等都综合起来进行考察，进行评价。这样才真正会使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达到统一。毛泽东的思想已成为我们文艺批评的基本原则。

总之，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部马克思主义艺术哲学著作。因此，完整地、准确地、联系实际地学好它，对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和哲学研究，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后来，毛泽东一直没有停止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探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6页。

索。他在《反对党八股》、《论联合政府》等文章中，对一些问题又有了新的见解。他在《反对党八股》中反复强调要反映生活的本质问题，指出："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① 在《论联合政府》中，又强调了两点：第一，民族化的问题。"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样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② 第二，批判地继承问题。"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③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十、四十年代，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的文艺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艺术哲学，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毛泽东艺术哲学思想。毛泽东艺术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艺术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以后，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艺术哲学继续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新的成果。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5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4页。

第三节 毛泽东艺术哲学思想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展开和发展

一九四九年十月，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将“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①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建立，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发展。一九五六年，我国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标志着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已基本完成。

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使我国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也相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新经济、新政治，必然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学艺术是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必然也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并为新的经济基础的巩固发挥作用。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毛泽东继续对马克思主义艺术哲学理论，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艺术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并取得了新的成果。在这一段时期，毛泽东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56页。

先后发表了《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献。《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是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又一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文献。在这篇重要文献中，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我国革命文艺实践的新经验，集中论证了文艺如何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科学原则，并具体阐明了如何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以利于我国的民族形式、民族风格的再创造的问题。毛泽东这篇重要的谈话，对繁荣和发展我国新时期的革命文艺具有重大的意义。它的基本点是：

第一，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共同性，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毛泽东指出：“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① 这里，毛泽东从个性和共性的辩证关系上，提出和论证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要有自己的独创性问题。

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来说，坚持个性和共性的辩证统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否定文艺的共性，就会导致摈弃一切对我国文艺创作有用的优秀的外国文艺创作的成果，采取目空一切的民族沙文主义的态度。反之，忽视、否定文艺的个性，又会导致对我国、我们民族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创造，采取“全盘西化”的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这两种态度，都是不

① 一九七九年九月九日《人民日报》。

利于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因此，毛泽东主张，对“外国的许多东西都要去学．而且要学好，大家也可以见见世面。”①又说，“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②毛泽东以他鲜明的立场，号召人们研究我们社会主义的自己民族的文艺发展规律。他指出：“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它自己的规律。”③尊重本民族的文艺创造，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基础。也就是说，中国的文学艺术首先要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其次要吸收一切外国对中国有益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文学艺术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东西，它也才能是不朽的和有生命力的。

在文学艺术的民族内容和民族形式的关系上，毛泽东反对把内容和形式绝对对立起来，同时也反对把内容和形式统一的原则作为一个抽象的公式套到民族形式上。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民族形式必须表现民族生活的内容。一部文艺作品的民族形式不能是抽象的，它必须包含着地方特色、风俗习惯、民族思想感情等等因素。作家必须通过对上述因素的掌握和描绘，才能把鲜明的民族性在文艺作品中表现出来。这样，毛泽东就把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思想大大发展了，并更具体化了。

当然，我们主张文艺创作的民族化，正象毛泽东所一再强调的，并不是要排斥学习外国的优秀创作成果。但是，向外国学习、借鉴，正是并且也仅仅是为了用来研究和创造中国人民各民族自己的东西。这一思想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

①②③ 一九七九年九月九日《人民日报》。

的讲话》关于学习和借鉴思想的展开和具体化。

第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文艺发展中的一条重要原则。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反复提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这是毛泽东在对待中外文化遗产问题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概括。他指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①这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否定之否定原理于文学艺术领域的范例。正如列宁所说的，辩证法的特征的和本质的东西并不是单纯的否定，并不是任意的否定，而是作为联系环节、作为发展环节的否定，是保持肯定的东西的否定。因此，毛泽东说：“中国的文化应该发展。……要向外国学习，学来创作中国的东西。”②这就是说，不管是向古人学习，还是向外国学习，都是为了发展中国文化，最终目的，是创作出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东西。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实践问题。学习外国的东西，不能是“全盘西化”，不能为学习而学习。只有为我所用的学习，才不会因此而“虚无”了我们民族的文艺。学习古人的东西，也是同样的道理。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今人，是为了创新。因为文学艺术的来源和本质无论是古代的还是外国的，都是人们的社会生活的反映。世界各国的文化发展不是孤立隔绝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古代的文化是今天文化的基础。这样，毛泽东就在文艺

①② 一九七九年九月九日《人民日报》。

创作的方法论问题上，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既坚持了文艺创作的唯物主义原则，又坚持了文艺创作的辩证法要求。按照这个原则所创作的文艺作品，就能既有自己的民族习惯、民族传统和审美志趣，又有外国的有益的东西。它必然为中国人民所欢迎，也会从中外文艺相互借鉴的意义上取悦于外国的人民。从而，为发展人类的文学艺术作出贡献。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对繁荣和发展我们社会主义的革命文艺具有重要作用。对马克思主义艺术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①，社会上“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②，“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③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已经成为当时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正是这样，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同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的这两部著作，对于指导全国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伟大实践，对于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其中包括文学艺术事业的繁荣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下面我们对毛泽东这两部著作中的艺术哲学思想作一简要论述：

---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7页。

第一，毛泽东在这两部著作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科学文化的方针。关于“百花齐放”的原则，最早是毛泽东对戏曲问题的一个意见。为了改革和发展我国戏曲艺术，他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推陈出新”的思想，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已经有了。但那时是从文艺改革和继承文化遗产方面的意义上讲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作为一条文艺方针，作为一个完整的文艺指导原则，是在全国解放初期，为改革和发展戏曲艺术而提出来的。其目的，在于鼓励各种剧种自由、主动地发展，相互竞赛，并在批判地继承传统戏曲遗产的基础上，繁荣和发展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新戏曲。这一原则，曾导致了五十年代我国文艺园中的空前繁荣景象。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形势发展的需要，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于一九五七年提出并全面论证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从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成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发展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的指导方针。

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有其客观依据的。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原理，科学地分析了我国的具体情况：（1）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在我国已占统治地位，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的新时期；（2）知识分子队伍的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一支生力军；（3）社会中阶级关系已发生了新变化；（4）国内的主要矛盾已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

自然开战。正是基于我国社会的上述变化，毛泽东对我国社会问题作出了科学的论断：在“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①因此，毛泽东指出，要敢于公开承认人民内部矛盾的普遍存在，要重视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能性。并且，毛泽东认为这是提出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重要前提。毛泽东认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这种民主说理的方法，运用于文学艺术和科学文化领域，也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完全适应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而产生的。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迫切需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科学事业。人民当家作主，物质生活的改善，必然更需要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因此人民群众迫切需要作家、艺术家为他们创作出鲜明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的文艺作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是达到这种目的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这一方针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丰富和展开。

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艺术哲学理论。它的基本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观察和处理文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2页。

艺的发展问题。从主体和客体的结合上，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上，阐明了正确认识总是同错误认识，真、善、美的观念总是同假、恶、丑的观念相联系而存在的。离开错误的认识也就无所谓正确的认识，离开假、恶、丑也就无所谓真、善、美。毛泽东指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①一部优秀的作品以至科学真理，都是也只能是在反复的探索、反复的斗争、反复的推敲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因此，"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②

（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体。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真理与谬误，真、善、美与假、恶、丑都是对立统一的。因此，我们不能只允许正确的东西生长，而不允许错误的东西发生。正确与错误总是同时共存的，它们又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转化的。因此，毛泽东认为："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③这样，毛泽东就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上，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战略策略原则上，阐明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意义，奠定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文艺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1页。

创作和文艺批评的理论基础。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发展。

（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深刻地蕴涵了发扬真理、批判谬误，在斗争中发展文学艺术的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的分析和充分的说服力，给正确的东西以讴歌，给错误的东西以批判，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双百"方针最核心的东西。对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作品，对损害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言行，不能采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自由主义态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包含着批评的自由和反批评的自由的思想。真理不辩不明。问题不在于错误的东西该不该批评，而在于用什么方法去批评。马克思主义既反对"不痛不痒"的批评，也反对"一棍子打死"的批评；这样的批评是没有力量的，也是不解决问题的。需要的是科学分析和充分说理。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识别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没有艺术和科学的民主；反之，没有艺术和科学的民主，也就不能正确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实践已证明了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第二，毛泽东在这两部著作中提出在文艺创作上，允许作家、艺术家自由地选择题材、体裁、形式、风格及创作方法的思想。

关于创作题材问题，长期以来，是一个争论激烈的问题。这个问题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前，针对加强党的出版物的党性问题曾涉及过。他指出："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

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大空间，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大空间。”①这一思想虽不是专讲文学艺术，但无疑对文学艺术是适用的。而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是对列宁这一光辉论断的发展。也就是说，在文艺创作上，既要歌颂社会主义和英雄人物，同时也要批评旧社会和反面人物；既要歌颂进步，同时也要批评落后。这样，文艺题材才是广阔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决定了文艺题材必须多样化。我们说这首先源于社会主义的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其次因为作家、艺术家的经历、气质、观察力、表现手法各有其特殊性，因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是反映这一客观现实的结果。

关于文艺的表现形式和风格，毛泽东认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②这同样是由客观的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和题材广阔多样所决定的。

其实，文艺形式和风格的多样化，主要是由文艺创作本身的规律决定的，其次也受文艺服务对象的制约。因为，一方面，各种文艺形式之间是不能替代的。诸如，小说不能代替诗歌，电影也不能代替戏曲；另一方面，人们所喜爱和欣赏的东西也不可能整齐划一。这样，文艺创作就一定要有丰富多样的种类、题材、体裁。

关于创作方法，我国文艺界历来看法莫衷一是。毛泽东在

① 《马恩列斯论文艺》第7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8页。

抗日战争时期曾提出过，要将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并有一定的论述。但那时并不是专指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而言的。解放后，毛泽东也曾提到过这种结合，但也有特定的含义。将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结合起来，作为一种文艺创作的方法，无疑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艺术哲学的一个发展。但是，毛泽东也并不认为所有作家、艺术家只能按这一种方法进行创作。这是因为，作家、艺术家在长期的从事文学艺术实践的过程中，他们各自由于自己的特殊的实践经验，逐渐形成了自己认为最好的创作方法，这是很正常的。文学艺术的发展，正是由无数个作家、艺术家的各自的创作方法，才形成了总的文学艺术领域中的各种创作方法的互相竞赛，推动了文艺创作的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是体现和保证了这种文艺创作的发展。

第三，毛泽东在这两部著作中提出了繁荣文学艺术，发展科学，加强和发展文艺科学队伍的建设，提高全民族文化科学水平的思想。

恩格斯在论证文艺复兴时代在文艺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时指出：这个时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①马克思主义是很重视文艺家、科学家在文艺、科学事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任何民族、任何国家要想在科学文化上走在世界民族的前列，除了要有非常进步的经济基础之外，还必须拥有大批的走在世界科学文化前列的卓越的文艺家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5页。

和科学家。

毛泽东历来重视上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他指出："我们准备用这个放的方针来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改变他们现在的面貌"。①毛泽东这段话，蕴涵着非常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亿万劳动人民创造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前进。毫无例外，在社会主义时期，文艺和科学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事业。并且，这是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形态所无法比拟的。但是，应当认识到，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因而，从事文艺和科学的人，还只能是少数人，这是远远不能适应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要加速文艺、科学的发展步伐，就必须最大限度地调动文艺、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而采取"放"的方针，就是最好的方法。这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我们还必须看到，文学、艺术作为精神生产，是与物质生产不同的。恩格斯就曾指出："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它的曲线就愈是曲折。"②这就是说，精神生产不同于物质生产的特点就在于：一方面，它虽然也愈来愈依赖于现代化的物质生产；另一方面，它依然是个体的脑力劳动，这样，在文艺、科学领域里，艺术家、科学家的个人作用是非常突出和非常重要的。虽然亿万群众的认识和实践是文艺家、科学家个人认识和实践的基础，但仅仅有这个基础还不能产生出文艺作品或科学成果。只有通过文艺家、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7页。

科学家头脑的加工、制作、改造、提高等创造性劳动，才能产生出新的成果并达到新的水平。鉴于文艺、科学具有个人独创性的特点，在艺术上就必然形成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在科学上也必然形成不同的观点和学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完全适应文艺、科学事业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而提出来的。它充分体现了尊重文艺、科学工作者的个人的创造性，并为他们发挥其聪明才智提供了广阔的现实的空间。这样，就把人民的文艺事业与个人在人民的文艺事业中的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毛泽东指出：“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①其中“放”与“争”就体现了承认文艺、科学工作者之间在才能上的差别。有差别，才能比较，才能鉴别，才能竞赛，也才能发展。否认差别，实质上也就否认了发展。因此，毛泽东反对文艺创作和科学创造的“模式化”。这种“模式化”抹煞了文艺、科学的特殊性、多样性，它有害于“放”和“争”，因而有害于繁荣和发展文艺、科学事业。承认差别，主张“放”和“争”，就可以有力地促进文艺、科学工作者的个人创造，从而促进整个文艺、科学事业的发展。

正确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可以使不少具备真才实学、真知灼见的人涌现出来，也可以使少数存心投机取巧的人暴露出来。这样，广大文艺、科学工作者就可以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增长才干，并逐渐改变自己的精神面貌。因此，

---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5页。

我们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既可以发展真理，也可以起到加强和发展文艺、科学队伍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艺术哲学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已在更广阔的领域内展开了，涉及到了我国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其他方面的生活。学习、领会、掌握、运用这些思想，对于当前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必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十章

毛泽东在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的创立和发展

在哲学史上，道德哲学亦被称为伦理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道德哲学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就不能不论及到它的道德哲学思想。

中国古代的许多哲学家，都广泛深入地探讨过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问题，留下了丰富的思想成果。例如先秦时期，孔孟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都是当时很有影响的道德伦理学说。后来则有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宋明理学等。这些当然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其中包括他的道德哲学思想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作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毛泽东的道德哲学思想，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哲学思想。所以分析和研究一下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的创立和发展，是完全必要的。

道德哲学，主要是关于道德及其起源和发展、人们的行为准则、人们相互间和人们对社会、国家等的义务的学说。简言

之，道德哲学就是研究人类道德现象的科学。这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前，西方一些资产阶级哲学家、思想家，已对它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产生了诸如快乐论、功利论、禁欲论、完全论等类型的伦理学说。这些学说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起过不同的作用，但由于这些学说是以历史唯心主义为基础的，因而都把道德的规范和原则说成是人们主观经验或抽象理性的产物。所不同的是，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家把道德说成是“人的内心活动”、“人的良知”、“人心中的自由意志”等等；而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家则把道德说成人这个主体之外的“绝对精神”、“绝对观念”、“天理”、“神的意志”的体现等等。主观唯心主义者和客观唯心主义者虽然说法不同，但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歪曲了道德的起源和本质。

旧唯物主义思想家虽然在道德的起源问题上有许多合理的见解，但由于他们离开了人的社会性，离开了人的历史发展，因而不可能正确地解释道德的发生、发展及其变化的客观规律性。例如费尔巴哈，由于他把人看成是一个“超时代”、“超社会”、“超阶级”的抽象的人，因而他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成是脱离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抽象的关系。“费尔巴哈在每一页上都宣传感性，宣传专心研究具体的东西，研究现实，可是这同一个费尔巴哈，一谈到某种比人们之间的纯粹性关系更进一步的关系，就变成完全抽象的了。”① 因为费尔巴哈脱离了人的社会性，脱离了人的历史发展去研究人类社会的道德现象，所以他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和分析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的同时，揭示出了人类道德的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哲学。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是在批判各种各样的剥削阶级道德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共产主义就是同传统的私有制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因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自身思想改造的强大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揭穿了剥削阶级各式各样的道德学说的实质，指出了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有阶级性的；道德的规范和原则既不是凭个人经验任意制定的，也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依据社会的经济关系以及道德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联系而发生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从它创立的第一天，就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运用到一切知识领域中，当然也包括伦理道德学说。“除此以外，唯物主义根本没有更多的意义，只是在这里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和论述了道德的起源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曾精辟地分析过：“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直接矛盾的。……但是今天的情形是怎样的呢？今天向我们宣扬的是什么样的道德呢？首先是由过去的宗教时代传下来的基督教的封建主义的道德，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8页。

……和这些道德并列的，有现代资产阶级的道德，和资产阶级道德并列的，又有无产阶级的未来的道德，所以仅仅在欧洲最先进国家中，过去、现在和将来就提供了三大类同时并存的各自起着作用的道德论。哪一种是有真理性的呢？如果就绝对的终极性来说，哪一种也不是；但是，现在代表着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的那种道德，即无产阶级的道德，肯定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① 这就说明：第一，道德的产生和变化最终是由社会生产力的状况决定的；第二，一定的道德规范和规则是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反映和表现；第三，道德的产生虽然是经济基础决定的，但它一旦形成就会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必然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离开社会存在谈社会意识就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表现。同样，离开社会经济发展、离开生产力的状况谈道德问题，就是唯心主义的道德观。

因此，在阶级社会里，道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未来的利益。在这里没有人怀疑，在道德方面也和人类知识的所有其他部门一样，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但我们还没有越出阶级道德。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② 恩格斯又指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8卷，第132——1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8卷，第133——134页。

“……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①这就说明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道德总是阶级的道德，是一定阶级政治、经济利益的反映。尽管历史上许多哲学家、思想家不承认或有意掩盖他们道德的阶级性，但这种道德的阶级性却是十分明显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唯物辩证法思想体系的过程中，科学地指出了人类道德的起源与道德的阶级性，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大意义。因为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和镇压无产阶级的斗争，总是把自己的道德说成是代表“全体人民的”、“超阶级”的，以此欺骗工人阶级、麻痹人民的革命斗志。为了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工人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一针见血地把资产阶级的道德本质揭露了出来。他们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②后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更进一步揭露了资产阶级宣扬的“永恒真理”、“永恒道德”的反动本质，指出：“从动产的私有制发展起来的时候起，在一切存在着这种私有制的社会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页。

道德戒律一定是共同的：切勿偷盗。这个戒律是否因此而成为永恒的道德戒律呢？绝对不会。在偷盗动机已被消除的社会里，就是说在随着时间的推移顶多只有精神病患者才会偷盗的社会里，如果一个道德宣扬者想来庄严地宣布一条永恒真理：切勿偷盗，那他将会遭到什么样的嘲笑啊！”①道德总是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根本不存在“永恒的道德”。恩格斯还从资产阶级道德的伪善性这一点上进行了批判，指出资产阶级思想家“把人类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类，分成人性的人和兽性的人，分成善人和恶人，绵羊和山羊，这样的分类，除现实哲学外，只有在基督教里才可以找到。基督教一贯地也有自己的世界审判者来实行这种分类。”②离开阶级和阶级斗争，抽象地谈好人和恶人，这只能起到欺骗和麻痹人民的目的。因而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批判它，肃清它对无产阶级的消极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德国哲学是从意识开始，因此，就不得不以道德哲学告终，于是各色英雄好汉都在道德哲学中为了真正的道德而各显神通。费尔巴哈为了人而爱人，圣布鲁诺爱人，因为人‘值得’爱，而圣桑乔爱‘每一个人’，他是用利己主义的意识去爱的，因为他高兴这样做。”③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哲学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批判地吸收了前人的先进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他们不仅从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那里吸收了积极的思想成果，而且也从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吸收了合理的部分。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新的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4页。

论探索和新的理论创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少著作中都论及到道德哲学问题，其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反杜林论》等著作，尤为突出。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揭示了道德的本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道德也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基础也就有什么样的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观念，社会经济基础的不断变更，道德观念也就会随之而发生变化。在阶级社会里，由于人们所处的阶级地位不同，也就决定着人们的道德观念是不同的，各种各样的道德学说都隶属于一定的阶级的。由于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道德的观念和道德的标准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第二，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不可能存在"超阶级"的道德。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竭力把自己本阶级的道德说成是代表全体人民的，是"超阶级"的，这正好说明它也是隶属于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同资产阶级道德观相反，它不隐瞒自己的阶级性，公开声明它是无产阶级的道德，是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和斗争服务的。因此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是坚持了彻底的唯物论。

第三，道德的发生和发展有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唯物而又辩证地揭示了人类道德发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性。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首先应该承认物质生活对人类道德的决定作用，这就与唯心主义理论划清

了界限；但是作为上层建筑的道德观念并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它一旦形成就有相对的独立性，就会对人类物质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即促进或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分析又与机械唯物论者划清了界限。“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① 斯大林也正确地指出过：“上层建筑是由基础决定的，但这决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它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是漠不关心的。相反的，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去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② 这就说明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道德是有反作用的。它的反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新的道德对生产力的发展有促进作用，旧的道德对生产力的发展有阻碍作用。（二）道德与政治、法律、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既互相区别又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因而道德可以对政治等意识形态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也可以用消极的阻碍作用。（三）道德与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决定了先进的、经济发达的国家不一定有先进的道德观念；反之也一样，落后的、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却可能产生先进的道德观念。（四）道德有历史的继承性。这种继承性说明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过程，也说明道德观念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1页。

② 《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21页。

内发挥巨大的作用。（五）无产阶级的道德观是最先进的、科学的道德观。

总之，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创立是伦理学史上的伟大革命，也是哲学史上的一场革命。但是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并没有穷尽真理，它要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经验，对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充实。列宁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论及这个问题，比较突出的有《青年团的任务》、《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论无产阶级文化》、《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伟大的创举》等著作。列宁也象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坚决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理论，指出："是在资产阶级宣传的道德的这意义上，因为这种道德是他们从上帝的意旨中引伸出来的。关于这点，我们当然说，我们不信上帝，并且我们明明知道，僧侣、地主和资产阶级都是假借上帝的名义说话，为的是要贯彻他们这些剥削者的利益。也有人不是从道德的意旨中，不是从上帝的意旨中，而是从往往同上帝意旨很相似的唯心主义或半唯心主义论调中引伸出这种道德来的。"① 列宁还指出："我们摈弃从超人类和超阶级的概念中引来的这一切道德。我们说这是欺骗，这是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来愚弄工农，禁锢工农的头脑。""我们说，我们的道德完全服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我们的道德是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中引伸出来的"② 所以列宁说"超人类社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351——352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352页。

会的道德是没有的；这是一种欺骗。”①列宁的这些分析，是深刻的。

列宁还根据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提出了共产主义道德这个概念，而且还分析和论述了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下面我们就列宁的这个贡献作一个简短的介绍。

第一，列宁在人类伦理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共产主义道德的概念。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面临着严峻考验。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在一九二〇年十月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提出了“共产主义道德”这个概念，并对这一概念进行了科学的解释。他说：“共产主义道德就是为了把劳动者团结起来反对一切剥削和一切小私有制服务的道德”，共产主义道德“是为破坏剥削者的旧社会、把全体劳动者团结到创立共产主义者新社会的无产阶级周围服务的。”②因而共产主义道德“是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中引伸出来的”，是“完全服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利益”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列宁还认为“共产主义者的全部道德就在于这种团结一致的纪律和反对剥削者的自觉的群众斗争”。③“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④，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这也就是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基础。从列宁对共产主义道德的这些说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共产主义道德是人类道德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是一种崭新的思想道德体系；共产主义道德是反对一切私有制并为公有制服务的道德，因而它“代表着现状的变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352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353页。
③④ 《列宁选集》第4卷，第355页。

革、代表着未来”①；共产主义道德是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的。

第二，列宁提出并论证了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

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不仅科学地分析了共产主义道德这个概念，而且论述了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列宁曾经指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实质，“就要把自己的工作和能力都贡献给公共事业。”②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是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经常遇到的关系问题。因此列宁认为：（一）共产主义道德是无产阶级的道德，是由无产阶级经济利益决定并为无产阶级经济利益服务的。因而共产主义道德是人类道德发展的必然阶段。（二）共产主义道德要求人们必须服从共产主义事业的客观要求，并且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有机地统一起来。（三）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就是要求人们正确地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当着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要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服从集体利益，这是因为无产者个人的解放，必须以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为前提条件。离开了这个前提，即离开阶级和人类的解放，个人的利益、个人的解放就是一句空话。（四）共产主义道德就是要求以崭新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对待自己的本职工作，即“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③就是要求“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创造出“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④而“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57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357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2页。
④ 《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

的东西。”①这种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就是以社会主人翁的态度对待本职工作，而这种主人翁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够“从事不领任何报酬的额外工作，并且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②（五）共产主义道德要求每个人都自觉遵守无产阶级的纪律，这是共产主义整体利益的需要。列宁指出：“共产主义（其第一步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则靠推翻了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劳动群众本身自由的自觉的纪律来维持，而且愈往前去就愈要靠这种纪律来维持”。“这种新的纪律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出自善良的愿望，它是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物质条件中成长起来的，而且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成长起来。没有这种物质条件就不会有这种纪律。”③这说明共产主义的劳动纪律是客观发展的要求，它必然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

第三，列宁指出并论述了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方法。

列宁从无产阶级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了自己的认识能力这一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出发，第一次提出并论述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科学方法：（一）要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列宁指出：“青年们只有把自己学习、教育和训练中的每一步骤同无产者和劳动者不断进行的反对旧的剥削者社会的斗争联系起来，才能学习共产主义。”④这说明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不能脱离阶级斗争实践。要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二）要在学习

①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9页。

④ 《列宁选集》第4卷，第355页。

无产阶级文化的过程中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列宁指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① 这就揭示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和文化教育的关系，也说明只有在普及文化教育的基础上才能搞好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三）要在同工农劳动群众结合的过程中进行共产主义道德的教育。列宁指出："必须使共产主义青年团把自己的训练、学习和教育同工农的劳动结合起来，不要关在自己的学校里，不要只限于阅读共产主义书籍和小册子。只有在劳动中同工农打成一片，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② 在与工农结合的过程中，在劳动中，通过大量的事实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这又是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方法。总之，列宁认为，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不能单靠阅读共产主义的书籍，而应当有多方面的知识修养，要通过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积累，逐渐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创立的，尔后经过列宁的充实和发展，形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进步、最合理、最科学的道德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348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358页。

为指导，科学地揭示了人类道德的本质，揭示了人类道德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也揭示了无产阶级道德产生和发展的特殊规律，即共产主义道德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德观充满了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光辉。因而研究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就可以更好地研究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如同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一样，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也要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这是它自身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但是，在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怎样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原理应用到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实际中去，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新课题。毛泽东正是在解决这个新课题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第二节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的运用和发展

任何时代的先进思想，都是与前人的思想成果相联系的，同时也都有它产生和发展的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毛泽东道德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也是这样。

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经济文化极其落后。中国共产党人要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能不遇到很大的阻力，其中包括来自伦理道

德方面的阻力。所以毛泽东从参加革命那一天起，就用了很大的精力去探求思想道德问题。他在同敌人的长期斗争中，在同革命队伍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思想。

早在“五四”运动之前，毛泽东就对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封建伦理道德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倡“必真必实”的道德思想。他在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致黎锦熙的信中指出：“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太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毁。”这一时期毛泽东的世界观虽然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唯心主义的，但他的伦理道德思想中有许多见解已含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成份。这还可以从毛泽东对《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语中进一步得到证实。《伦理学原理》一书的作者鲍尔生，是德国资产阶级伦理学家和教育家，是一个康德主义者。但鲍尔生比较重视经验和实践，重视伦理学对培养人的品行的作用。这对毛泽东有较深的影响。他在批语中指出：“非某事之本体有超然之善，乃因与生活有关系，故云善。于此吾又有所感焉。某事某物之善，乃人所随意呼加，视其与人类生活所生之关系而定也，并非指其本体之实。然则某事、某物、某行为之本体未必恶者，人以其与生活有损坏之关系，而以恶呼之，岂不冤乎！”就是说，由于各人地位、处境不同，人的道德观念是各种各样的，是可以对客观的善恶“随意呼加的”。但是决不能以个人的思想认识，作为判断善恶的标准。这反映了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之前，在论及善恶问题时，具有动机和效果统一的观点，反映了毛泽东是一个非常务实的

人。

"五四"运动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由于毛泽东已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投身到了广大工农群众斗争的实践中，他的道德观念也就发生了质的变化。也就是说，为了适应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斗争的需要，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批判地吸收了中国历史上一切先进的思想成果，形成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道德思想。即毛泽东的道德思想。

虽然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的实践中十分重视道德哲学问题，但他并没有写一本专门的著作论述这些问题。这是由于他长期处于革命和建设的第一线，忙于实际的领导工作所致。不过，我们可以从他留下的大量著作中清楚地了解到他的道德哲学思想的基本见解。如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反对自由主义》、《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人〉发刊词》、《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祝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以及建国后的《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对于诸如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无产阶级的党性问题；勇敢、坚定、沉着，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一切的战斗精神问题；吃苦在别人前头，享乐在别人后头的艰苦奋斗的风格问题；革命的英雄主义问题；密切联系群众和关心

群众生活的问题；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忠实、坦白、积极、乐观等道德规范问题；高尚的道德品质和道德风貌问题；都给予了理论和实际的说明和论述。所有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论述，不仅是对列宁的共产主义道德及其基本原则的继承，而且把列宁的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具体化、中国化了。

毛泽东通过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在道德理论上发展了他早期重视经验、重视实践的思想，把唯物辩证法贯彻始终。在毛泽东看来，要从理论上和认识上解决共产主义道德问题，必须重点抓好和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人性论的问题。

在阶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应当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处理这种关系？这个问题在中外哲学史上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长期争论不休。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为了从理论上和思想上战胜封建阶级，把人性论加以理论化、系统化。这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资产阶级人性论有很大的欺骗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理所当然地对资产阶级人性论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强调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着重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人性论对无产阶级的欺骗作用，以唤起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如果说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之前，由于他曾相信过进化论，因而对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欺骗性还认识不清楚；那么后来当他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时，他对资产阶级人性论就有了全面的认识。毛泽东指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① 从毛泽东这段话里，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不能否定人性的存在，否定了它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二）从总体上来说，在阶级社会里人性是具体的、是带着阶级性的，根本不存在所谓超阶级的人性；（三）资产阶级人性论虽然曾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不能完全否定它的合理性，但应该看到资产阶级人性论有欺骗性的一面，而在阶级对抗的时候，尤其应该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欺骗性、反动性，以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四）无产阶级关于人性的观点是批判地吸收了历史上一切先进的思想成果，又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因而它是最科学的；（五）人性这个概念的具体内容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反对“永恒的人性论。”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7页。

第二，关于功利主义的问题。

行为的动机和效果的关系问题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功利主义是强调效果的一种伦理学说。在资产阶级功利主义者看来，个人利益是人类行为的基础。凡是可以满足个人利益的行为就是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显然，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就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理论表现。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功利关系具有十分明确的意义，即我是通过我使别人受到损失的办法来为我自己取得利益。"①为了个人利益可以不考虑手段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由无数个这种功利关系形成的结合体。"资本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民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关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②当然，资产阶级功利主义者有时也提出"维护公共利益"、"维护国民利益"等口号以掩人耳目。但它实质上还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曾起过积极的作用，这一点应当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7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页。

肯定。但是另一面，也应当尖锐地指出它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作用。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对功利主义给予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他指出："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① 这就说明：（一）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只是反对割裂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关系的功利主义。（二）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功利主义带有强烈的阶级倾向。因此我们要坚决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三）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功利主义，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功利主义，它从内容和形式都起了很大的变化，它代表着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四）在无产阶级功利主义看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人们生活的共同目标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这种共同的目标把人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而人们追求的生活目标不是损害别人利于自己，而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1页。

是集体利益、国家利益高于自己的个人利益。（五）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无产阶级功利主义就转为共产主义道德了，因而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项严肃任务。

毛泽东为了批判资产阶级功利主义，以便使人们树立起共产主义道德，分析和论述了动机和效果的关系问题。他指出："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① 动机和效果之间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不能强调一方而忽视另一方。当然，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能使动机和效果完全统一起来，有时好的动机并不能达到好的效果。但是从总体上，从事物的发展趋势上，动机和效果应该是统一的。在懂得了动机和效果的辩证统一关系之后，我们就可以对人们的行为即善与恶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评价。

第三，关于个人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是毛泽东伦理学思想的中心问题。

毛泽东在个人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上，强调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的思想。在毛泽东看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② 个人虽然在历史上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2页。

能够起一定的作用，但不能对历史的发展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各个历史时期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个人包括领袖在内，如果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就将一事无成。所以要树立共产主义道德观念，就要解决好个人与群众的关系，就要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根本点。在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一生中，只要“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可见，热爱人民，关心人民的疾苦，与人民休戚与共，个人利益服从阶级的、民族的和国家的利益，在人民需要的时候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应有的道德品质。

毛泽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强调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是一个有两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封建的道德观念深深扎根于人们的头脑中。这种封建道德观的核心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自私自利。然而要变革几千年沿袭下来的封建道德，就要以新的道德品质来代替它。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一般原理，把列宁提出的共产主义道德概括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光彩。

第四，在毛泽东的伦理学思想中，还应当提到他关于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思想。共产主义事业是千百万人的事业，它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实现，要经过好多代人的艰苦努力才能实现的。因此，怎样才能把青少年培养成共产

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要经常考虑的问题。

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归根到底，是为了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列宁在论述共产主义道德原则时，非常强调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的教育原则。但由于列宁所处的历史时代，决定他不可能明确提出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经验，认为在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过程中，要立足于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发展。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建国后的和平建设年代，毛泽东总是十分重视接班人的培养问题。战争年代虽然条件极其艰苦，但他仍想尽各种办法开办各类学校，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培养和教育了整整一代人；建国后由于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毛泽东更加关心和重视接班人的培养和教育问题，他提出我们的教育“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就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指明了方向。总之，毛泽东一贯主张对青少年一代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一贯主张在革命实践中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必须具备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和自觉遵守革命纪律的高尚风貌，而又有强烈的共产主义事业的责任心。这些都是对列宁的道德哲学思想的充实和发展。

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毛泽东的伦理学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反复强

调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统一的思想、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以及热爱科学的思想，仍然是我们今天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不可缺少的课题，同时也是哲学工作者必须研究和解决的课题。长期以来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忽视了他的伦理学思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不足。认真分析和研究毛泽东在道德问题上的科学见解，对于我们全面地、科学地认识和掌握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十分必要的；同时也只有把这一部分精神财富挖掘出来，才能更好地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

第十一章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

第一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辟了我国革命历史的新阶段，也开辟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阶段。新中国的诞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空前规模的传播和发展。在新的社会实践中，毛泽东哲学思想又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在他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两篇著作中，就对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各种社会矛盾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和论述，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思想。以这两篇著作的基本思想为指导，我们在建国初期，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从新中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这是我们国家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中国共产党所确定的指

导方针是正确的。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同时，全国人民进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由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极其丰富，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实践中也获得了空前的普及和发展。

正确处理和解决好主观与客观的矛盾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在新的历史阶段中，能否解决好主观与客观的矛盾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从新中国建立之初，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就很注意这个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了用党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武装广大干部，以便更好地在实际工作中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地处理和解决新的问题，在一九五〇年底和一九五二年初，重新发表了毛泽东的哲学专著《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部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哲学著作的重新发表，对我国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都发生了重大影响。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指引下，哲学、社会科学这个阵地逐步被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占领，形成了崭新的、独立的各门社会科学。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建国初期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是混乱的，很多人在实际上分不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当然更谈不到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为了让

马克思主义哲学占领学术研究这块阵地，五十年代前期，在思想战线上相继开展了对电影《武训传》所宣扬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批判，对梁漱溟的唯心主义和胡适的唯心主义的批判。这几次思想战线上的批判和斗争，对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起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毛泽东特别强调在实际工作中反对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要人们深入实践、深入群众，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主观和客观相符合的原则，即坚持按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办事。他指出："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不合实际就错了。切合实际就是要看需要与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①强调领导干部要到下边去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他说："听说现在许多负责同志不下去了。这不好。中央机关苦得很，在这个地方一点知识也捞不到。你要找什么知识，蹲在机关里是找不到的。真正出知识的地方是工厂、合作社、商店。工厂怎么办，合作社怎么办，商店怎么办，在机关里是搞不清楚的。越是上层越没有东西。要解决问题，一定要自己下去，或者是请下面的人上来。第一不下去，第二不请下面的人上来，就不能解决问题。"②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在实际工作中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问题，他说："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③这就提出了要认识和掌握

---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1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42页。

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问题。不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就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要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就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

为了更好地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一九五六年，中国共产党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的一生，作了全面的科学的评价，深刻地批判了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作了科学的分析，提出并初步论述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九五六年九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八大”的《政治报告》、《修改党章的报告》等重要的历史文献，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它科学地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发展生产力。为此要在政治上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反对个人崇拜。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在“八大”召开之前，毛泽东就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进行了新的探索。他在一九五六年三、四月间写的《论十大关

系》一文，就是这种新的探索的产物。一九五六年初，毛泽东提出了总结建设经验，进一步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的任务。并亲自听取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认真地进行了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认真思索，于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以苏联的建设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一系列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它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的反映，也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性的文献。

《论十大关系》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这不仅表现在它的内容即十大关系问题是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的结果，而且它的论证和分析，不是抽象的、脱离现实基础演绎出来的，而是从现实出发的，是严密的科学的。《论十大关系》最突出的特点是采取了矛盾分析方法，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第一，毛泽东与斯大林不同，他首先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矛盾。它指出："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①如何分析矛盾呢？毛泽东指出，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那一头，都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②毛泽东在分析这十对矛盾的各个方面及其辩证关系时，既讲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又讲了矛盾的次要方面；既讲了对立面的斗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5页。

争，又讲了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毛泽东还抓住那些容易发生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地方和问题，对于那些常常被人们忽视的矛盾的非主要方面和非重点方面，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他着重说明了必须注意非重点，即要解决主要矛盾和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有时要从解决次要矛盾和抓住矛盾的次要方面入手的辩证法。这个分析和论述比起《矛盾论》里对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分析和论述，则更深刻了。第二，《论十大关系》中对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同质的方法加以解决的论述和分析，也比《矛盾论》里的论述和分析要具体得多、丰富得多、深刻得多，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也作出了新贡献。他在这里不是一般强调群众的地位和作用，而是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①那么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呢？毛泽东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情况作了科学的分析：“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②为此，他详尽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8页。

经济基础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从这个分析中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建设方针。这是极为彻底的唯物史观。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所阐述的基本思想，在“八大”重要文献中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和论述，变为全党的行动纲领。“八大”之后，毛泽东为了进一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头脑，反复论述了唯物辩证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指导作用。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指出辩证地分析和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对问题要作全面的分析，才能解决得妥当。”“世界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净是不动没有，净是动也没有。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① 他告诉广大干部，世界上的事物都是“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② 这是讲的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因此人们的认识也是曲折的。因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所谓对立统一，就是不同性质的对立的东西的统一。比如水，是由氢和氧两种元素结合的。如果没有氧，光有氢，或者没有氢，光有氧，都不能够搞成水。……社会上的事情也是这样。中央和地方是对立统一，这个部和那个部也是对立统一。”③ 这就深刻地揭示了事物运动变化的内在原因。建国后的前七年因为有些同志不懂得这个辩证法的道理，所以走了一些弯路。如“有一些同志就是不讲辩证法，不分析，凡是苏联的东西都说是好的，硬搬苏联

---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9—320页。

的一切东西。其实，中国的东西也好，外国的东西也好，都是可以分析的，有好的，有不好的。……现在，一点论在相当一些同志中间还不能改。他们片面地看问题，认为苏联的东西都好，一切照搬，不应当搬的也搬来了不少。那些搬得不对的，不适合我们这块土地的东西，必须改过来。”①显然，毛泽东在这里对唯物辩证法的运用和分析，比他在《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的运用和分析，要深刻得多。特别是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分析和论述，大大超过前人。但是还不系统。为了系统地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毛泽东又于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院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后来毛泽东根据当时的记录加以整理，作了若干补充，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篇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作了重大发展。

从哲学上来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的主要贡献是：第一，全面分析和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社会基本矛盾问题曾作过经典性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②“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0—32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①“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消灭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②这就清楚地说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基本原理。列宁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并且以此解释各种社会形态的形成和发展，说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毛泽东在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基本观点的同时，系统地总结了国内国际的历史经验，提出并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毛泽东批评斯大林在这点上的错误时指出："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展的基本矛盾。”①为此毛泽东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②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③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不同于旧社会的基本矛盾，这是因为，旧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对抗性的，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则是非对抗性的。这就表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④“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⑤通过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目标和发展方向。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第二，全面地系统地提出并论证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从而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有过一些预见。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分析过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存在的经济条件。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和《反杜林论》等著作中，论述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存在着城乡之间的差别。列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3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7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6页。

宁和斯大林也都分析过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种种矛盾。列宁指出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将要消失，矛盾还会存在。但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宣布社会主义建成以后，则更多地强调全国人民在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忽视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则根据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明确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① "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②在毛泽东看来，"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③因为在我国，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本来是对抗性的，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毛泽东还认为，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麻痹大意，也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因此，由于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即敌我矛盾是分清敌我的问题，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是一种是非问题。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来说，用专政的方法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具体地说，这种民主的方法也就是"团结——批评——团结"。所以要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4页。

矛盾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①

总之，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科学地提出并论证了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重大发展。当然它也有个别提法是不适当的。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把它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则是对它的基本内容和中心思想的歪曲。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评价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的产生，说明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哲学思想又得到了进一步地充实和发展。

第二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曲折发展

从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六年五月，是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这十年，虽然我们受到严重挫折，但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此期间仍然有所发展。

如前所述，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提出并论证了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说。理论界对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6—457页。

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深刻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宣传，对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都有极大的促进。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又提出了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对以后的工作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一九五八年，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是却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毛泽东本人在胜利面前有骄傲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这一时期在哲学战线上主观唯心主义也大肆泛滥。一九五八年和经济战线上的浮夸风相配合，哲学界有人提出了“哲学的跃进和跃进的哲学”这一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口号。当时工农业生产上大放“卫星”，一些凭空编造的奇迹塞满了我们的报刊。所谓“哲学的跃进和跃进的哲学”就是为这些假话、大话进行理论上的论证。一时，哲学在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的关系、自由和必然的关系上，均陷进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潭。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骗子，更是用唯心主义肆无忌惮地糟踏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面对一九五八年在主观唯心主义思潮的支配下，经济战线出现冒进，使生产力遭受破坏的现实，彭德怀等人坚持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则，正确地指出了我们在经济工作中的过失，批判了脱离客观实际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本来是完全正确的，但坚持唯物论的彭德怀等人却受到了

打击。

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夕，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毛泽东本人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在这期间，毛泽东从解决主观与客观矛盾出发，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哲学思想：第一，他提出不能剥夺农民，要反对平均主义、纠正“共产风”，要算帐退赔，要坚决退赔，只有退赔才能取信于民，才能教育干部；第二，他提出不能超越历史发展阶段，不能把人民公社的性质搞错了，强调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也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即从小集体到大集体，从生产队基本所有制到公社所有制，要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因此在人民公社里要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要承认合理差别；第三，他提出要遵循价值规律，要实行等价交换，要发展商品生产，批驳了陈伯达等人所主张的要废除商品，实行直接调拨的一些错误主张。毫无疑义，毛泽东的这些见解是深刻的。这不仅对于克服当时盛极一时的“左”倾错误有指导作用，而且对于人们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极有指导意义的。但是，在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又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这不仅使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许多人受到了打击，而且使他的许多正确的意见难于付诸实践。

一九六〇年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毛泽东本人又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经过调查研究，一九六一年以后陆续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高教六十条、科技十四条和文艺八条等等。这些条例

由于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比较切合实际。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大跃进”以来的错误进行了总结，有利于教育全党。这次会议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重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一时期，在哲学上强调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对克服经济工作中的主观主义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中的指导思想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一九六二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这些错误观点对哲学理论的研究发生了重大的消极影响。也就是说，由于这些错误观点作祟，这一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其中包括哲学战线进行了许多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到一九六四年，哲学战线上的“左”的思潮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地步，如对杨献珍的所谓“合二而一”论的批判，对冯定的《平凡的真理》和《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批判，片面强调矛盾的斗争性，片面地强调阶级斗争，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混淆了是非。与此同时，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个人崇拜的现象也在逐步发展。特别是林彪、康生、陈伯达等人别有用心地利用了这些错误。这就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作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

但是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从一九六〇年以来，毛泽东在理论上仍然提出了一些重要见解，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一，一九六一年初，党中央和毛泽东本人重新提倡调查研究，这是六十年代初期我们党的工作的重要转变的思想先导。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做工作要有三条：一是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过去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做调查研究比较认真，办事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凭调查研究，情况明才下决心，因此这个决心就大，方法也就对。毛泽东还指出，今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毛泽东还特别强调领导干部亲自作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强调指出不走群众路线，不调查研究，主观地决定问题，工作就要失败。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以后，毛泽东还亲自组织和领导了几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等省农村进行调查。通过调查，毛泽东发现了人民公社中存在的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体制问题、规模问题、分配问题、食堂问题等，而归结起来就是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社员和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

为了加强调查研究，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还专门发了指示。指示中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于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

纷纷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并着手解决各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措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毛泽东关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指示，在当时曾经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解放军报》发表了《毛泽东同志论调查研究》，《人民日报》、《红旗》等全国各地报刊杂志登载了大量有关调查研究的文章和资料；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他们的讲话、报告和文章中，也都强调和阐述了调查研究工作的重大意义。陈云同志就曾说过：领导机关制订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由于各方面的大力宣传，在六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又有了很大程度的恢复，不少干部的思想作风有了不同程度的转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作的状况也有所改善。因此，在十年所经历的曲折发展过程中，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论述，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部分，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的意义。

第二，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有七千人参加，因此又称七千人大会。会议主要是为了总结建国十二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工作经验，统一全党的认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以迅速扭转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依据建国以来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阐述了许多重要的哲学思想，充实和丰

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之点是：（一）他从主观与客观矛盾问题上强调了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社会客观规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指出："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①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毛泽东认为，就要发扬民主，依靠群众。不要怕群众，不要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②这篇《讲话》，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作了深刻的具体的阐发。（二）毛泽东指出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他说："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筋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③这说明，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光有成功的经验还不够，还必须有失败的经验，才能使人们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在毛泽东看来，要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

---

① 1978年第7期《红旗》，第13页。

② 1978年第7期《红旗》，第16页。

③ 1978年第7期《红旗》，第13页。

“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①毛泽东还批评了天才论，指出，没有反复的实践，就不可能获得正确的认识。

总之，毛泽东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用了很大的篇幅，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上进一步作了总结，大大发展了他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所阐述的基本思想。

第三，《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实践论》的基本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写于一九六三年五月。它是为了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对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三年间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所作的哲学概括：（一）它批判了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批判了天才论，强调了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源。指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②中国人民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经过了反复的实践，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经验；同样，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也是这样，只能从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才能获得。没有实践，就不可能有认识。（二）它指出了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人们的社会

① 1978年第7期《红旗》，第12页。

②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单行本，第1页。

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①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转化为物质，这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碰到的现象。但从哲学上加以概括，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三）它进一步分析了人们的认识过程：“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②比如，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也必然是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四）毛泽东在这篇著作中特别强调进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教育的意义，他指出：“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③

此外，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曾指出过：“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④；一九六三年他还特别强调：“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

---

①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单行本，第1页。
②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单行本，第3页。
③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单行本，第3页。
④ 转引自1970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

的尖锐武器。”①并明确指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等。所有这些思想和见解，无疑都是正确的和科学的、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大贡献。

总而言之，从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从总体来说，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所犯的错误，是属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的错误，属于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错误。这个期间的错误发生以后，中国共产党一经发现和认识，一般是能够努力加以纠正的，至少有所限制。这些错误无论在范围、程度和性质上，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终究有很大的不同，终究还没有发展到占主导地位。并且在纠正已发生的错误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人又提出许多重要思想，很有独创。这些好的意见、思想、理论之所以不能完全付诸实践，是因为在这期间关于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对整个社会生活造成了全面的危害。特别是发展到对《海瑞罢官》的围剿，使“左”的错误达到了支配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严重程度。

第三节　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

一九七六年十月我们党粉碎江青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胜利，

① 转引自1966年9月11日《人民日报》。

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中，广大干部和群众揭发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批判他们的反革命理论。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所以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华国锋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逾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这样就使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的工作处于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针锋相对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从而在全国引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各报刊发表了许多文章。一九七八年六月，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深刻地阐明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进一步为真理标准的讨论指明了方向。从六月到十一月，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都发表了文章和讲话，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促进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

条件。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历史的发展已经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哲学的解放成为我们国家的历史的伟大转折的先导。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思想非常活跃，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一九七八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工人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

的。因为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已经对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了检验，实践的结果即严重的教训已经为越来越多的群众所认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宣告了“贫困的哲学”的历史时期的终结。在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哲学战线的拨乱反正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所谓“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论战”的政治上和理论上的是非在讨论中逐步澄清，杨献珍、冯定等人的哲学著作重新出版。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推动下，对哲学上的许多基本理论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特别是过去长期存在的对中国哲学遗产和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所采取的简单地全盘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得到了纠正。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哲学家、哲学史、比较学等许多新的学科和许多新的哲学范畴、概念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我国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空前繁荣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为了更好地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思想路线，又适时地提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这也是哲学研究工作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一九八〇年八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和肃清政治思想上的封建余毒的历史性任务。同年十二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批判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想，打击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反革命活动，对全国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发生了重大的良好影响。

一九八一年六月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六中全会并通过了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次会议是我们党和国家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究竟如何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如何科学地阐明毛泽东思想，如何实事求是地总结建国以来党的基本经验和评价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这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与中国建设的命运和前途的严肃的政治任务。十一届六中全会圆满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并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全会和《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本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历史地位。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① 《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和指导意义作了崭新的概括。指出毛泽东思想以它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② 并指出"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

---

①②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们不仅表现在《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重要著作中，而且表现在毛泽东的全部科学著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①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中提出来急需解决的问题，而十一届六中全会和《决议》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战斗任务，总结了毛泽东同志晚年工作指导上的经验教训，系统清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左”的错误，提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但是，在实施现代化路线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而要把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就必须从理论上说明这些新情况，解决这些新问题。这就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任务。十一届六中全会及其《决议》不仅对毛泽东思想包括他的哲学思想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理论概括，而且还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原理分析和论述了新的历史时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从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则进一步系统地分析和论述了新的历史时期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

---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指出："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我们应该把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结合起来。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认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①这种区别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只有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②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才能以新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毛泽东在《实践论》里曾经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③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努力探索和解决前进道路上的新问题，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前进，这就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及其《决议》为我们理论工作者指出的正确方向。

①②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八二年九月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大会。这次大会系统地总结了中国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特别是对粉碎“四人帮”六年的历史性胜利作了科学总结，从而确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奋斗纲领。大会的文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充实和发展，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的概括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生动体现。这次大会不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具体道路认识的新的高度，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新的高度，即它不是从社会主义某些方面而是从社会主义的总体上，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它的发展规律，给以理论的说明和概括。这是十二大的重要理论贡献，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中，主观和客观的矛盾是经常发生的。能否正确地处理好这对矛盾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和以往的自发发展的社会不同，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按照客观规律自觉地有计划地进行建设的。这样，全面地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它的发展规律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十二大文献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地把社会主义的特征概括为：消灭剥削制度，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最终会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对社会主义社会特征所做的最全面完

整的科学概括。特别是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他们的实践活动中，虽然强调过教育、道德、纪律、劳动态度的重要意义，但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中国共产党总结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了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经验，把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概括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强调社会主义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还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新概括，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上的一次飞跃和深化。它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个基本结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大的意义。它的提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重新认识和研究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最重大的理论成果。它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理论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个基本结论说明，社会主义不是一个模式，社会主义在各国的实现，一定是丰富多彩的。目标是一个，但各有特色。在我们这个有十亿人口的大国里，建设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世界的进一步发展，有着更广泛的意义。它为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展示出更加广阔的前景。是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之所在。胡耀邦在十二大的报告中，具体地分析和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表现：即所有制结构有我们自

己的特色；经营管理和分配制度有我们自己的特色；计划管理方式有我们自己的特色；人民政权的形式有我们自己的特色；思想、文化建设也有我们自己的特色，等等。中国社会主义的这些特色，均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又体现了中国的国情，因而它是主观与客观的有机统一。

总之，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认识和掌握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规律，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从不知到知，从不完全的认识，到比较完全的认识，从少数人的认识到全党的认识，从原则的认识到具体化为方针政策的认识，是要经过长期的曲折的过程，是要经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的。十二大及其文献，标志着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已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把这种认识集中到一点，就是全党正确地认识和掌握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十二大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可以看出，这个提法同八大的提法是一致的。但又不是简单重复八大的提法，十二大不但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上比八大更准确了，而且为了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提出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了二十年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这些都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三十多年来，毛泽东哲学思想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这又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在斗

争中进行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在克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斗争中获得了新的更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在历史上，我们有克服战胜王明的教条主义的伟大斗争，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动哲学的激烈斗争。我们正是由于批判和清算了林彪的唯心主义的“天才论”，“顶峰论”，批判和清算了“四人帮”的猖獗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新的发展。粉碎“四人帮”以后，正是由于我们批判了“两个凡是”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才使中国当代哲学发展中的贫困状态得以终结，开始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当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中，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特点，这就增加了斗争的复杂性和曲折性。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日益强大，公开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越来越被唾弃。所以一方面暗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敌人，如林彪、“四人帮”之流，千方百计采取阴谋手段，打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号践踏唯物论和辩证法；另一方面，我们革命队伍内部的许多同志在犯主观主义的错误的时候，也往往嘴里讲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词句。尽管这两种情况的性质不同，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都是不利的，都在不同程度上败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声誉。因此我们要研究当代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新的形式和新的特点，以便战胜它。历史的经验又告诉我们，在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中，必须采取合理的、恰如其分的、科学的斗争方式，

防止和克服过火的、粗暴的斗争方式的发生。因为后一种斗争方式并不能解决问题，并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对哲学研究中的是非问题，要坚持通过自由讨论和实践去解决，即通过讨论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争论的方法去解决，而决不允许采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或者禁止一种风格、一个学派。在哲学斗争中必须按真理发展的规律办事。

毛泽东哲学思想并没有也不可能穷尽真理。我们只有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地了解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努力探索和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的新问题，用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去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才能使毛泽东哲学思想万古常青，永葆旺盛的生命力。

结 束 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各条战线都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在大好形势的鼓舞下，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都很注意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特别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毛泽东思想其中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给以了科学的分析和评价。这就为我们深入研究毛泽东哲学指明了方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方面，为我们作出了光辉榜样。只要我们坚持这些原则，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工作，就一定会取得巨大的成就。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一门科学。对待科学的东西只能用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过去在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方面的某些失误，就是因为缺乏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这方面党中央为我们作出了表率。应当承认，在半个多世纪里，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武装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我们才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因此认真总结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这份宝贵的哲学遗产，是我们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需要，也是子孙后代对我们这一代人的要求。但是如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毛泽东哲学思想也是发展的。因此要根据新的条件、新的情况、新的

经验，不断地充实和发展它，才能使它永葆青春。这就是说，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坚持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需要。

毛泽东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把这各方面的贡献都挖掘出来，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给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明，是理论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高兴地看到，近年来在这方面的研究是颇有成绩的。但是也应当承认，我们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距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距广大群众对我们的要求，还有不小的距离。怎样尽快地缩短这个距离，确实是每一个理论工作者应当考虑的问题。

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全国人民中迅速地掀起了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热潮，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在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和鼓舞下，我们撰写了这本《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但当把它奉献给广大读者的时候，我们又深感不安。因为我们的水平与广大群众的要求相差太大。这本小册子当然不是全面分析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但如果我们的研究能给读者带来一点启示，有所帮助，那将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刻。谢谢您读完这本书。

作　者

一九八三年元月于北京